

中國邊政

چین چىگاراسياستى

ཀུང་པོ་འཛིན་མཐའ་ལྷན་ཁག་གི་ཡི་གེ།

目錄

110

漢滿蒙維藏合璧刊名	封面
蒙藏委員會吳委員長化鵬七十九年度下半年施政報告（摘錄）	吳化鵬 (1)
做一個全民各民族的總統 賀	
李登輝先生就任中華民國第八任總統	阿不都拉 (4)
蘇聯的民主改革與中共的反應	壯 悔 (6)
鮮卑早期事略	劉學銑 (12)
中國西域古民族——吐火羅之興衰	張哲誠 (23)
中共「西藏自治區」行政區劃現況及其沿革	宋 武 (39)
蒙古及蒙古人（待續）	思和塞汗譯 (44)
首屆「新疆文化研習會」紀要	郭江東 (53)
蔡文姬與胡茄十八拍	康素慎 (54)
雍正皇帝的統馭術	黃清榮 (57)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六月出版



智慧藏

蒙藏委員會吳委員長化鵬七十九年度

吳化鵬

下半年施政報告（摘錄）

近一年來，共產主義受到世界性民主浪潮的衝擊，從波蘭開始，東德、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及捷克斯拉夫等國，相繼唾棄共產制度，走上民主改革的道路，這股浪潮橫掃東歐之後，在外蒙古也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民主訴求運動，從去（七十八）年十二月起，被壓抑了近七十年的外蒙古同胞，毅然無視於外蒙當局的禁令，連續舉行群眾集會，要求民主改革與經濟開放。以知識份子與青年為主的外蒙人民於今年一月成立了「蒙古民主聯盟」，更進而正式成立第一個反對黨——「蒙古民主黨」，頻頻向外蒙當局施壓，要求結束共黨專政，舉行自由選舉，同時要求拆除列寧、史達林銅像，以及蘇聯軍隊全部撤出外蒙。迄目前止，已迫使外蒙當局作了黨政改組，召開人民代表大會，修考「憲法」，刪除了共黨擔任領導角色的條文。現在這股民主風潮仍在澎湃發展中，由於其政治主張趨向民主開放，對外經貿有向自由世界延伸之趨勢，可望出現有利於我民間或政府施展運用的時機與空間。

去（七十八）年大陸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內蒙古雖在中國嚴密監視下動彈不得，但以內外蒙古地區毗鄰，血肉相連聲氣互通之脈動關係而言，在此民主激盪的情境下，勢將產生敏感反應。而西藏地區，自去（七十八）年三月拉薩發生遊行示威，釀成流血事件，中共宣佈實施戒嚴，更採取軟硬兼施伎倆，一方面舉行公審大會，審判政治犯，藉以嚇阻西藏境內藏胞抗暴行動；一方面舉行班禪活佛圓寂紀念活動等措施，藉以攏絡藏胞人心，拉薩雖於日前迫於情勢，宣佈解嚴，但仍難掩飾其專制獨裁政權的真面目。同時，藏胞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獲得去（七十八）年諾貝爾和平獎後，繼續運用其國際奧援

策略，希望以其在華府國會山莊所提「五點和平計畫」以及在法國史特拉斯堡向記者所宣稱的「七點和平建議」為藍本，透過宣傳與遊說，迫使中共接受達賴喇嘛所提條件，進行談判解決西藏問題。此種企圖將西藏問題國際化的傾向，殊值吾人注意。

我們堅信，民主制度的落實，才是長治久安的千秋基業，而台灣經驗的推展，則是中國自由民主、繁榮進步的體現，也是蒙藏問題的根本解決之道。值此政府整體推展大陸政策之時，本會亦正隨時注視蒙藏情勢，掌握蒙藏現況，相機開創蒙藏工作。茲謹將過去半年來積極推動的蒙藏業務，擇要報告如下：

一、加強海內外蒙藏同胞之聯繫與服務

旅居海外蒙藏同胞，因其旅居國之特性而有不同之處境，本會係按其差異性而採行不同之施政措施：

——強化本會海外聯絡據點之聯繫與服務功能

蒙胞方面，係責成設於美國新澤西州之「世界蒙胞台北俱樂部」總部及分別設於美國新澤西、費城、舊金山、紐約、洛杉磯、加拿大、法國、西德、比利時等九個分部，推展聯繫及服務工作。本會鑒於東歐及外蒙古民主風潮所激起之變化，刻正透過海外蒙胞組織推展對旅居東歐地區蒙胞及內外蒙同胞之聯絡與接觸，以開拓工作領域。

藏胞方面，在藏胞聚居較多之地區廣設藏胞聯絡中心或聯絡員，隨時提供必要之協助與服務。目前共設立兩處聯絡中心（印度之加爾各答藏胞聯絡服務中心、尼泊爾加德滿都藏胞聯絡服務中心）及三十一位聯絡員（遍佈印度、尼泊爾、美國、加拿大、法國、沙烏地阿拉

伯等地)，日後將繼續擴大範圍，增設聯絡員，並預為培植海外優秀藏胞青年，作為將來聯絡與服務海外藏胞之中堅。

輔導海外藏胞社團與社區發展教育及生產事業，以改善其生活

海外藏胞尤其旅居印度、尼泊爾藏胞之生活環境，甚為艱困。本會對於設備簡陋、資金缺乏，生產工具和技術極為落後之藏胞難民營、藏民學校，提供其急需之技術支援與經費資助，改善其公共設施及生產機具。半年來，共有十五處社區、學校接受本會補助。接受過本會輔導之藏胞社區與學校，其生活環境、子女教育均已獲得明顯改善。目前申請件數呈現愈來愈多趨勢，本會經費有限，除針對需要，嚴加審核外，在預算方面，勢須作適度之調整。

建立雙向溝通管道，促進共識，增強國內外蒙藏同胞對政府之向心，定期邀請海外蒙藏社區領導人士回國參觀訪問，或參加慶典、會議。回國之蒙藏同胞代表計達五十八人次，此外，並經常派員赴海外考察蒙藏社區，表示政府關懷至意；或訪問僑居國政府，溝通意見，表明我政府立場。上半年特派遺委員、處長、科長等四員分批出國宣慰訪問。此外，並選擇優良刊物定期郵寄海外蒙藏同胞閱讀，增加本會「蒙藏之友」雙月刊編輯內容，廣泛介紹蒙藏文化，寄送海內外蒙藏同胞與社團，增進對祖國之向心力。

上列各項工作仍繼續加強辦理中，至於照顧國內蒙藏同胞生活，協助貧困無依者改善環境，亦為本會年度工作計畫，均在廣續辦理之中。

二、培植海內外蒙藏青年幹部

蒙藏青年係未來重建蒙藏邊疆之棟樑。輔導蒙藏青年接受高深教育，蔚為國用，為本會重要工作之一。針對海內外蒙藏青年不同的需要，採取了以下數項培育措施。

協助國內蒙藏青年升學就業，鼓勵其努力向學，接受高深教育，對成績優良、表現傑出之學生，頒發獎助學金，並經常辦理座

談會、自強活動，增進其團結愛國、互助合作之精神。

旅居海外蒙藏青年有志於研習中華文化或專業技能者，本會輔導其回國就學或訓練，前者經甄選具有高中畢業以上程度之蒙藏學生回國升學，目前共十六人在國內就讀，今後並計畫每年輔導十名藏胞青年回國升學。此外並辦理海外藏胞青年回國接受職業技術訓練及幹部培植訓練，前者以培養藏胞生活技能為主，每三個月訓練一期，結訓後安排其接受在職訓練，期能學以致用，迄目前止，已舉辦過的訓練職類為：烹飪、縫紉、美容、理燙髮、汽車駕駛保養、電腦、美工、水電修理與基本車繡等十餘項，接受訓練者計二百餘人，甚受海外藏胞青年之歡迎，目前正在進行第十六梯次訓練，計有學員廿五人，另外又自海外甄選具有大專程度藏胞青年施以專業國語文能力訓練，一年一期，每年以十人為目標，結訓後選為海外工作幹部，已實施二梯次，訓畢學員十一人，另九人現正受訓中。另提供在僑居地高中以上學校就讀之貧困藏胞學生獎助學金，獎勵其繼續深造。

充實「台北西藏兒童之家」，接運海外貧苦無依藏童回國就養與升學，安置於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之「西藏兒童之家」，已就充實教材設備及組織結構等多次與該會研商，希望提供九十六名藏童藏生（包含高中與高職、國中就讀者）。以良好之教育與生活環境。

加強蒙藏語文教育工作上，除輔導國內蒙古同鄉會創辦之「蒙文進修班」，西藏兒童之家舉辦之「藏文進修班」，加強教學外，並輔導世界蒙胞台北俱樂部各分部成立「蒙文進修班」，上半年度計有四個分部成立了「蒙文進修班」。此外，本會為鼓勵一般大專青年研習蒙藏語文，在國立政治大學及台灣師範大學設有蒙藏語文獎學金十五名。

三、策進蒙藏地區工作與研究

過去一年來蒙藏地區情勢之變化，已如前此所報告者。本會為聲援外蒙古民主運動，加強蒙藏地區工作與研究，掌握蒙藏地區現況，爭取蒙藏同胞向心，本年度採取之措施如下：

—於今（七十九）年元月十九日，舉行記者會，提出了九項支援措施，鼓勵外蒙古同胞再接再厲，理性的爭取民主自由，並呼籲外蒙當局，正視蒙古人民願望及世界民主潮流，實行民主，開放社會。

—為深入研析外蒙古民主改革運動之發展，及政府所宜採行之因應措施，特邀請學者專家及外交部有關官員，舉行四次座談會，獲得初步結論，作為本會推展工作之參考。

—廣泛蒐集蒙藏地區政經文教現況資料，每週邀請學者專家舉行「蒙藏地區現況研討會」一次，分析最近蒙藏地區動態，並將研討結論刊載於「蒙藏地區現況週報」，分贈有關單位與人士參考。

—由本會約聘學者專家組成「蒙藏專題研究小組」每月定期舉行「蒙藏專題研討會」乙次，將研討結論作為施政參考。

—配合政府開放國人赴大陸探親、及兩岸民間交流頻繁之趨勢，透過私人返鄉探親或學術文化交流之便，多方蒐集蒙藏地區資訊及文物，加以彙整運用。

四、舉辦蒙藏藝文活動

蒙藏文化緣於其特殊之地理環境與悠久之歷史淵源，而展現其獨特之風貌與豐富之內涵，成為中華文化重要之一環。本會為促進國人對蒙藏之認識與關懷，經常舉辦一系列活動，使社會大眾經由認知而重視，進而擷取蒙藏文化之精華，充實中華文化之內涵，本年度舉辦之活動如下：

—舉辦「蒙藏文物全省巡迴展」自本（七十九）年三月起，在全省各縣市文化中心巡迴展出一年，展出之文物包括二百六十餘件蒙藏文物、學者專家之演講及錄影帶之播放，目前已展出台南縣、屏東縣、高雄縣、新竹市等地，尚在陸續展覽中。

—召開藏胞反共抗暴卅一週年紀念會暨法會，海內外藏胞代表、藏胞青年學生及國內各界人士三百餘人，於三月十日齊聚一堂，多位代表均在會中致詞，譴責中共迫害藏胞之罪行，重申維護西藏傳統文化、支援藏胞爭取民主、自由之決心。會後由佛教顯密兩宗高僧誦經追荐抗暴死難藏胞英靈。

—辦理中樞致祭成陵大典。今年四月十六日（農曆三月廿一日）係中樞致祭成陵大典之期，總統特派化鵬代表主祭，並邀約國民大會、五院、各部會代表、蒙藏在台政教領導人士及在台邊疆學術社團負責人等陪祭，全體在台蒙胞及海外蒙胞代表等與祭，大陸蒙籍民運人士劉燕小姐也專程來台參加祭典，典禮莊嚴隆重，充分顯示對一代偉人之尊崇。

—今年二月廿二日舉行第十四輩達賴喇嘛坐床五十週年紀念座談會，六十餘位藏胞代表與學者專家與會，會中就本會吳前委員長忠信主持達賴喇嘛坐床之經過與意義，以及如何促進中央與達賴喇嘛之間的關係發表意見，作為爾後推展藏事工作之參考。

—每月定期舉辦「蒙藏學術專題講演會」乙次，邀請蒙藏專家學者講演，以供社會各界人士前往聽講，增進國人對蒙藏之了解。

—本會為幫助國內青年深入瞭解藏族文化，今年一月首次與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合辦「大專青年尼泊爾藏族文化研習團」，甄選三〇名優秀青年，組團前往尼泊爾地區作為期八天之訪問與考察旅居當地之藏胞生活狀況。

—籌建「蒙藏文化中心」，使之成為多功能之社教場所，已列為行政院八十年施政重點之一，本會特成立專案小組，多次集會妥為設計，一俟年度預算通過，即着手進行興建。

做一個全民各族的總統 賀

李登輝先生就任中華民國第八任總統

阿不都拉

七十九年前，中山先生以大公無私的精神，創建了中華民國，更在民國肇建之初，就揭櫫五族共和、民族平等的政治主張，同時首倡合漢、滿、蒙、回（指維吾爾）、藏各民族於一爐而治之使成爲中華民族，這種磅礴的心胸，可以說是五百年不世出的偉人，尤其爲了促成國家的統一，不使國民再受戰亂、分裂的痛苦，毅然放棄總統的名位，這種不戀棧權位的高風亮節，在歷史上實不作第二人想，較諸許由尤有過之，然而當袁世凱不能效忠民國、不能爲民衆謀福祉而帝制自爲時，中山先生又決然發起討袁護國運動，這種忠於國家民族、不放棄責任、不改變初衷的革命家精神，在國史上也是空前的，宜乎當他逝世後被國人尊之爲國父。

中山先生逝世之後，由蔣介石先生承傳了革命的薪火，歷經北伐、抗戰，使分崩離析的中國，重歸於統一，蔣先生並成爲行憲後首任總統，蔣先生的豐功偉績，自然而然地成爲一代強人，尤以領導全國各族軍民浴血抗戰，以其獨創的「以空間換取時間」戰略，再加上犧牲了幾千萬各族同胞的生命，換得對日抗戰的勝利，也換得台灣重回祖國版圖；其後中共在外力的支助下，再加上主客觀因素，中華民國政府不得不於民國卅九年撤離大陸退守台灣，當政府遷台之時，隨同而來的是全中國各民族的青英，從此台灣在前後兩位蔣總統以及整個中華民族菁英的經營之下，農工商業都以飛躍的速度成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對教育的提倡，更是不遺餘力，因此復興基地國民知識水準不斷提升，政府所有的規劃，都是爲了國土的重光，因爲沒有一個中國人甘願背棄歷史傳承，做民族的罪人，所以儘管偏處海隅，還是心懷中國。

由於歲月不居，兩位蔣總統都先後辭世了，眼前坊間或有人認爲

強人已逝，應該有所變革了，誠然，世間事無時無刻不在變。然而萬變不離其宗，也就是中國人之爲中國人是不可更易的，就憑兩位蔣總統的堅持統一中國，必將留名千秋，縱然海峽彼岸的中共，對這一項堅持，也付出了應有的尊敬，經國先生於競選第七任總統時，選擇李登輝先生爲伙伴，想必是看中登輝先生有做中國人的決心，而且能夠秉持統一中國的既定國策，努力去做，如今經國先生辭世業已兩年，社會上雖然不曾懷憂喪志，但是脫序的行爲，則大爲增加，尤其去年底增額立法委員選舉時，主張背離國土完整、主權統一、國族團結的候選人紛紛當選，顯現令人擔憂的訊息，不到半年，李登輝先生當選中華民國第八任總統，他在國大閉幕典禮中，強調國土不容分裂，中國必須統一，這證明經國先生的選擇並沒有錯，我們希望登輝先生應以做全中國民族的總統自居，更企盼由於李總統的堅持，對那些乖離的主張者，能產生當頭棒喝的效果。

中國歷史之所以能綿延五千，實基於有容乃大的民族性，國內漢、滿、蒙、維、藏各民族彼此立於平等的地位，合作無間，共同生活在如秋海棠葉般的土地上，就民族而言，缺一不可，就土地而言，更不容分裂，否則，就不成其爲中國了；滿、蒙、維、藏各民族的生存空間，是在國土的週邊，每一個地方都是國防要衝、國家的藩籬，沒有了藩籬，內地缺少了屏障，而週邊地區，地廣人稀，也需要內地人力、財力的支援，才能得以繁榮，彼此齒唇相依，存亡與共，觀乎以往史實，凡是邊疆地區與內地融合時，必爲盛世，如同漢、唐、元、明、清初；反之，如邊疆與內地分裂時，必屬弱勢朝代，如兩晉、南宋、明、清季世，歷史本身雖然不會說話，却是客觀的，此一史實顯現的意義是：沒有邊疆的中國，雖然可以勉強苟存，也必然是個弱

勢的短命朝代，因此，凡是有使命感的中國領袖，必然立志要做全民各民族的領袖，也必然心中有滿、蒙、維、藏各民族，登輝先生既被選為中華民國總統，就該心中有滿、蒙、維、藏，做一個全中國各民族的總統。

誠然，政府播遷來台已經四十個年頭了，由於偏處海隅，地狹人稠，受地緣的影響，一部份人心中只有台、澎、金、馬，甚至於只限於台、澎而已，這種狹窄的地方族群意識，近年來似乎頗有蔓延之勢，這不僅有違於中國的傳統，更分裂了中華民族一脈相承的歷史，前人對南宋士大夫安於江南的逸樂，而不思規復國土，曾以：「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薰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一詩諷刺，結果南宋在逸樂的氣氛下亡國了，而且亡得很慘，今天的台灣，比諸當年的杭州，更為繁華，但是如果我們沒有規復大陸、統一中國的雄心壯志，只想立國台灣、安享逸樂，那麼南宋覆滅慘痛的史實，必將重現於今朝。因此今天李總統所肩負的不僅是台澎金馬二千萬人的安危，更擔負十一億各族中國人的興亡與榮辱，這一份責任，是何其的沉重，然而肩擔全民各族續絕存亡的責任，又是何其千載難逢的啊！

年來，蘇俄由於本身經濟狀況惡化，於是戈巴契夫對蘇俄作了某些改革，又不得不放寬對東歐各附庸國的控制，由是在東歐引起一聯串的民主化改革運動，流風所及蘇俄各加盟共和國莫不躍躍欲動，尤以中亞烏茲別克、土庫曼等五共和國，更是蓄勢待動，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外蒙古也起而效尤，衆所週知，追求民主自由的地步一旦邁出，就絕對不會停止，內外蒙古近在咫尺，中共面對這項變局，早已憂心忡忡，但是介於中亞與內外蒙之間的維吾爾族聚居的新疆，其與中亞各共和國，無論血緣、宗教、語言、習俗莫不相同，這一股追求民主的改革浪潮，正在新疆醞釀發酵，隨時都有引爆的可能；在新疆南方的西藏，早在民國四十八年三月，就已掀起反抗暴政的大羣，反抗運動雖然失敗了，然而其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却得以流亡在外，組織

流亡政府，要求獨立或高度自治，中共為之莫可奈何，尤其達賴喇嘛於去年得到諾貝爾國際和平獎之後，國際聲望更為之提高。蒙藏新疆屬於這種情勢下，隨時都有可能發生驚天動地的大變局，李總統登輝先生於三月份面對大學生在中正紀念堂靜坐時，承諾召開國是會議，研商憲政體制之改革、大陸政策之釐訂，確屬具有前瞻性的作為，但是無論憲政體制改革或是大陸政策釐訂，如果不能涵蓋蒙、藏、維三個民族及其聚居地區，則一切作為不是流於空談，必將顯得心胸狹窄，全民各族的規復大計而僅由一族來擬訂，實難見諒於歷史，也無異於對蒙、藏、維各族宣告：國家大計方針之研討，與爾等邊族無關；如此一來，不待外人之蠱惑誘煽，蒙古、西藏、新疆不走向分裂者難矣！際茲國是會議召開前夕，特籲請總統先生，肝衡全局，邀請蒙藏維族人士參加國是會議，共同研商國家大政方針應與應革事項，庶幾對歷史有所交待，也象徵登輝先生確實堪為全民各族的總統，茲值第八任總統就職之期，特撰此文，既為期盼復以為賀。

（文接22頁）

「據有關歷史記載，鮮卑文字母有千餘，遺憾的是至今仍未發現。——（同註十三）」
如布特戈其氏所言確有所本，則似乎鮮卑民族確曾創製文字，吾人寧信布特戈其氏之說必有所本，蓋以北魏在雲崗洞窟石刻所呈現之智慧，以及感染梵天佛化之深，創製拼音文字，並非不可能者，不過如以「鮮卑文字母有千餘」句以觀，顯然不屬拼音或文字，極可能與後日契丹所創造之文字相類似，吾人與布特戈其氏同感遺憾者未能發現「鮮卑文」，設若果有「鮮卑文」一旦被發現，相信對鮮卑史之研究，必有極大之助益。

蘇聯的民主改革與中共的反應

壯 悔

中國災難之由來

二十世紀發生了幾件震撼歷史的大事。第一件是在一九〇四年發生的日俄戰爭，這兩個帝國主義以我國的東北為獵物，而造就了日後日寇侵華的導火線，第二件是我國推翻了五千年的專制，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第三件是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布爾雪維克黨人於一九一七年在帝國領土上建立了世界第一個共產黨獨裁政權；第四件是由一九三七年日寇侵華戰爭而導致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合流，隨法西斯和納粹的滅亡，蘇俄帝國主義竟成為擾亂世界和平的火種，幾乎半個世界被它赤化，大戰之後，不獨東歐的許多小國，都談斯大林逼變為附庸，甚至連世界上號稱人口最多、國土也在世界位列前茅的中國，也在郭沫若等卑污賣國賊，對斯大林高喊爺爺聲中，被他改造為「老大哥」的附庸。中國大陸之淪為蘇俄帝國主義牧馬之地，實際上乃是由於盲從馬列主義和服從斯大林毛澤東錯誤思想所造成。自從十九世紀以來，資本帝國主義為了尋求市場與殖民地，中國首當其衝，成了資本帝國主義侵略的目標，同時，一般嚮往社會主義人士所操縱的第二國際，深為列寧所不滿，終於在蘇俄革命成功後，另行組織了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取而代之。並以蘇俄為大本營，以列寧為首的這般人，主張階級鬥爭，以暴力為手段，沒收私有財產，以聯合全世界無產階級，促進社會革命為目的。在政策上則以援助或解放弱小民族與國家為號召。因此許多國家的勞工群眾與知識分子，在未深切瞭解蘇俄的真正企圖下，對共產主義的欺騙手段，趨之若鶩。蘇俄亦利用這般人為各國的第五縱隊，實行內外夾攻的顛覆政策。但世界上許多資本主義最發達國家的勞工階段，因勞資關係的改善，已與馬克斯

所鼓吹的勞資衝突情形，大不相同，故起而響應蘇俄暴力革命主張，至為勘少。反之，若干落後國家在蘇俄以陰謀武力的支持下推翻其政府，進而成為蘇俄之傀儡者，卻比比皆是。東歐和非洲的若干國家和我國大陸，大致上都屬於這一類型。

蘇俄自斯大林掌權以後，實行個人崇拜，專制獨裁，和血腥屠殺，致和他同時從事革命的老黨員，被他消滅殆盡，許多鄰邦不是被他併入蘇聯版圖，便是淪為它的傀儡政權，數十年之間始終在蘇俄強大武力控制之下，一切人權自由，盡被剝奪，一切生產工具盡被共黨沒收，致實行共產主義的衆多國家，無不陷於普遍恐怖饑餓的氣氛之中，因此數十年來，馬列主義所開給人民的豐盛菜單，結果均成了泡影，被麻醉的被欺騙的和被抑壓的民衆，縱能容忍於一時，在與自由世界互相比照之下，不能不無動於衷，更不能不油然而起改革或反抗的念頭了。在溫和的、體制內的改革，不能滿足群眾的慾望時，則體制外的改革，便必然被迫付諸實行了。

斯大林死後，繼任的黑魯雪夫和布里茲涅夫等雖然也曾提出些修正和批評意見，但對內的壓榨和對外的侵略依舊，及至戈巴契夫當政，鑒於國內外情勢的轉變與需要，乃改弦更張，不再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或「世界革命」及支援第三世界的社會主義或民族主義革命，為其主要的國際義務；並不復強調馬列主義所主張之「國際主義」，而代之以完善一國的社會主義為其建設之首要目標；同時，進一步主張揚棄共產黨人的傳統「階級世界觀」，而回歸「人道主義世界觀」。

戈巴契夫的新思維

這是戈巴契夫在其所謂「新思維」中，所提到的主要觀點。他對社會主義國家間的政經關係，則認為須嚴格地建立於獨立自主的基礎上，故每一國家及每一黨都有權本諸自主原則向本國人民負責，以解決本國的政經問題，這是社會主義國家間所當遵守的一項基本原則。他還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不僅是自主的，且是多元的，故在發展同社會主義兄弟國之間的關係時，既須尊重各國的特殊利益，亦須維持各國間利益的均衡；既須鞏固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團結，又須尊重各國的民主（即自主），而團結與民主是相輔相成的。

戈巴契夫的這些主張之所以比較斯大林高明，乃是由於他已經確認了各社會主義國家間，既沒有為同兄弟國之關係，蘇俄對各國的特殊利益，也沒有得到互相尊重。同時即使各社會主義國家的本國政府和黨亦是橫行霸道，凡事既不能本諸自主的原則行事，更不會向人民負責，所謂民主會成為可望而不可及的謊言。戈氏的說辭自然有所本，他知道蘇聯所開的支票，在歷史上並沒有兌過現，他有鑒於蘇聯政經情況的惡劣，以及各社會主義國家之暗流與危機，他不得不將馬列主義的主張大打折扣。他了解到蘇聯和它屬下的社會主義政權，除了軍備一項足可與自由世界一較短長之外，其餘各方面的建設，無一可滿足人民需要，即使它夙稱強大的核子武力，充其量也祇能達到敵我同歸於盡的程度而已。因此戈巴契夫不能不幡然改圖，不再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為其主要的國際義務，而代之以完善一國的社會主義為其建設之首要目標。

戈巴契夫的新思維給蘇聯和在其影響下的東歐全體社會主義國家投出一個重新思考、尋找新內涵和新方向的啓示。蘇聯在改革內政方面將允許農民私有其耕地，人民將可擁有工廠等類的私有財產，這很明顯地是打破了馬列主義的教條，供人民貧困的生活得到初步的解放。可是久處於一黨專政，一切自由都被剝奪殆盡的東歐各國，還不以

戈巴契夫的新思維和第一屆蘇聯人民代表大會決議案中關於蘇聯內政與外交的基本方針所昭示的文字承諾為滿足。事實上，一般加盟於蘇聯的所謂盟邦，譬如波羅的海沿岸立陶宛等三小國，以及東歐的許多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實質上也無非是陪同蘇俄一起受罪的附庸而已。更露骨一點說，它們盡都是蘇俄共產帝國主義的奴役。幾十年來這些精神上披枷帶鎖的奴隸，已經被剝奪了一切自由，煎熬了一切貧窮的苦難，一旦有機會掙脫枷鎖樊籠，它們莫不毅然決然地揭竿而起，爭取自由解放。它們打破了國界的封鎖，摧毀了列寧和斯大林的銅像，取消了人民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國號，摘下了旗子上的鐮刀鐵鎚和紅星，僅稱為某某共和國，像羅馬尼亞這種極權統治的國家，獨裁者希奧塞古竟於短短數日之內，被逐下舞台槍斃，國體改變了，人民得到解放，其他如波蘭、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亞，也都先後推翻共產主義獨裁政權，而改採多黨的民主政體，甚至淪為蘇俄傀儡政權七十年之久的外蒙，也在新成立的蒙古民主黨領導之下，公開反對共黨獨裁政權，在廣大人民支持之下，蒙共政治局終於總辭，走向改革的途程。蘇聯本身，亦在戈巴契夫改革派的積極推動下，極力促請人代會進行修改憲法，以便廢除保際蘇共專政之條款。戈氏亦藉幾年來在各方面改革之成果和其當前的威望，樹立一權力強大的總統制度，以求確保並推動各方面的民主化運動及國內政經改革，衡諸他對國際間尤其歐洲在推展減免核子戰爭的危險、拆除柏林圍牆、默許波蘭東德改革的成就和在遠東方面裁減陸海空三軍力量，蘇聯的人代會對戈氏所要求的總統制度，大勢所趨，業於三月十四日以絕大多數一八一七票當選。蘇聯在二十世紀裏，以馬列主義為號召，給全世界帶來了無窮的災難，戈氏的思想與行動，似乎有從共黨獨裁與階級鬥爭迷夢中驚醒的趨勢，縱使他不能徹底成功，也還不失為一個有頭腦有覺悟的人，這也是我們看到了他的若干作為之後，對於蘇聯對外侵略的野心，不得不重新估量，這也是我們看到了他的對內對外思想方法轉變之後，不能不表示稍覺可喜的地方。

勿忘俄寇侵略的事實

可是我們在國破家亡，僑促海隅之餘，我們是否還記得俄國帝國主義對我們中國侵略的事實？在整個十九和二十世紀裏，我們的國土被它蠶食鯨吞了約四百六十餘萬方公里之多，直將我國西、北及東北盡入其包圍圈內。不但如此，它還在前清光緒三十年，亦即民前八年，爲爭奪我國東北的領土主權，與日本帝國主義在我國領土上公開作戰，雖然戰敗了，但是它的鐵蹄還一直踐踏在我吉黑兩省的土地上，中東鐵路早應歸還我國，而蘇俄政府拒不歸還，留做陰謀造反的根據地，到不得已時，連同我國主權一齊賣給了日本帝國主義，它也一直到了戈氏上台後纔放鬆了多年毫無理性地堅持——黑龍江和烏蘇里江兩條邊界河流，均以中國這邊的河岸爲疆界的主張。按照慣例，一般界河在可航行的河流中，均以主要航道的中線爲邊界，在不可航行的河流中，則以河流之中線或主要溪流之中線爲邊界。蘇俄在斯大林領導下，口稱不要別人一呎土地，也不准別人侵佔它一吋地方，而他竟敢不知耻地侵佔中國大片土地，霸佔界河權利達數世紀之久，蘇俄帝國主義的醜態，在此一端上已暴露無遺了。現在縱令它允許以界河的中線爲國界，也不能構成對我國的恩惠，我們不可忘記連黑龍江以北和烏蘇里江以東，原來都是我們的國土。

還有在民國十幾年到四十年間，舉世的共產黨或一般左傾分子，對斯大林無不奉之如神明，爲領導世界革命的偉大領袖，可是這個被人尊爲神明的偉大領袖，實與國際強盜無異。關於這方面第一個顯著的例子，是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斯大林親自派員到新疆秘密脅迫新疆省主席兼邊防督辦盛世才，接受並簽訂「租借新疆錫礦條約」，因爲該約完全屬於侵略性質，盛世才深恐曝光後發生麻煩，要求稍予修改，可是蘇方的來人說：「你一個字都不能修改，你係聯共黨員，應該服從黨的命令，更應該爲蘇聯的利益作鬥爭。就這樣作，以後你見斯大林就知道了」。

另一件充分暴露斯大林和蘇聯帝國主義本來侵略面目之事是；在雅爾達會議時斯大林向羅斯福總統要脅出兵我國東北攻擊日本之條件。其主要條件說：「(一)外蒙古，即『蒙古人民共和國』之現狀，應予維持。(二)俄國在一九〇四年以前之舊有權利，因日本狡詐的攻擊而被破壞者應予恢復；(甲)略；(乙)大連商港應國際化，蘇聯在該港之優越利益應予保全；蘇聯租借旅順口爲海軍軍港之權應予恢復；(丙)中東鐵路及通大連之南滿鐵路應由中蘇共同公司共同經營。蘇聯之優越利益應予保全……」。斯大林代表蘇聯能在雅爾達會議上，完全以沙皇帝國主義和強盜的姿態，提出這些無理要求，完全沒有把具有主權國資格之中華民國放在眼裏，實在充分地表現着強盜的分贓心理。那裏還有什麼正義觀念，在貪婪的大斯拉夫民族主義陰影籠罩下，斯大林認爲有權繼承沙皇所掠奪的一切不義之財。至於羅斯福邱吉爾之輩，更都是拿野豬還願之流，中國的犧牲損失，對於他們英美，本來就是無關痛癢的。試思，自「一九一八」之後，中華民族犧牲了億萬人的生命和難以數計的財產，血戰之餘卻不能收復失地主權，反被蘇聯這條野狼在數月之內巧取豪奪而去，中華民國在創痛之餘，固屬有苦無處訴，但蘇聯之蠻橫侵略，難道就是馬列斯大林主義的真理麼？時至今日，戈巴契夫對國內外的政策力圖改革，固值欣賞，但他的一切作爲，真能不折不扣地一反蘇聯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爲麼？

戈氏的作法是戰略的運用

我認爲戈氏的作法，僅是戰略的變化，他知道蘇聯的軍力很強，但是他也知道蘇聯對內對外都結怨很深。秘密警察的存在，剝奪了全國人民的自由，共產黨的一黨獨裁，樹立了專橫的階級制度，一般平民全都生活在恐怖與貧窮線下，可是它還要窮兵黷武，到處肆行侵略，對阿富汗的侵略，造成了數以萬計的傷殘孤寡，經濟上的損耗更遠非其國力所能負擔，所以它的政治制度和經濟組織，如果再不趁早作體制內的改革，一旦爆發，即將不可收拾。因之，他在詳審美聯內部

隱藏的重大危機之後，遂敢公開繼赫魯雪夫等人之後，公開批判斯大林在內政與外交上的荒謬行經。繼波蘭公開反共成功之後，他默許了柏林圍牆的拆除以及東歐各國風起雲湧的反共革命。蘇聯境內反共浪潮的澎湃，固非戈氏所心願，但他不能不暗自慶幸這些反共行動未搶先發動在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因而使得他尚能在表面上實行選擇西方民主制度情形下，實質上仍保留其馬列主義的招牌。

而馬克斯列寧和斯大林幽靈的繼續存在，那就隱喻着蘇聯不會完全放棄帝俄時代和斯大林以鄰為壑的侵略意圖，立陶宛宣言脫離蘇聯獨立，恢復自主獨立國家的地位，而遭到蘇聯的「立陶宛獨立無效」的宣布並繼之以武力鎮壓的恫嚇。由這些跡象看，戈巴契夫之所以奮力改革，其目的在政治上是緩和內外的壓力，另以新形象出現，在經濟上則想根據這去主管農業的經驗，以挽救其江河日下的農業生產情形，而供民衆粗得溫飽，並藉以提高其超級強國在國際間的形象。在他的初步嘗試階段，他想把多年來貪污腐敗做威作福的黨官作風徹底掃除淨盡，同時也希望把西方的市場制度，引進於蘇聯的經濟體制之內。他不是想徹底摧毀蘇聯的共產主義結構，他還自稱他是真正共產主義信徒，全心信奉主義的共產黨員，他認為共產主義不是幻想，而是他的最重要目標。

由他這些自白來看，他的信念和立場是已經很明顯的了。他知道共黨官吏貪污橫行，自斯大林時代起，有關蘇聯成就的宣傳辭令絕大多數都是出自虛構，但是他能公開指摘出來，供人批評檢討，尋出改革的途徑，在這一點上他仍不失為一個具有魄力的政治家和追求理想的信徒。至於他所追求的理想是否正確，所使用的方法究竟如何，那還有待事實的考驗了。我們看到蘇聯最近忽爾派傘兵佔領立陶宛的政府機構，令坦克車在街市示威，忽爾又封鎖立陶宛和波蘭之間的唯一通道。同時蘇聯國會於四月三日快速地通過蘇聯分離法。明定境內十五共和國如欲脫離蘇聯，必須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複決民意支持，亦必須在其後的五年中，靜待蘇聯與共和國磋商。在過渡期結束前，共和

國應舉行另外一次複決，以肯定最初的複決結果。為初次複決未獲三分之二以上人民通過，十年內不得再次複決。

當天蘇聯國會還通過了授予蘇聯總統廣泛權力的法案，條文明定總統，如共和國國會及自治區。在發生天然災害、工業災害、時疫或群眾暴動時，得宣佈實施緊急狀態。根據緊急條款，政府有權限制出入境、沒收武器、禁止集會、示威、罷工及實施新開檢查。如果緊急法還不能控制局勢，蘇聯總統有權實施直接總統統治。

蘇聯國會之所以快速地通過這兩項法案，究其實際，端在恐處理立陶宛獨立問題時失去時效。同時從法案條文所訂對複決人民數量百分比及期間長短之限制，處處均足以表示與斯大林時代所宣傳之自由加盟或退盟之情形完全不符。戈氏的真面目至此已躍然紙上，無待贅言。說句老實話，當年斯大林吞下去的，今天戈巴契夫還是毫不放鬆，立陶宛等三小國是蘇聯在波羅的海方面的屏障，它的港口，都是蘇聯海軍對外活動的根據地，蘇聯不能沒有它，怎能失去它？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蘇俄紅軍進入外蒙，幾名喇嘛蒙奸與蘇軍勾結宣布獨立以來，迄今幾垂七十年，這個舉動大大違悖了民意，因為它在蘇聯共黨導演下實行了唯物論的共產主義，禁止宗教信仰自由，東列寧斯大林如神明，且不准提起蒙古民族英雄成吉思汗的名字。現在隨着戈氏開放政策的進展和部分俄軍的撤退，民主改革力量驟然抬頭，在不到半年時間，它以和平而理智的步伐，完成了許多具體的改革，尤其是推翻共黨獨裁制度，並未發生像羅馬尼亞一樣的流血政變。但人民已在其間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幸福。這種空前的民主進展，給予其鄰邦中共政權的鉅大影響，真可說是無與倫比。

從歷史上看，蒙古是中國的一個正統王朝，從二十世紀的政治和軍事戰略地位觀點言，它對中蘇兩國的關係都極為重大，蘇俄掌握它是為的保障經西伯利亞東向的勢力不被阻斷，中國失去了它，北方的國防線便失去了屏除和緩衝，但是由於蘇蒙雙方實力的對比，外蒙顯然在實質上已淪為蘇俄的附庸，如今它正在走向自由自主之路，目睹

這種發展情形的中共，實在不能無動於衷。它對蘇聯由外蒙撤軍，而逐漸演變成今日的情狀，雖未明白表示感謝，可是就雙方同時自邊界撤軍達成協議一事感到滿意。

中共對蘇聯放棄一黨專政等內部改革，雖在黨內仍持嚴厲批評態度，惟對蘇聯就立陶宛等國獨立運動所採取的強硬立場，則表示完全支持。這是因為它深恐蘇聯境內的塔吉克、烏孜別克，甚至立陶宛等國的分離運動造成範例，影響到新疆西藏等地的民族分離運動。其實蘇聯鄰近新疆的民族分離運動和民主改革浪潮，其終極必然影響到新疆內部的騷動與不安，原因在於他們種族接近。宗教信仰相同，同樣受共產黨的壓制和剝削。縱使沒有戈巴契夫的提倡改革，他們的滿懷鬱悶，也是要找機會發洩的，如今歐亞各具有民族主義傾向的國家，紛紛謀求脫離蘇聯的淫威統治，自屬意料中事。

不過像最近發生於新疆喀什的事件，其內容恐更複雜。譬如民國三十四、五年蘇聯境內的回教軍隊，挾其陸空優勢裝備入侵伊犁區，直抵綏來縣境，很明顯那是俄帝運用武力協助中共，以迫使國民政府讓步，民國二十一、三年在喀什所發生的「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受亂，純屬狹義民族主義分子之煽動而起。最近喀什內部的變亂，則由於中共官僚的貪污腐化，漠視教育，不顧民生疾苦，尤其多年以來，共產黨員及其軍隊，經常以其唯物主義的立場，對回教發抒其謬誤且帶有侮辱性的偏見。殊不知回教之所以為回教，乃是因為它有它的高尚宗教哲學，凡屬回教信徒無不奉可蘭經的話語為金科玉律。事實上，即使你不信回教，也殊無理由去反對他人的宗教信仰，何況更出言誣譏，侵害他人的正當信仰自由，甚至使用下流手段橫加侮辱，自然容易引起回教群眾反感，造成民族間的激烈衝突。中共在邊疆地區，不思多以建設成果代替宣傳。祇想以高壓手段遏殺人民渴望民主自由的要求，這實在確切表現着共產黨的殘酷而又喪失人性的一面。據說文革期間，雲南省某縣共軍，為了表示「不信邪」，故意在回教清真寺內用大鍋煮豬肉，用以戲謔回民，不期竟因此而激發民憤，群起反抗，終至演成極大屠村悲劇。此次新疆喀什之事變，根據迪化電視台報告，暴動係四月五、六兩日發生於克孜勒蘇柯爾柯孜自治州的阿克陶縣

。據傳亦係由於共黨和警察禁止吉爾吉斯族人建築清真寺所引起。由此可見中共空有所謂民族政策，在他們沒有放棄馬列主義信仰以前，對一般宗教，尤其是回教的摧殘與壓迫是不會停止的。

瞻望蘇聯境內回教國家為爭取宗教自由、及對共黨獨裁所作的運動，勢必影響到新疆境內信奉回教的許多民族。溯自民國二十二年以還，新疆因為金主席樹仁對哈密地方的土地問題措置失當，引起回族反抗，終導致甘肅回族軍人馬仲英率軍大舉入侵，演成全疆糜亂，殺人盈城盈野。盛世才雖恃蘇聯力量獲得一時苟安，然喪盡國家主權，淪為蘇聯的次殖民地與奴隸，在蘇聯勒索稍不如意之時，則在沿邊各處隨時鼓動變亂，甚至假東土耳其斯坦軍名義大舉入侵。此次新疆南部各城市之警民衝突，總亦難免是反抗共黨獨裁、爭取宗教自由，以及各民族在主觀與客觀上，環繞意識形態之爭。中共深憂這種風潮擴大，難以遏阻，及見天安門慘案發生之後，世界各國無不大張撻伐之時，惟蘇聯默不作聲似在表示同情，中共感激之餘，引為知己，遂也以贊同蘇聯的壓制行為為回教。像這種露骨諂媚沉湎一氣的唱和，自戈巴契夫來說，自然有些深獲我心的感覺，而自中共方面不來說是，正有些事大主義的流風餘韻仍殘留於他們的作法之中嗎？所謂同惡相濟者，庶幾近之。

結 論

由於戈巴契夫的民主改革，至少給歐亞兩洲的許多國家帶來了新希望，減輕了壓力，多年以來困於共黨淫威之下的國家民族，等於是暫時鬆了綁，擺脫了頸項上與手足上的枷鎖，可是久繫之囚，手足雖經解放，但仍是麻木的，家人親友失散了，經濟混亂不可收拾，自己對眼前的環境既無充分控制的能力，對於以前的奴隸主是否仍會受卦，也是毫無信心。不過民主與自由的遠景太令人憧憬了，大家都會覺悟到，機會難得，在這千載一時的良機，自己不起來奮鬥，怎可得到旁人的援助？波蘭經過七、八年的奮鬥終有今天的成就，東歐的許多國家，也多在缺衣少食之中，死裏求生，所可慶幸的是，雖經過七十乃至四十年長期的洗腦與愚弄，各國人民對祖國的忠愛仍不稍減，對宗

教的信仰依舊堅定。一個國家和民族雖歷經顛覆，如果不忘祖先的傳統精神，終必能夠復興起來的。

我們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現在大致已算站起來了，在大多數省份裏，民族成分縱有多寡之分，但依憲法之規定其地位是平等的。至於宗教之分佈，西北多屬回教，蒙古與西藏多屬佛教，中原各省各種宗教雜處，依法信仰完全自由，並無任何限制。

自中共政權成立以來，硬仿蘇聯制度，將邊疆省份劃為若干民族自治區，名稱繁複，區劃錯雜，因對宗教限制甚嚴，故糾紛時起，甚至與民族仇恨糾結不清，再經外力引誘與刺激遂至一發而不可收拾。今日新疆之動盪，因消息封鎖，真相難明，但如無動亂則已，如召動亂，則必為其黨的暴政所造成。改變意識形態，亡羊補牢非中共所能，如以武力征服，亦唯召治絲益勞，徒增仇恨，依目前情形看，蘇聯或不致插手其間，但新疆地下之寶藏為中華民族之生命線，且為建國之所必需。久為蘇聯所垂涎。中華民族如能共同團結，保此基業，則千年萬世永享遐福。此惟有期諸明智之士的深謀遠慮，方克有濟，倘始終以無產階級無祖國的馬列教條來迷惑群眾，則鄰近中亞的大片國土，猶不能饜足蘇聯的貪慾，則中國豈復有生存的希望？言念及此，實不禁為邊疆同胞的生活前途憂。君不見蘇聯及東歐各國於宗教禁令開放後，慶祝四十年來第一次耶穌復活節時的狂歡，足徵多年來抑壓於民衆心靈深處的鬱悶該有多深！所可慮者，野心分子時假「東土耳其斯坦」之名以陰圖分裂國土之實為不可不防也。

西藏問題之難於解決，多半亦在西藏人民所信仰的宗教與寺廟橫遭摧殘，且毫無放鬆的跡象。共產黨認為「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必須剷除，但人民視之如生命，虔誠的信仰亦未見得有害，列寧和斯大林亘七十年的暴力摧殘，不但未能解決人民生活上的需要，更未能滿足人民心靈的空虛，中共於拚命摧殘藏胞的宗教信仰而始終不能收效時，何不稍加反省共產暴政的缺失，而力加改善？平心而論，共黨對馬列主義的信仰與對宗教的信仰有何不同？如果馬列主義真能救世，那麼，率先實行共產主義達七十餘年之久的蘇聯，為何經濟瀕臨崩潰？中國大陸實施共產主義四十年，殺人無數，徹底搗毀了五千年來祖

先所遺留下來的精神和物質文明，為何竟造成了今天這樣一窮二白，民不聊生？戈巴契夫口稱還是信仰共產主義，但是他已准許人民信仰宗教，他已取消共黨一黨專政制度，他也曾於正視未來時勇敢地承認：「改造社會所依賴的就是社會主義建設人道、自由、理性社會這個理想所具有的龐大智慧與精神潛力」，可惜這種龐大智慧與精神潛力，都正是中共所缺乏，可也正是戈巴契夫所在嘗試走向的道路。

天安門六四慘案中，學生、市民、工農們所要爭取的，無非是人道、自由與理性社會，可是結果這個「請願」「示威」的人們，不但永遠失去了自由，卻更遭到了非人道和非理性慘絕人寰的殘酷待遇，戈巴契夫對待立陶宛，還能守「在蘇聯發生歷史性變革的時刻，他將避免使用暴力」的誓言，而鄧小平、李鵬一夥人則深自慶幸地說：「如果當時不這樣鎮壓，今天我們還能坐在這裏麼」。這絕是中共老老實實的真心話。由李鵬最近與戈巴契夫會談看中共的動向，它表現著對天安門的血腥屠殺沾沾自喜。於是在「四個堅持」之外，更增加了一個「堅持」，那就是「強力鎮壓」，或「將一切暴亂消滅於萌芽階段，絕不姑息。」

馬列主義給中蘇兩國造成很大災宕，也遺留下很多難題。戈巴契夫能在惡魔斯大林死亡之後，力圖消弭他所造成的罪愆，無論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皆盡力改革，予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並進而減輕了東西方軍事衝突的危機，馴致影響東歐各國一連串的反共民主風潮，雖然在其處理立陶宛等問題上，仍未能盡為人意，但大體上還是一個帶有瑕疵的可喜的現象，至於中共，自去年六四天安門大屠殺以來，其窮兇極惡的思想行為，不但毫無悔改，且百般掩飾其罪行，談過於愛國的群眾，其思想之固陋、言行之狂妄，實令人切齒扼腕。全世界的自由民主和正義力量，如再不及時施以嚴厲制裁，則養癰貽患，誠足為全世界爭民主爭自由之前途憂也。

六四天安門大屠殺慘案的週年祭轉瞬將屆，血濺天安門廣場的萬千英魂，正向祖國的天空哭泣，到何時北平終能不見瀾天的風沙，重新出現祥和的天氣！

鮮卑早期事略

劉學鈔

從「鮮卑源流」一文，可知鮮卑民族其源遠流長，實不亞於華夏，但其踏上亞洲政治舞台，則較匈奴爲晚，不過鮮卑民族所建立之政權，較匈奴爲多，其中北魏且曾統治中原，創立典章制度，與中原漢族姻婭交通，啓隋唐盛世之先河，鮮卑史自有一探之價值，早期鮮卑史事，求之於兩漢書、三國志、魏書、北史等文獻，每覺史料雖多，但亂而無章，實有加以爬梳整理之必要。

檢閱史冊所載，鮮卑諸政權之建立，與匈奴諸政權絕大不同，蓋匈奴諸政權名位之獲得，皆係來自本身之武力凝聚發展而成，如匈奴自冒頓單于以下諸單于，憑藉本身武力而與漢廷對峙，其名位皆無需藉助漢廷，縱然晚至五胡列國時期，匈奴族所建諸政權，其名位之來源，皆非出於中原漢族政權之付予，此點誠如匈奴石勒曾稱：

「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爾所呼耶！」（註一）

鮮卑民族諸政權名位之獲得則異於是，其名位之獲得始自猗盧之受封爲代公，而後始演化爲（北）魏，卒能統一北方十六國之亂局，此爲鮮卑與匈奴最大不同之處，因此鮮卑早期史事實有予以探討之必要，所幸民國六十九年鮮卑石室發現後，其早期諸項傳說，因而得到確認，鮮卑石室自應酌爲介紹；復次，鮮卑既源於大興安嶺北段東側，何以五胡列國時期鮮卑民族遍佈於今長城內外，其遷徙及分佈情況，亦有加以瞭解之必要；至於其早期習俗與語文，亦擬在本文之中略加探討。

註一：請參見崔鴻所撰「十六國春秋」前趙錄葉二，民國五十年三月，台灣中華書局發行。

五年三月，台灣中華書局發行。

壹、鮮卑石室

魏書卷一百列傳八十八「烏洛侯」傳載有：

「烏洛侯國在地豆干之北，去代都四千五百餘里，……世祖眞君

四年來朝，稱其西北有國家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民多祈請，世祖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於室之壁而還。」

按北魏世祖爲拓拔燾，諡太武帝，眞君四年（西元四四三年）始聞鮮卑族源起之石室，並派中書侍郎李敞前往告祭並刻祝文於壁而還，經再檢閱魏書卷一百八禮志一，載有此項祝文，該項祝文爲：

「天子燾謹遣敞等，用駿足一元大武，敢昭告于皇天之靈，自啓闢之初，祐我皇祖，于彼土田，歷載億年，聿來南遷，惟祖惟父，光宅中原，克剪凶醜，拓定四邊，冲人纂業，德聲弗彰，豈謂幽遐，稽首來王，具知舊廟，弗毀弗王，悠悠之懷，希仰餘光，王業之興，起自皇祖，綿綿瓜瓞，時惟多祐，敢以丕幼，配饗于天，子子孫孫，福祿永延。」

自烏洛侯使者告以有「鮮卑石室」之事，至北魏太武帝拓拔燾遣李敞前往告祭並刊刻祝文一節，證明確有石室之存在，然則自李敞前往告祭及刊祝文之後，對於石室未再聞詞，其後由於時更勢易，對於石室之是否存在，遂成爲千古之謎，惟由於魏書之記載確鑿，近代史家咸認爲應有石室其事，惟以年代久遠，埋沒於荒漫草中，不知所之而已，遂各憑史料所載，紛加推測石室之所在；如何秋濤氏於其所撰「朔方備乘」一「尼布楚城考」一文中稱：

「魏之先祖石室，……當在尼布楚城正西之地。」

何秋濤氏之所以認定石室在尼布楚城正西者，蓋受「清文獻通考、四裔考」，誤將烏洛侯改爲烏洛侯，遂將烏洛侯與俄羅斯混爲一談，再以魏書烏洛侯傳所稱：「其西北有國家先帝舊墟石室」，乃有此誤，誠所謂失之毫末，差之千里者也。丁謙氏於其所撰「魏書外國傳地理考證，烏洛侯」文中認爲：

「魏先帝石帝在（貝加爾）湖南濱。」

丁謙氏爲近代知名之地理考據學者，惜乎對於此項考證，欠缺有力證據，以致在地望上相差太多。此外，日人白鳥庫吉氏亦於其所著「東胡民族考」一書中先行考定魏書中之烏洛侯，即舊唐書「室韋傳」之「烏羅護部」，且同書「烏羅渾國傳」即直云：「烏羅渾國，蓋後魏之烏洛侯，今亦謂之烏羅護。」於是考定烏洛侯在今嫩江流域，進而認定鮮卑石室在：

「烏洛侯國之所在地，既在今嫩江流域，則烏洛侯國西北部之托拔氏祖先之石室，亦必在嫩江流域之中，而當在興安嶺之近傍。而托拔氏之原住地，亦必在此方面內，蓋亦甚明。」（註二）

白鳥氏之考證頗爲嚴謹，因此所得之推論，與後日發現之鮮卑石室，在地望上頗爲接近。另有近人馬長壽氏，爲當代大陸研究鮮卑史之權威，渠在其所著「烏桓與鮮卑」一書第四章「拓拔鮮卑，一、拓拔鮮卑的起源和遷徙」一節中，更進一步考證鮮卑石室之位爲：

「魏始祖的石室既在烏洛侯國的西北，故知烏洛侯國的方位便可求得石室之所在。同傳（按指魏書烏洛侯傳）云：『其國西北有完水，東北流合于難水，其地小水皆注于難水，東入于海。』完水，唐書稱室建河，即今之額爾古納河，難水即唐書中之那河，今稱黑龍江。然則烏洛侯在今黑龍江省之嫩江流域甚明。嫩江流域的西北爲額爾古納河，魏之祖先的石室當在二河之間的大興安嶺山脈之內。魏書、帝紀、序紀云：『國有大鮮卑山』，此大鮮卑山當在今之大興安嶺的北段。又云：始均『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此弱水即今之嫩江。嫩江西北，額爾古納河東南自爲蒙古兀室韋的所居地，蒙古室韋即蒙古族的祖先，而拓拔鮮卑亦起源於此，所以從地域分布言之，拓拔鮮卑原來的語言和蒙古兀室韋應當是相互接近的。」

馬長壽氏之考證，乃奠基於白鳥庫吉之考證上，因此更爲確切，與後日所發現之鮮卑石室實址，幾不謀而合，然而在未發現鮮卑石室之前

，各家之考證，僅能視爲推測之說而已，不過無論如何，鮮卑石室對於鮮卑早期歷史，具有關鍵性之作用，自不待言，若鮮卑石室能夠發現，則魏書中之若干記載得以印證，其重要性於焉可知。

民國六十九年（西元一九八〇年）七月三十日，由大陸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盟文物管理站，由米文平在鄂倫春自治旗境內之嘎仙洞發現一千五百餘年前，魏書所記載之鮮卑石室。查此石室位于大興安嶺北段頂嶺之東麓，屬嫩江西岸支流甘河之上源，位屬北緯五十五度三十八分，東經一二三度三十六分；曾隨發現者米文平入洞實地考察之陳連開氏，曾撰「鮮卑史研究的一座豐碑」一文，報導此石室之實況，陳氏稱：

「『魏書』所說祖廟石室，并非一座雄偉的石砌建築，而是一座天然洞窟，其規模之大，與『魏書、烏洛侯傳』記載相合，完全具備祖廟的神聖威嚴。」

令人仔細揣摩的是，洞窟前半部兩壁，自底綫到上綫約兩米高的壁面，有經過修琢的痕迹。此修琢面自洞口直到幾十米深處。洞窟中央那一塊被群衆稱爲『石桌』的巨型石板，顯然是人工放置，與東北其他地區的發現比較，可能與早期墓葬有關。……祝辭刻在『大廳』西壁上，距洞口十五米。刊文處尤其平整，是李儼致祭時經過再修琢磨平刊刻於壁的。……值得注意的是，對照『魏書、禮志』著錄的祝辭，略有幾處差異，證明魏收著錄時已略加文飾，個別則是有意篡改。」（註三）

註二：請參見白鳥庫吉氏所著「東胡民族考」方壯猷譯本葉一二六至一二七。民國二十三年九月，上海商印書館發行

註三：該文刊載於「民族研究」雙月刊，一九八二年第六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北京」報刊發行局總發行。

刊於石室西壁上祝文，與「魏書、禮志」上所載者，確有若干處不同

，其原因亦如陳連開氏所言，係修魏書之魏收，基於修魏書時之政治考量，因此略加文飾，或刻意篡改，按石刻之祝文爲：

「維太平眞君四年癸未七月廿五日，天子臣燾使謁者僕射庫六官、中書侍郎李敞傳匱用駿足一元大武，柔毛之牲，敢昭告于皇天之神，啓闢之初，佑我皇祖，于彼土田，歷載億年，聿來南遷，應受多福，光宅中原，惟祖惟父，拓定四邊，慶流后胤，延及沖人，闡揚玄風，增構崇堂，剋擄凶醜，咸暨四荒，幽人忘遐，稽首來王，始聞舊墟，爰在彼方，悠悠之懷，希仰餘光，王業之興，起自皇祖，綿綿瓜瓞，時惟多祜，歸以謝施，推以配天，子子孫孫，福祿永延，荐于皇皇帝天、皇皇后土，皇祖先可寒配、皇祖先可敦配，尚饗。」（註四）

從刻於石壁之祝文與魏書禮志所著錄者，比較觀之，其較顯著不同之處，約有下列幾點：

- 一、石壁祝文首行爲「維太平眞君四年癸未歲七月廿五日」，魏書禮志無此句，想此係魏書已將此事繫於眞君四年，故省此句。
- 二、石壁祝文稱「天子臣燾使謁者僕射庫六官、中書侍郎李敞……」，魏書作「天子燾使敞等……」，魏書無「臣」字，此或係魏書疏漏，但與體制不合；魏書無「謁者庫六官」句，此或因謁者僕射之職位在中書侍郎之下，又或因「庫六官」其人以後受黜，故魏書不列，而石壁之所以將庫六官列於李敞之前者，顯以前者爲鮮卑族之故。
- 三、石壁祝文之「延及沖人，闡揚玄風，增構崇堂」句，魏書改爲「沖人纂業，德聲弗彰」，此蓋北魏在太武帝時，於崔浩等之支持下，滅佛崇道，並以道教爲國教，故書「闡揚玄風，增構崇堂」，但魏收修魏書時，爲北齊高洋當政，高洋崇佛滅道，故在魏書中改書爲「沖人纂業，德聲弗彰」。
- 四、石壁祝文最後有「皇祖先可寒配，皇祖先可敦配」句，魏書無，從此可知此魏太武帝時，雖已採中原禮俗，但仍未除鮮卑舊

習，至魏收修史時，顯然已全盤華化，故刪「可寒、可敦」稱謂。

註四：此項石壁祝文，係錄自康樂氏所撰「鮮卑石室的發現」一文，文載「歷史」月刊第五期，七十七年六月，台北「歷史月刊雜誌社」發行。

嘎仙洞鮮卑石室，除發石壁祝文外，呼倫貝爾盟文物管理站，基於考古之需要，曾進行挖掘工作，結果發現有相當厚之堆積，在洞口處挖一條一公尺寬、二十公尺長之排水溝，在表土以下至八十公分深處爲黑色粘沙土，在其掘出頗多手製夾砂灰褐陶器，尚有骨鏃、石鏃等；自陶器之形制與加工工藝方面觀察，與完工、札賚諾爾鮮卑墓葬所發現者，有相似之文化特徵，惟更具原始性；在地表以下一公尺三十公分處，爲黃色黏土帶，又掘出打製之石器，明白顯示此處在極早期即曾爲人類所居住（註五），是則斷定嘎仙洞鮮卑石室爲鮮卑民族之發源地。當屬信而有徵之論，而鮮卑族視附近之大興安嶺爲大鮮卑山（神山或祥瑞山），亦應爲合理之推論。

註五：此處所述各項資料，請參見朱文平氏所撰「鮮卑石室的發現與初步研究」一文，文載大陸「文物」月刊，一九八一年第二期。

貳、鮮卑族之遷徙與分佈

鮮卑族源於大興安嶺北段東側嘎仙洞之鮮卑石室，大致已是定論，但絕不等於鮮卑族僅在大興安嶺北段活動，據兩漢書、三國志等史傳所載，無論鮮卑或烏桓，皆爲東胡之族，復據三國志引魏書稱其生機類型爲：「俗善騎射，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可知其採游牧方式生活，故其活動範圍極大，其活動方向自然朝水草豐美、氣候溫暖之處行進，按嘎仙洞附近之大興安嶺北段，所處緯度約爲北緯五十度三十八分，屬高緯度地帶，秋冬氣候奇寒，因此游牧遷徙方向，自然向南方行進，大致可以推定其最初遷徙方向沿大興安嶺南下，散佈於

嫩江、海拉爾河流域，據魏書「序紀」所載：

「國有大鮮卑山，因為號，其後世為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畜牧遷徙，射獵為業，……積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諱毛立，……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

足證鮮卑族自發源起始，經六十七世（約一千五、六百年，每世以二十五年計），至毛時，已統國三十六，大姓且得九十九之多，如此龐大之族群，自需向外擴散。自毛再五傳至魏書序紀所稱之宣皇帝推寅時，魏書明載：

「宣皇帝諱推寅立，南遷大澤，方千餘里，厥土昏冥沮洳，謀更南徙，未行而崩。」

此處已明指鮮卑族遷徙方向為「南遷」，其所到達之處為「大澤」，此處方千餘里，地理狀況為「厥土昏冥沮洳」，並非最理想之游獵地區，遂與「謀更南徙」之想法，借乎「未行而崩」；因此瞭解鮮卑族在有計畫之南遷下，其所到達之「大澤」，為今之何地，當可知其遷徙之方向，詳審我國東北地區地理狀況，能合於既有「大澤」，又能「方千餘里」之地理條件者，似僅有呼倫池、貝爾池一帶地區。山海經「海內西經」及「大荒北經」分別載有：

「東胡在大澤東，夷人在東胡東……」（海內西經）

「有大澤，方千里，群鳥所解。」（大荒北經）

「大荒北經」所謂「群鳥所解」之「解」，係指每年春季鳥類解脫羽毛之謂也，而呼倫池畔每當春回大地之時，南雁北來脫毛換羽，抱窩孵化，成千上萬之大雁，此時皆因翅膀脫羽無法起飛，僅能在沼澤、草叢中浮游，此景在呼倫池東南岸邊之烏蘭泡沼澤地帶習以為常（註六），因此可以斷定鮮卑推寅率領族人南遷，其所到之大澤，即今之呼倫池一帶地方，但由於呼倫池一帶地方，並非理想之地，更欲南遷，惜乎壯志未酬，而已身已崩。

註六：請參見袁珂氏所撰：「山海經校注」，但此處係轉引自朱文平氏所撰之「鮮卑石室所關諸地理問題」一文，文

載「民族研究」雙月刊一九八二年第四期，出版及發行處所見註三。

自推寅南遷大澤之後，依魏書帝紀序紀所載，再七傳至獻皇帝鄰時「有神人言於國曰，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復徙居」。當時鄰因年已衰老，遂授位於子，使其率族遷徙；鄰之子為詰汾，即魏書所稱之聖武皇帝，詰汾既獲父命，遂率族南遷，翻山越嶺，涉水渡河，歷經艱險，據魏書帝紀序紀載。

「聖武皇帝諱詰汾，獻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於是欲止，有神獸其形似馬，其聲類牛，先行導引，歷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

此段史料言鮮卑族遷徙之艱辛，並附會以神話言「有神獸其形似馬，其聲類牛，先行導引」於是歷年乃出，如前所推斷之大澤為呼倫池，至是經一年之行走，始開呼倫池一帶地方，至於其所稱之神獸，頃亦經人考證即曩所不解之「鮮卑郭落」，如今人于志取暨孫秀仁兩氏所合撰之「關於鮮卑早期歷史及其考古遺存的幾個問題」一文，即稱：

「獻帝鄰命詰汾南徙，『有神獸，其形似馬，其聲類牛，先行導引，歷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這種類馬、類牛，而又非馬、非牛的動物即是『鮮卑郭落』」（註七）

該文更進一步考正與推論後，認定：「據此我們認為『鮮卑郭落』正是馴鹿。」（同註七資料），詰汾率鮮卑族南徙之事，至是已無神話成份，應視為信史，然則詰汾又係何時之人，其始居匈奴故地，是否與匈奴盛衰之史實脗合，仍應作進一步之探討。

註七：該文載「民族研究」雙月刊一九八二年第一期，出版及發行處所見註三。

按魏書帝紀序紀末載詰汾生祖年月日，無法直接瞭解詰汾之年代，然魏書明載詰汾之子為「始祖神元皇帝」力微，並指明力微嗣立之元年「歲在庚子」，同書帝紀序紀又言力微立之「四十二年遣子文帝如魏，且觀風土，魏景元二年也。」查曹魏元帝年號為景元，景元二年

爲西元二六一年，歲在乙巳，向前推四十二年（西元二二〇年），恰爲歲在庚子，與魏書所載完全相符，是年爲曹魏文帝黃初元年，詰汾之年齡大於其子，應屬必然，據魏書載力微享國五十八年，年壽爲一百零四歲，則力微嗣位之年爲四十六歲，如是則詰汾生力微之年應爲庚子之前四十六年，經推算應爲東漢靈帝熹平四年（西元一七五年），亦即詰汾在東漢熹平四年生力微，是時詰汾如以二十歲計，則詰汾當生於東漢桓帝永壽二年（西元一五六年），因此詰汾之南遷匈奴之故地，極可能在東漢永壽二年至靈帝熹平四年（西元一五六年至一七五年）之間。

至於其南遷匈奴之故地，亦有一探之必要，所謂匈奴故地究在何處，歷來學者各有主張而不一其說，如大陸出版之「中國古代北方各族簡史」一書葉四，即認爲匈奴故地在河套陰山一帶；丁謙氏於其所撰「漢書匈奴傳地理考證」一文中，則認爲匈奴爲夏后氏之苗裔，原先居住中原，後來始行北遷，因此匈奴故地乃指中原而言；大陸出版之「民族史論叢」一書葉三〇四至三〇五，則認爲匈奴故地在漠北，而後始行南遷；另有大陸淪陷以前鄭師許氏於其所撰「匈奴先世鬼方險狃與殷周之交涉」一文中，則認爲匈奴原爲西方之游牧民族，至秦漢時始游蕩東徙，出現在中國北方，因此蒙古故地應指西方（註八）；此等說法如經詳細推敲，不無可議之處，經參考有關史料後，應以舒順林氏於其所撰之「匈奴故地」初探一文，認爲匈奴故地應爲河套陰山一帶地方，舒氏於該文中稱：

「總之，無論從匈奴民族誕生或興起的歷史搖籃來看，或是從頭曼、冒頓單于的單于庭即匈奴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來看，或是從出土文物來看，亦或是從後來史書記載的匈奴故地來看，我們認爲匈奴的發祥地、匈奴的原始牧地即匈奴故地，就在河套陰山。」（見註八）

因此可以確定鮮卑族於東漢桓、靈之間自呼倫池一帶地方，遷往河套陰山地區。

註八：「中國古代北方各族簡史」一書，一九七九年，「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民族史論叢」一書，一九八〇年十月，「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匈奴先世鬼方險狃與殷周之交涉」一文，載於民國二十三年，中山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集刊」第一期。以上諸資料係轉引自舒順林氏所撰「匈奴故地」初探一文，該文刊載「內蒙古社會科學」一九八三年第一期，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出版，理合註明。

以上所述者，僅爲魏書帝紀序紀所載之拓拔鮮卑部份遷徙概況，同書既載「至成皇帝諱毛立，……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足證鮮卑族至毛之時，已有甚多之部落，拓拔氏之外，必有其他部落或沿大興安嶺南下，或沿其他路線遷徙，惟以文獻無徵，無從臆測，與其濫也，寧缺。

至魏、晉之交，鮮卑民族已遍佈長城內外，茲將各地鮮卑族分布情況，分別加以敘述。

一、陝西關中地區

關中地區原爲華夏民族文化發源地之一，自古以來即爲華夏民族及其後漢族之主要聚居區（註九），然則自東漢李氏以來，即有頗多漢族以外之諸邊疆民族進入關中地區，至魏晉之時，情形已頗爲嚴重，如資治通鑑卷八十六「晉紀八」「惠帝光熙元年」五月載有：

「五月，壬辰，（祁）弘等擊（彭）隨、（刁）默，大破之，遂西入關，……弘等入長安，所部鮮卑大掠，殺二萬餘人，百官奔散，入山中，拾橡實食之。」（註十）

按祁弘原爲王浚之部將，所部多爲鮮卑、烏桓；而晉惠帝光熙元年乃西元三〇六年，其時祁弘以所部鮮卑兵，能掠殺二萬餘人，鮮卑兵當不在少數，是則鮮卑老弱婦女，自當數倍於鮮卑兵，此乃理所當然者，是足證祁弘之轄地，必有更多之鮮卑部族；至於鮮卑族大批遷入關中長安、咸陽等地，則係隨匈奴劉聰攻關中之時。

註九：所謂漢族云者，實應包含華夏系、東夷系、荊吳系及百

越系，詳情請參見胡耐安師所著「中國民族志」一書，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註十：此處所用之版本為台灣世界書局印行之「新校資通鑑註」。

其後匈奴劉曜、石勒、石虎等所部軍隊中，鮮卑兵佔有頗大數量，如晉成帝咸和八年（西元三三三年），石勒死後，其部將石生坐鎮關中，起兵反石虎，石虎進攻長安，石生遣將軍郭權率鮮卑涉瓚部衆二萬爲前鋒拒之，如資治通鑑卷九十五「晉紀十七」載此事爲：

「（石）生遣將軍郭權帥鮮卑涉瓚衆二萬爲前鋒以拒之。」

是又足證鮮卑族入居關中之多，其後五年，晉成帝咸康四年（西元三三八）年，匈奴石虎伐遼西鮮卑段遼後，「乃遷其戶二萬餘于雍、司、交、豫四州之地」（見晉書卷一百六「石季龍載記」），而雍州者，即關中之地，遷鮮卑二萬餘戶，每戶姑以五人計，當有十萬人之多，亦可見當時關中鮮卑族之多。

二、隴山以東地區

此一地區在關中以西，六盤山以東，約爲今甘肅省東部近陝西省一帶地方，自古即爲中原地方，亦爲華夏民族聚居地區，然自兩漢魏晉以來，匈奴、鮮卑諸族漸次移入，茲就鮮卑部份之移住情形，略加敘述。

鮮卑族入居隴山以東地區者，或以其所居住之地方加以區別，如居於朔方者稱朔方鮮卑，或以部落名稱之，如薛千部則稱薛千鮮卑，現就資料所及分敘如下：

（一）朔方鮮卑：按五胡列國時期，朔方地當今河套南岸，亦即綏遠包頭以南，此地當陰山之南，歷來水草豐，農牧兩宜，鮮卑族之徙入此地，據資治通鑑卷九十一「晉元帝太興二年」載有：

「石勒遣石虎繫鮮卑日六延於朔方，大破之，斬首二萬級，俘虜三萬餘人。」

按晉元帝太興二年係西元三一九年，當年石虎斬殺及俘獲之鮮卑族人，多達五萬餘人，其未見殺及被俘者，自當更多倍於此數，可見四世紀二十年代時，朔方一帶鮮卑族人之多，晉書卷一百四「石勒載記」，稱此部鮮卑爲「河西鮮卑」，此蓋朔方在河套之西也。

十九年之後，亦即晉成帝咸康三年（西元三三八年），匈奴後趙石虎使「趙太子宣帥步騎二萬，擊朔方鮮卑斛摩頭，破之，斬首四萬餘級。」（見資治通鑑卷九十六「晉紀十八」），又五年，晉康帝建元元年（西元三四三年），石虎又使「趙太子宣擊鮮卑斛摩頭，大破之，斬首三萬級。」（見資治通鑑卷九十七）；連前在二十四年之間，鮮卑見殺與被俘於匈奴者，已有十二萬餘人，不爲不多，而後兩次之「斛摩頭」與「斛穀提」或屬同一部落。

朔方一帶自東漢季世至五胡列國時代，始終爲匈奴與鮮卑居住之地，資治通鑑卷一百三「晉紀二十五」，簡文帝咸安二年（西元三七二年）載有：

「秦都督北蕃諸軍事、鎮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朔方桓侯梁平老卒。平老在鎮十餘年，鮮卑、匈奴憚而愛之。」

從此可見當時（西元四世紀）朔方一帶主要之居住者，應爲鮮卑、匈奴，而非漢族。

（二）薛千部鮮卑：薛千或作比干，時或訛爲薛子、薛千，據魏書「高車附薛千傳」所載其地望爲：

「常屯聚于三城之間」

以其聚居於三城之間，故又稱之爲三城鮮卑薛千部，考三城地當今陝西省延河之南，延安以東一帶地方，魏書載有：

「薛千部常屯聚於三城之間，及滅（劉）衛辰後，其部帥太悉伏望軍歸順，太祖撫安之，車駕還；衛辰子屈丐奔其部，太祖聞之，使使詔太悉伏執送之，太悉伏出屈丐以示使者曰：『今窮而見投，寧與俱亡，何忍送之。』遂不遣，太祖大怒，車駕親之，：太悉伏來赴不及，遂奔姚興，未幾亡歸嶺北，上郡以西諸鮮卑

、雜胡，聞而皆應之，天賜五年，屈丐盡劫掠總服之，及平統萬，薛千種類皆得爲編戶矣！」（註十一）

鮮卑薛千部太悉伏受北魏道武帝攻擊時，逃向嶺北，據資治通鑑稱：「嶺北，謂九嶺嶺北。」地當今陝西禮泉，及至天賜五年（西元四〇八年），天賜乃北魏道武帝年號，其五年爲晉安帝義熙四年，屈丐盡服之，及平統萬（今陝西橫山），則將鮮卑列爲編戶，從而可見於西元五世紀初，今陝北橫山一帶地方，多有鮮卑薛千部族人。

註十一：請見魏收撰魏書卷一百三列傳「高車附薛千傳」，台灣中華書局據武英殿本校刊，列「四部備要」。

（三）破多羅部鮮卑：多羅或作多蘭，據魏書卷一百三列傳「高車傳」稱：

「……而率屯山鮮卑別種破多蘭部世傳主部落，至木易干有武力壯勇，劫掠左右，西及金城，東侵安定，數年間諸種患之，天興四年，遣常山王遼討之於高平，木易干將數千騎棄國遁走，盡徙其人於京師……。」

按屯山地當今甘肅固原西，金城地當今甘肅蘭州附近，安定則今甘肅涇川之北，高平則當今甘肅固原；天興爲北魏道武帝年號，其四年爲晉安帝隆安五年，西元四〇一年；固原、蘭州皆在北緯卅六度線上，換言之，西元五世紀初，鮮卑破多羅部分布於今甘肅北緯卅六度一帶地方，又原甘肅固原現中共已將之劃歸「寧夏回族自治區」，此部鮮卑已高平（今固原）爲中心，故又稱高平破多羅部鮮卑。當北魏遣常山王遼討之於高平，木易干將數千騎棄國遁走，北魏盡徙其人於京師，按北魏其時京師爲平城，平城地當今山西大同，是則鮮卑破多羅部又徙山西大同矣。

三、隴西地區

隴西地區乃指隴山以西而言，此一地區之有鮮卑族，固應以乞伏鮮卑最爲有名，以其在隴山以西地區，故又以隴西鮮卑稱之；乞伏鮮卑之由來，據晉書卷一百二十五，「載記第二十五」稱：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乃有一小兒在焉，時又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爲子，衆咸許之，老父欣然自以爲有所依憑，字之曰紇干，紇干者，夏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爲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鐸莫何，託鐸者言非神非人之稱也；其後有祐鄰者，即國仁五世祖也。」

按祐鄰之時約當西元三世紀中後，晉書同卷載：「秦始皇初，率戶五千遷于夏，緣部衆稍盛。」按秦始爲晉武帝年號，其元年爲西元二六五年，「夏」當指今河套之南，再據晉書同載記稱：

「……鮮卑鹿結七萬餘落，屯于高平川，與祐鄰迭相攻擊，鹿結敗南奔，祐鄰盡并其衆，因居高平川；祐鄰死，子結權立，徙于牽屯；結權死，子利那立，擊鮮卑吐賴于烏樹山，討尉遲渴權于大非川，收衆三萬餘落；利那死，弟祁瑩立；祁瑩死，利那子述延立，討鮮卑莫侯于苑川，大破之，降其衆二萬餘落，因居苑川，以叔父軻瑩爲師傅，委以國政；斯引烏瑩爲左輔將軍，鎮蔡園川；出連高胡爲右輔將軍，鎮至便川；叱盧那胡爲率義將軍，鎮牽屯山……。」

從晉書此段載記可明顯看出祐鄰遷夏之前，原地已有鮮卑族群生存其間，且爲數不少，如鮮卑鹿結部七萬餘落，鮮卑吐賴部三萬餘落，鮮卑莫侯部二萬餘落；每落（戶）姑以五人計之，總數當在六十萬人以上，自祐鄰歷結權、利那、祁瑩、述延祖孫三代之經營，漸次獲得高平川（今甘肅清水河，中共將附近地方劃歸寧夏回族自治區）、苑川（今甘肅蘭州東之苑川）、大非川（疑即今青海之布哈河）等一帶地方，其獲地之廣、族人之多，在隴西一帶，應屬一時之盛。

四、河西地區

此區主要係蘭州黃河以西，包括青海（湖）以北地區，鮮卑族群徙入此區，爲時頗早，以其在黃河之西，故史家稱之爲河西鮮卑。進入河西地區之鮮卑族群，最早及力量最大者，當推秃髮鮮卑，

據晉書卷一百二十六，「載記第二十六」，「禿髮烏孤」傳載：

「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也，其先與後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遷于河西，其地東至麥田，牽屯，西至濕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匹孤卒，子壽闡立，……壽闡卒，子樹機能立，壯果多謀略，泰始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於萬斛堆，敗涼州刺史蘇愉于金山，畫有涼州之地。」

樹機能殺秦州刺史胡烈以叛晉，事在秦始中，按秦始爲晉武帝司馬炎年號，共十年（西元二六五—二七四年），秦始中可斷爲其五年（西元二六九年），時樹機能已「壯果多謀略」，其年當在三、四十歲之間，每代姑以二十五年計，則禿髮匹孤下距樹機能之生年，約爲五十年，則匹孤之遷入河西，其時當在泰始五年前八、九十年（西元一七九年—一八九年），其時爲東漢靈帝建寧、熹年、和光年間，亦即北魏拓拔鮮卑擅石槐之十四年至二十四年之間。

至於禿髮匹孤其人之淵源，據「元和姓纂」十記載有：

「聖武帝詰汾長子疋孤，神元時率其部衆徙河西。」前引「疋孤」即匹孤，「神元」即魏書之「始祖神元帝力微」，換言之禿髮匹孤與北魏始祖神元帝力微係兄弟，而匹孤居長。匹孤之孫樹機能叛晉被殺之後，其從弟務丸立，未幾死，孫推斤立，死，子思復健立，部衆稍盛，禿髮烏孤者乃思復健之子，嗣立後，務農桑、修鄰好，部衆益盛；其族衆之多，可從晉書卷八六「張軌傳」所載得知：

「永興中，鮮卑若羅拔能爲寇，軌遣司馬宋配擊之，斬拔能，俘十餘萬口，威名大震。」

按永興（西元三〇四年—三〇六年）爲晉惠帝年號，張軌之遣將擊鮮卑，俘獲者達十餘萬口，其被俘者當更多於此數，其族群之繁盛可知。

除禿髮鮮卑徙入河西地區之外，另有慕容鮮卑亦有部份遷入河西地區，如晉書卷一百二十七「慕容德載記」曾載前秦苻堅滅前燕後，徙鮮卑慕容德於長安，更以之爲張掖（在河西）太守，數歲不使歸，其後慕容德雖回長安，但其家屬及其兄慕容納一衆，均仍在張掖，河

西地區之有慕容鮮卑，無庸置疑。

河西地區除禿髮、慕容兩部鮮卑外，尚有多部鮮卑族群，現擇要略述如次：

(一)、乙弗、折掘鮮卑：據晉書禿髮烏孤載稱，烏孤曾討乙弗、折掘二部，大破之，遣其將石亦干築廉川堡以爲都，此兩部鮮卑之位置，據資治通鑑卷一。八晉孝武帝太元二十年（西元三九五年）所載，胡三省注稱：乙弗、折掘二部，皆在禿髮氏之西，廉川在湟中，考其地望當在今青海湟水流域。

(二)、河南鮮卑：係指在金城黃河以南一帶地方之鮮卑，資治通鑑卷一〇九晉孝武帝隆安元年（西元三九七年）載有：「河南鮮卑吐秣等十二部大人，皆附于禿髮烏孤。」明指河南鮮卑有十二部之多。

(三)、意云鮮卑：晉書「禿髮烏孤載記」稱：「呂光封烏孤廣武郡公，又討意云鮮卑，大破之。」惜乎資治通鑑未載此事，其居地亦不可考。

(四)、北山鮮卑：所謂北山者，乃指今合黎山，北大山而言，在今寧夏、甘肅交界處，在張掖之西北；據晉書卷八七「李玄盛傳」稱：「初玄盛之西也，留女敬愛養于外祖尹文：文即東遷，玄盛從姑梁褒之母養之。其後禿髮儁檀假道北山鮮卑，遣褒送敬愛于酒泉，并通好之。」另「十六國春秋輯補」亦提及北山鮮卑，是足證其時北山一帶有鮮卑族群生息其間，故名之爲北山鮮卑。

(五)、鮮卑思盤部：晉書卷一百二十二「呂纂載記」有：「纂番禾太守呂超擅伐鮮卑思盤，思盤遣弟乞珍訴超於纂。」考其地望當在今丹嶺（今甘肅山丹縣南燕支山）一帶地方，亦即在武威、張掖之間。

(六)、疊掘、麥田、車蓋諸部鮮卑：晉書卷一百二十六「禿髮儁檀載記」載有：

「（沮渠）蒙遜進圍姑臧，百姓懲東苑之戮，悉皆驚散，疊掘、麥田、車蓋諸部盡降於蒙遜。」

另同載記有：

「……蒙遜大怒，率騎五千至於顯美方亭，破車蓋鮮卑而還。」

是可知顯美方亭一帶地方，有車蓋鮮卑散居其間，而疊掘、麥田二部鮮卑亦當在不遠處，按顯美屬南涼武威郡，當今武威西北；麥田亦地名，地當今甘肅靖遠縣北。

(七)、此外鮮卑之在河西者尚有卑和、烏啼二部鮮卑，晉書卷一百二十九「沮渠蒙遜載記」稱：

「蒙遜西如苻翟，遣冠軍伏恩率騎三萬，襲卑和、烏啼二虜，大破之，俘二千餘落而還。」

按苻翟地當今甘肅永昌，卑和則在青海湖一帶。

從以上所述關中、隴山以東、隴西及河西四部鮮卑族群，大抵均在東漢季世陸續自其發源地遷而來，其生息空間約在今陝西、甘肅至青海一帶地方，族群既多，人數亦夥，由於生息在華夏文明薈萃之地區，久而久之，彼此互相融合，以故唐宋而後，已無漢族、鮮卑之分別矣。

叁、早期習俗與語文

所謂鮮卑早期習俗者，係指鮮卑漢化以前之習俗，按鮮卑族群建立政權時，或多或少已染華夏之風，尤以北魏孝文帝之華化政策，既全面復徹底，對於融合鮮卑與漢族文化居功厥偉，設無鮮卑新文化、新血胤之注入，能否創造後日之大唐雄風，尚在未定之天，因此，對於早期鮮卑習俗，確有加以瞭解之必要，至於其語文，歷來論者多稱鮮卑民族所操語言為後來之蒙古語或滿州語，此種說法，姑不論是否正確，要皆屬於時空顛倒之辯證，至於鮮卑民族曾否創立文字，歷來學者，雖多持否定看法，然而若干史證顯示，則仍有商榷之餘地，職是，對於鮮卑民族之語文，亦需作進一步之探討，本文爰就鮮卑民族早期習俗與語文加以敘述。

一、早期習俗

由於鮮卑早期史事，從未有系統性之專著加以敘述，僅散見於史記，兩漢書、晉書、三國志、北史、十六國春秋、魏書諸史之中，皆

稱鮮卑之習俗同烏桓，因此欲探討鮮卑習俗，亦須從上列諸史中尋覓，各該史書卷秩浩繁，一一展讀誠非易事，茲就有關於早期鮮卑習俗者，參酌前述史籍，予以整理如次：

(一)、關於生活、居住、飲食者：

據後漢書所載其俗為：

「俗尚騎射，弋射禽獸為事。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為舍，東開向日。」

食肉飲酪，以毛毳為衣。」

(二)、關於氏族倫理者：

「貴少而賤老。其性悍驚，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也，父兄無相仇殺故也。有勇健能理鬪決訟者，推為大人，無世業相繼。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自為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則刻木為信，雖無文字，而部衆不敢違犯。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為姓。大人以下各自畜牧營產，不相徭役。」

(三)、關於婚俗及婦女地位者：

「其俗妻後母，報寡嫂，死則歸其故夫。計謀從用婦人，唯鬪戰之事乃自決之。」

(四)、關於宗教信仰者：

「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畢，皆燒之。」

(五)、關於喪葬者：

「俗貴兵死，斂屍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相送。」

(六)、關於日常生活婦織男耕者：

「婦人能刺韋作文繡，織氍毹。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鍛金鐵為兵器。其土地宜稼及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稌子，至十月而熟。」上列皆烏桓之習俗，而鮮卑同之，所謂習俗者，實即一民族之文化，不同民族之文化，本無法相比較，鮮卑民族未對本身之習俗作有系統之記載，僅由漢族加以紀錄，對某些現象，難免失之「以己度人」看法

，作臧否之言，如將此等主觀看法剔除，則所錄習俗，仍極具參考價值，如「男子能……鍛金鐵爲兵器」句，可知至少晚至東漢之時，鮮卑民族已有冶鍊金屬之技術；復如「其土地宜稼及東牆」，所謂稼者，即稷之不黏者，可知鮮卑民族之主食爲稷；再如「敬鬼神、祠天地……」，可知其爲泛靈信仰（Animism）兼祖先崇拜；又如「其俗妻後母，報寡嫂……」，則知其行「烝報婚」之俗，此俗無關道德之良窳，幾所有游牧民族皆採行之，縱如華夏民族亦有行之者，如左傳桓公十八年有「衛宣公烝於齊姜，……」之記載，又莊公二十八年有「晉獻公娶於賈，無子；烝於齊姜……」足證婚俗無關乎道德。歷來論者每以諸邊族不知禮俗爲病，其實不同民族間自有不同之文化習俗，基於「異類不此」之原則，不宜作善惡之價值判斷，明乎此，對鮮卑民族早期習俗自能作較客觀之瞭解。

二、語言文字

關於鮮卑民族之語言，由於歷來史料所紀錄者不多，實難加以斷定，屬於何種語族、語系，不過就已有之若干詞彙如「鮮卑郭洛帶」、「可博貞」（見南齊書「魏虜傳」，意爲守衛者或看門官）、「契害貞」（見同前書，意爲行刑官）觀之，至少可以斷定鮮卑語在語音結構上不屬於孤立語型（Isolating language type），因此亦不可能爲漢藏語族（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其道理至爲明白；揆諸後世長城以北之所有各邊疆民族之語言，概屬烏拉阿爾泰語族（Ural-Altai language family），以此例彼，如斷鮮卑民族之語言爲烏拉阿爾泰語族，當屬可以接受之推論。然則語族範圍極大，必得進一步之探討始能明瞭鮮卑語言之屬性，歷來論鮮卑之語言者，不外下列三種看法：

（一）、認爲鮮卑語言屬於匈奴語，或變種之匈奴語，持此說者以鮮卑早期曾服屬於匈奴，因此當操匈奴語，此說論證薄弱，蓋匈奴盛時「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爲匈奴」（註十二），是否亦可認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操匈奴語？苟此說不能成

立，則鮮卑操匈奴語之說亦不能成立，其事雖殊，其理則一，因此持此說法者現寥寥無幾矣。

註十二：此爲匈奴冒頓單于致漢文帝中用語，見漢書卷九十四「匈奴傳」。

（二）、認爲鮮卑語屬通古斯語：由於通古斯民族生存空間與鮮卑民族之發源地頗爲接近，於是作此項論定，在地望上固然予人相近之聯想，因此不少論者頗主此說，其實不然，按契丹爲鮮卑之後裔，而女真族多數學者皆認其族屬通古斯，契丹曾創製契丹文，遼亡金興，設鮮卑族果操通古斯語，則女真自可直接借用契丹文字，記其史事，不必俟滿洲興起，始借用蒙文字母拼寫女真語言，亦即後世所謂之滿文，準此以觀，鮮卑語雖可能與通古斯語同屬烏拉阿爾泰語族，但絕非同語系，故此說亦不能成立。

（三）、認鮮卑語源於蒙古語：持此說者人數甚多，論證亦夥，如近人布特戈其氏特撰有「鮮卑語源考證」一文（註十三），以彰其說，綜觀全文所引之例證甚少，雖布氏極力強調「鮮卑語源于蒙古語」，實無法使人認同，其說法之缺陷舉二，其一：鮮卑民族自東漢時開始活躍於北方政治舞台，隋唐之後，鮮卑一詞幾不復見，代之而起者爲契丹，唐時始見蒙古之名，設或兩者在語言上有任何關聯之處，僅能稱蒙古語可能源於鮮卑語，絕不得稱「鮮卑語源于蒙古語」，始合本末先後之序，布氏稱「鮮卑語源于蒙古語」者，實蹈以後來民族語言爲早期民族語言之來源，難逃「韃靼千年史」一書作者巴克爾（Parker）所謂「不免通人之譏矣。」其二：果爾蒙古語同於鮮卑語，則鮮卑裔之契丹，其操鮮卑語當無任何疑點，從任何著作中，從未見載有蒙古與契丹同語言之說，如再以更晚期停留新疆之錫伯族爲例（論者皆承認錫伯乃鮮卑之音轉，其爲鮮卑族無訛），今之錫伯語與蒙古語，其間差異當不亞於漢語與藏語之差異，雖則漢、藏兩族之語言同屬漢藏語族，然而語系不同，根本無法溝通。因此稱蒙古與鮮卑同其語言，仍屬有待商榷者。

註十三：布特戈其之「鮮卑語源考證」一文載「內蒙古社會科學

「一九八八年第四期，一九八八年七月廿五日，「內蒙

古社會科學院」出版。

月人白鳥庫吉氏爲近代研究東胡最有成就者，其所著「東胡民族考」一書，更爲研究東胡，烏桓或鮮卑者必讀之參考書，白鳥氏於其所著書中，對若干辭彙或指其與後日之某滿州語相當，或與某蒙古語相當，甚或與某突厥語相當，但並未明指鮮卑語全部皆爲滿洲語、蒙古語相同，其爲學態度頗爲謹慎；其實吾人必須瞭解一項事實，即今之某族不必一定必爲歷史上之某族後裔，蓋人類起源多元論，可從近代考古學得知，因此歷史上之某一民族亦不必爲今之某族。何況中國北方茫茫草原，一望無垠，初無此疆彼界之區別，生息其間之民族彼此必有某種形式之接觸，在器用物品乃至人身稱謂上，亦當彼此互相借用，因此若干詞彙之相似乃至相同，實屬極自然之事，如以此等少數詞彙相同，而斷某族之語言必源於某族，不僅失之武斷，且亦難避「不免通人之譏」矣；因此本文認爲鮮卑語自鮮卑語，在未覓得更多證據之前，實難作更進一步之推論。

至於文字，後漢書「烏桓鮮卑傳」載烏桓習俗時曾言：「大人有所招呼，則刻木爲信，雖無文字，而部衆不敢違犯。」同書又稱鮮卑之俗與烏桓同，是則可知至少在東漢之時，鮮卑族尚未創製文字，其實絕大多數民族在尚未發展成國家組織或有系統之政治組織之前，往往未有文字之創製，不過據鮮卑石室所發現之石壁刻文所刻之字仍爲漢文以觀，至少在北魏世祖拓跋燾太平眞君四年（西元四四三年）時，鮮卑民族所使用之文字仍爲漢文，因此歷來之論鮮卑者，皆論定鮮卑民族未曾創製文字，此種說法本諸後漢書，佐以鮮卑石室石壁刻文之證據，大致已爲學界所公認。

不過近人布特戈其於其所撰「鮮卑語源考證」一文中，曾先後提及下列二句：

「如果鮮卑文字能夠出土的話，……」

（文接5頁）

（文接43頁）

宗、朗宗、金東谿、江達宗（太昭）、雪喀宗、覺木宗、則拉崗宗、白瑪桂等十宗谿地區。

民國四十九年，設林芝專區，專署駐林芝縣。將拉綏谿、古如朗木杰谿、加查宗、朗宗、金東谿劃歸山南專區，原屬昌都地區之嘉黎宗、傾多宗、易貢宗、曲宗劃入林芝專區。以德木宗西部與覺木宗東部，則拉崗宗東北部分併設林芝縣（駐尼池村）；以白瑪桂（包括金珠、洛堆卡）設墨脫縣；以則拉崗之西南部設米林縣；以江達宗設工布達縣（駐江達村，即太昭）；以雪喀宗和覺木宗西部設雪巴縣（駐雪巴村）；以嘉黎宗設嘉黎縣；將傾多宗、易貢宗、曲宗合併設波密縣（駐扎木）。林芝專區轄林芝、墨脫、工布江達、雪巴、波密、米林、嘉黎等七縣。

民國五十年，米林縣治遷駐東多村。

民國五十一年，工布江達縣治遷駐介德。

民國五十三年，撤銷林芝專區，將林芝、墨脫、工布江達、米林等四縣劃歸拉薩市領導；嘉黎縣劃歸那曲專區；波密縣劃歸昌都專區。撤銷雪巴縣，大部分劃歸工布江達縣，一部分劃歸林芝、嘉黎二縣。

民國七十二年，恢復林芝地區，將拉薩市之墨脫、米林、林芝、工布江達等四縣，昌都地區之波密、察隅二縣和山南地區之朗縣劃歸林芝地區。林芝地區駐八一鎮，轄林芝、米林、墨脫、工布江達、波密、察隅、朗縣等七縣。

中國西域古民族——吐火羅之興衰

張哲誠

一、塔里木盆地羌氏勢力的消長

五代以前，北起鐵門（在撒馬爾罕東南），南至 Panjshir（在阿富汗喀布爾的北邊），西起阿富汗 Herat，東止於帕米爾的這片地域，因為好幾個世紀以來，吐火羅人即已聚散於此，所以當時的阿拉伯人稱該地為吐火羅斯坦（Turharistan）。玄奘在其「大唐西域記」裡則名之為覲貨邏國故地也。中國人以「吐火羅」之譯音來稱呼這支民族，大約是起自南北朝初期，「魏書」作為「吐呼羅」。「後漢書西域傳」中雖有名為「兜勒」之國，然未明其地之所在。天朝在受西域佛教徒之影響，而名之為吐火羅之前，似乎就是以「月氏」和「大夏」之名來稱之。「大夏」（古音作 Dai Hai、Du ho）一詞為「吐火羅」之音譯的說法，目前雖已遭受較少的非難，可是大夏在中國史上，仍有一些混淆不清的問題存在。

對於這個問題，歸根究底的來說，乃是因為許多人都將大夏比為希臘人在中亞所建的巴克崔亞（Bactria）王國之故。雖然「史記大宛傳」中之「大夏」，正好位於希臘人巴克崔亞王國之地，不過希臘人在當時是統治者，而大夏人只是其治下許多「蠻族」中的一支，兩者是有差別的。更有甚者，仍有人將原先居於該地的北伊朗語系的巴克崔亞人，誤以為是最早的大夏人，於是大夏就成了巴克崔亞人和希臘人所建的王國之國號，而身為大夏本體的民族反遭遺漏。但在希臘人來說，他們將這些區別的很清楚。斯特拉波（Strabo，64 B.C. ~ A.D. 21）在其「地理誌」（Geographica）中提到，滅亡希臘巴克崔亞王國的異族，是來自薩伽（Sacai）和索格底亞那（Sogdiana）地方的強大游牧民族，他們渡過阿姆河（Oxus）南下，滅了希臘人的王國，而在其王國境內定居下來，這批外族中最著名

的是 Asinoi、Passanoi、Tocharoi 和 Sacarauloi。

在記載當時情形的其他史冊或地下史料中，希臘人巴克崔亞王國確是亡於異族的入侵，只是她是分別受自西北兩方的攻擊而退保印度的西北部。其西側的入侵者，是來自於裏海東南的游牧民族，因先前佔有帕息亞（Parthia）地方，故被稱為帕息亞人（the Parthian），所以斯特拉波所稱的 Passanoi 很可能是指帕息亞人。而 Sacarauloi 很明顯的是指薩伽人，亦「史記」中的「塞種」。Tocharoi 則應該是受希臘人所統治，生活在巴克崔亞地方的大夏人。其時，月氏人已游牧於阿姆河以北的希臘人巴克崔亞王國的領土上，是以月氏人無疑地便是上述的 Asinoi。因「就地理說，焉耆從前也名過月支。斯坦因在敦煌所得宋人寫本，有一種名為『西天路竟』的，就把高昌、龜茲中間的一國，喚作月氏。而且焉耆的名稱在東西來往僧衆行紀裏頭，多名曰烏耆，只有法顯傳同釋氏西域記名曰烏夷。高僧傳卷一卑摩羅叉傳名曰烏纏，西域記名曰阿耆尼。這四個名稱，恐怕是本於一種對音①」。焉耆或阿耆尼之地，既又作月氏，而月氏在西徙之前，似也曾活動於焉耆一帶②，是以月氏應即 Asinoi。

吐火羅人或月氏人，大多數學者不是以其為印歐族之北伊朗系民族，便是以其為突厥人③。至於「史記」、「漢書」上所提示的，月氏人是屬於羌氏系的民族，則有意無意的被忽略掉了。在進一步引用人類學和語言學方面的調查報告之前，不妨先看看文獻上的記載，以明中國古西域民族很可能是屬於羌氏一系。「史記大宛傳」和「漢書西域傳」應該是中國對西域最早的一份完整的記錄。「漢書西域傳」的記載似乎比「史記大宛傳」的內容要詳細一點，所以下面將轉錄其文，以便作進一步的說明，其書云：

西域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

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爲使簡明，下列諸國僅撮其要）……

(1) 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婼羌（孟康曰：婼音兒。）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辟在西南，不當孔道。隨畜逐水草，不田作。西北至鄯善，乃當孔道云。

(2) 鄯善國，本名樓蘭，地沙鹵，少田，國出玉，多葭葦，檉柳、胡桐、白草。民隨畜牧逐水草，與婼羌同。鄯善當漢道衝，西通且末，自且末以往皆種五穀，土地草木，畜產作兵，略與漢同，有異乃記云。

(3) 且末國，北接尉黎，南至小宛。

(4) 小宛國，東與婼羌接，辟南不當道。

(5) 戎盧國，東與小宛，南與婼羌，西與渠勒接，辟南不當道。

(6) 渠勒國，西與婼羌，北與杆彌接。

(7) 于闐國，南與婼羌接，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原出焉。多玉石，西通皮山。

(8) 皮山國，西南至烏耗國，南接天竺，北至姑墨，西南當尉賓，烏戈山離道，西北通莎車。

(9) 烏耗國，北與子合、蒲犁、西與難兜接。

(10) 西夜國，王號子合王，東與皮山、西南與烏耗，北與莎車，西與蒲犁接。蒲犁、依耐、無雷皆西夜類也。西夜與胡異，其種羌氏行國，隨畜逐水草往來。而子合出玉石。

(11) 蒲犁國，東至莎車，北至疏勒，南與西夜子合接，西至無雷。

(12) 依耐國，北至疏勒，南與子合接。

(13) 無雷國，南至蒲犁，南與烏耗，北與捐毒，西與大月氏接。

(14) 難兜國，西至（筆者按，對照前後文，應爲「東至」）無雷，西南（按應爲「東南」）至尉賓，南與婼羌，北與休循，西與大月氏接。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徙大夏，而塞王南君尉賓。塞種分散

，往往爲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

(15) 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本居敦煌、祁連間。而老上單于殺月氏，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嬀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16) 自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須鬚。

(17) 休循國，在葱嶺西，西北至大宛，西至大月氏，民俗衣服類烏孫，因畜隨水草，本故塞種也。

(18) 捐毒國，南與葱嶺屬，無人民。西上葱嶺則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水草，依葱嶺，本塞種也。

(19) 烏孫國，與匈奴同俗，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

「漢書」所記西域諸事的年代，大約是起自西元前兩世紀前葉。從「漢書」的記載裡，我們知道天山和葱嶺似乎形成了伊朗系民族東進的一道障礙。在天山東、南地區是屬於類漢人的民族。在天山以北以西，則爲塞種和大宛以至安息那群深目多鬚的伊朗系民族。綜合了清末李恢垣的「漢西域圖考」、徐松之「漢書西域傳補證」、丁謙的「漢書西域傳地理考證」和民國的黃文弼之「漢西域諸國之分布」（該文刊於「邊政公論」，三卷八期）。得知，其西夜國約在今拉達克山，子合國大概在西爾吉特（Gilgit）；蒲犁國則在葉爾羌河上流地帶；而依耐國不出薩爾湖（Zor Kul）左右；無雷國差不多處於英吉沙到喀拉湖（Kara Kul）之間。至於捐毒國則在察提爾湖（Chattr Kul）一帶；休循國在阿賴嶺（Alai）附近；難兜國約在巴達克山西境。

再說，天山雖大抵擋住了伊朗系民族的東進，却沒妨礙到羌氏的西徙。這支向西移的羌氏，就是文中的婼羌。從前面引文中知道，除

了與漢人接觸的那群分布在今婼羌縣東南，而近於柴達木盆地，由去胡來王所統治的婼羌外。近有一大群沿南山（今崑崙山脈）向西散布，最遠的在難兜國的南方，也就是說已經越過蔥嶺而西，到達興都庫什山的北面了。可見羌氏系民族在上古時代於天山南路的勢力，是如何的興盛。在「大唐西域記」中，有一段敘述，似乎可作為前述的旁證，其書卷一云：

健馱邏國迦賦色迦王，威被鄰國，化治遠方，治兵廣地，至蔥嶺東，河西蕃維，畏威送質。迦賦色迦王既得質子，特加禮命，寒暑改館。……故諸屋壁，圖畫質子容貌服飾，頗同東夏。

文中的健馱邏王迦賦色迦，便是東漢時代貴霜王朝的皇帝（即迦賦色迦二世）。職是之故，至少在東漢中葉以前，天山南路仍舊是羌氏系民族的世界。但後來由於伊朗系民族逐漸地向東移，而遭同化，其中于闐可能是最晚被同化的一國。因在「魏書西域傳」之「于闐國」條裡說到：「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深目高鼻，惟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

關於這種混血的迹象，在人類學上亦有可證明者。荷西（T.A. Joyce）氏曾對新疆的人種作過深入的調查，他以新疆及鄰近地區的民族做樣本，就人類學上所提出的各項民族人種的特徵加以分析。在他的研究裡，新疆人約略可分為四組：

(1) 山居族群：指的是帕米爾一帶的居民。

(2) 沙漠族群：主要分布在Iurfan、Khotan、Korla（樓蘭）和Charkhlik（婼羌）等地。

(3) 突厥族群：有Kirghiz、Kelpin、Dojan和AK-Su一帶的居民。

(4) 受有漢人影響的族群：分布在哈密、羅布泊一帶。

據荷西氏研究的結果，在塔克拉瑪干盆地內的居民，其伊朗屬性最為明顯，而塔克拉瑪干的西北居民，突厥屬性最為強烈。此外，令他感到好奇的是沙漠族群的居民與藏人之間，存在着某種令他難以解釋的

關係，特別是和闐一帶的居民更是如此④。

除此之外，從語言學上，我們也有蛛絲馬跡可循，「洛曼氏又以為此種語言（于闐語）沒有印度伊蘭語的特徵，而認定為阿利安語系中獨立的一系，定名為北阿利安語。法國梅愛氏（Meillet）則反對洛曼氏的說法，以為此乃伊蘭語系中一種特殊的方言。伯希和氏以為此種語言的性質與宰利語相似，應屬於伊蘭語系，雖與普通伊蘭語頗有不同之點，但就其特徵推定起來，又明係伊蘭語的一種，所以定之為東伊蘭語。又英國霍諾氏（Rudolf Hearnle）以為此種語言雖尚有許多不明點，但就其大體尚可以伊蘭語說明出來，其以與普通伊蘭語形式有不同者，大概是因為受了別的語言的影響，而改變其固有語言的形式之故，他始定此種語言為于闐語⑤」。梅愛等人之所以不了解于闐語為什麼會與普通伊蘭語頗有不同，其基本原因是他們未曾考慮到，此種語言的底子本是羌氏人所操之語言。後來因其人同化於伊朗系民族之中，才成了近代被發掘出的那種于闐語。而關於于闐語之所以會有特殊之處，在湯瑪士（F.W. Thomas）的研究中可得到印證。他以為于闐和鄰近地區的原來語言都屬於一種原型藏語（Proto-Tibetan），而在中世紀通行的伊朗語，則是在較晚的時代才輸入的⑥。如此，從語言學上的考證，正好符合中國史書上的記載。

羌氏在天山南路的勢力，至少在西漢時代仍然看不出西域有何重大變化。但到了東漢時代，該地區的政局便有了起伏，各國倖併之風日盛。位於城郭諸國以西的月氏、康居等大國也開始將觸角伸入天山南路。或許正因為外國勢力的侵入，使得伊朗系民族開始流入新疆。康居本是屬於伊朗系的民族在吹河一帶所建立的國家⑦。而月氏人當時建立的貴霜王朝的轄下，也大部份都是伊朗系民族活動的地方。所以，很可能藉康居、月氏之力而滲入。但這種滲入，似乎不是以政治為目的。因為城郭諸國的統治家族並沒有因此而轉移，最明顯的便是龜茲王國的統治家族——白氏，竟延續到唐末。但伊朗系民族的東進

，在中國史料上都不着痕跡，因在東漢末、三國時代以後，中國內戰方熾，無暇西顧，自疏忽了西域的形勢。雖然在內戰時代，據有河西的軍閥或小王國，其勢力也常伸入西域，但短暫的政權，對西域似乎沒有留下什麼深刻的印象。直到以中原為中心的統一大王朝——拓拔魏的建立，勢力再度伸入西域時，西域的消長，當在三國、兩晉之時代。

二、吐火羅、月氏與婁耆

吐火羅是否即是大夏，史無明文，但亦可由旁事而推知，「考觀覓貨邏之名，源出大夏（嘉興沈乙庵先生并西人馬括德等并創是說）。大夏本東方古國。……大唐西域記十二云：『于闐國尼壤城東西四百餘里。至覓貨邏故國。國久空曠，城皆荒蕪。』案于闐國姓，實為尉遲，而畫家尉遲乙僧，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云于闐人。朱景元『唐朝名畫錄』云吐火羅人，二者皆唐人所記。是于闐與吐火羅本同族，亦吐火羅人曾居于闐之證。又今和闐以東大磧，唐書謂之圖倫磧（唐書西域傳吐谷渾，李靖等軍且末之西，伏允走圖倫磧，將託于闐，是圖倫磧在且末與于闐之間）今謂之塔哈爾馬干磧，皆覓貨邏磧之訛變。是覓貨邏故國在且末于闐間，與周秦間書所記大夏地位，若合符節，即唐書西域傳云，大夏即吐火羅，其言信矣^⑧」，至於「吐火羅」之意，胡秋原以為「吐火」為古吐蕃語「九」的意思，「吐火羅」即「九王」之意；而維吾爾語則有「東方」之義，其在梵語中，則有「寒冷」、「冰雪」之解。因此，吐火羅之原意，於今實已不可考。

吐火羅之故地，在「魏書」以至於「唐書」之中，皆做處於焉水之南，亦今阿富汗北部。但在「大唐西域記」中，則有兩處，都被稱為是其故國地，其一即是前言之吐火羅斯坦。另一處是早已不見吐火羅人踪影的故國地，前已述及之。為了更進一步了解吐火羅人活動的範圍，有必要再引述一下「大唐西域記」中的記載，其書云：

從此（亦尼壤城，今之尼雅Niyā古址）東行，入大流沙，沙則流漫，聚散隨風，人行無迹，遂多迷路。四遠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來者，聚遺骨所記之。乏水草，多熱風，風起則人畜昏迷。因以成病，時聞歌嘯，或聞號哭，視聽之間，懼然不知所至，由此屢有喪亡，蓋鬼魅之所致也。行四百餘里，至覓貨邏故國。國久空曠，城皆荒蕪。從此東行六百餘里，至折摩馱那故國，即涅末地也。城郭歸然，人煙斷絕。復此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即樓蘭地也。

關於這處已經荒廢了的覓貨邏國故地的相當位置，斯坦因說：「一九〇六年十一月，我從尼雅遺址向東北，經過且末以至婁耆城（Chal. khlik），在沙漠中總走了四百餘里，……西元後六四五年左右，玄奘也循同一路線從尼雅到且末，在沙漠中行走十天，便已不見人烟。但是他曾明白說到覓貨邏故國，這是中亞史上有名的一個地方，正相當於放棄了的安得悅遺址^⑨」。

從「漢書西域傳」中，可知婁耆是分布在一片很廣的區域內，但也很明顯的可以用于闐為中心點，而分成東西兩部。前述難兜國大約在今天的巴達克山西境，因此于闐以西的婁耆，亦與于闐有重山之隔。此一缺口剛好由西夜、子合、蒲犁、依耐和無雷等國銜接起來，「漢書」稱這五國為婁氏行國。婁耆的營生方式，亦被稱為隨畜逐水草，不田作。因此，西夜等國或許正是由婁耆分出而建國的，既然處在重山之中，分裂成幾個小國也是很自然的事。而于闐以東的婁耆則與城郭諸國相交錯，在這些綠洲城郭國家之中的戎盧、渠勒、小宛，據李恢垣在「漢西域圖考」卷二裡所言，多已淪為戈壁之中。也就是說若要以今天的大戈壁——塔克拉瑪干（Takla Mahan）沙漠做為衡量的標柱的話，這幾個國家應是在沙漠之中，而非在沙漠之外，近於南山的地方。

大戈壁自古以來就一直向南移動，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其中變化的最為激烈的地方，要算是戈壁的東南部。從「史記」、兩「漢書

「到法顯的「佛國記」，再到「宋雲行紀」、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和慧超的「往五天竺國傳」中對這些地方的描述，在兩相比較之下，可清楚的看出，該地是從綠洲而慢慢的變成了沙漠。但這種為沙漠所侵吞的可怕現象，似乎亦只止於東塔羌所分布的地區。因據斯坦因的考察，古和闐城，在今城西邊只有七哩之遙，且同位於兩河之間^⑩。然而在於闐之東的扞彌國，卻也早就淪入戈壁之中了。

從這些情形來推測塔羌人的地方，可知大約是從柴達木盆地西北，一路向西，沿車爾成河，再西南走，而到和闐的南方。在這片區域的正中央，剛好是有觀貨邏故國地之稱的安得悅遺址之所在。而塔羌國王號曰「去胡來」王，此「去胡來」似為「吐火羅」之對音，所以，塔羌與吐火羅或存有一很深的關係。今藏語言「南方」，音為「lho」或「lho-cho」，其音與塔羌之「姑」相若，故塔羌很可能是指吐火羅之處在南方的族人而言。「魏略西戎傳」有言：

敦煌西域之南山中，從塔羌西至葱嶺數千里，有月氏餘種：葱此羌、白馬黃牛羌，各有酋豪，北與諸國接，不知其道里廣狹。而這批月氏餘種，亦有其來處，「漢書西域傳」云：

老上單于殺月氏，以其頭為飲器，月氏乃遠去。……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此南山羌必是先月氏而居於南山之羌人，是以除塔羌外，實難有相近者。既有「南山」之名，則塔羌之號，或真與「南方」有關。

吐火羅——大夏人在上古時代之分布，據「呂氏春秋」卷五之「古樂篇」所言，或可推出其核心之所在，其文曰：

黃帝令伶倫作為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解谿之谷。

阮隃在「說苑 修文篇」、「風俗通義 聲音篇」及「漢書 律歷志」中，皆作崑崙，故其時之大夏乃在崑崙之東，亦在和闐之東。另外，斯文赫丁（Sven Hedin）曾提到：「新疆中央大沙漠，土人稱之為塔克拉馬干（Takla-makan）」，又余在沙漠中發現古代之城市遺

蹟，亦名塔克拉（Takla），塔克拉為吐火羅之轉音，毫無疑義。和闐附近有村落名托赫拉（Tochila）。古代沙漠逼近城市時，居民皆遷至此村。托赫拉亦必吐火羅民族所遺留之名^⑪。而藤田豐八又有西漢河西四郡中之敦煌，實亦吐火羅之轉音的說法^⑫。是以玄奘以于闐以東為觀貨邏之故國地，確其來有自。

大夏不僅在葱嶺以西有之，即在中原的邊境地帶亦有之。「史記 齊太公世家」云：

桓公（685~643 B.C.）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

又「管子」卷八，「小匡」云：

（桓公）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於西河，方舟投柎，乘桴濟河，至於石沈，懸車束馬，踰太行，與卑耳之貉拘秦夏，西服流沙、西虞，而秦戎始從。

可見桓公之西征大夏，實為屈服秦戎之手段。從該文看來，其流沙當同於「山海經」中雁門一帶或更西之流沙。為西伐大夏而涉流沙，則大夏尚在流沙之西，正好位於秦戎之大後方。故大夏應在河西走廊與隴西高原一帶。職是之故，吐火羅——大夏實是一支龐大的民族，在春秋戰國時代，至少從黃河中上游以西到天山南路都有其人。

月氏與吐火羅之關係，實亦模糊不清。今日大多數西方學者雖多認為月氏即吐火羅，但都無法提出一個周延的解釋。下文僅就月氏人未西走前的分布情形，來說明月氏涵蓋在吐火羅人活動空間之內，然兩者是否有種屬上的關係，實不得而知。月氏在西遷前，其西邊的疆界，史無明文，據一般的考證，以為「或居住在庫車及吐魯番諸境^⑬」。至於月氏人在東方的領域，似乎有一直延伸到黃河西岸一帶的跡象。「舊唐書地理志」在涼州治城姑臧條下曰：「秦月氏戎所處，匈奴本名蓋臧城，語訛為姑蘇城」。涼州，即今武威。「蓋臧」或「姑臧」，因其音與大月氏五翎侯中之「貴霜」相近，故有人以為「貴霜

「之號或由此而來。又賈誼「新書」卷四，「匈奴篇」云：

將必以匈奴之衆爲漢臣民制之，令千家爲一國，列處於塞外，自隴西延至遼東，各有分地，以衛邊，使備月氏，灌盭之變，皆屬之直郡，然後罷戎休邊。

以此觀之，月氏在其東的領域，似乎已近於漢隴西一帶。

曾與月氏並爲塞外三大部族的匈奴與東胡，且都有跡象可溯其源，何以月氏竟難以覓其由來。在「管子 撥度篇」裡有：「北用禺氏之玉」，唐人尹知章注曰：「禺氏，西北戎名，玉之所出」。北「禺氏」或即與「月氏」有關連者。河西的玉門關，本因位居玉貿易之交通要衝而得名，安特生（J.G.Andersson）在其「甘肅考古記」（Preliminary report o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Kansu）裡曾提到：

最引人注意者，莫如仰韶期之墓中，發現曾琢磨之玉片及玉瑗數件，其形質吾人常認爲來自新疆和闐者也。解說者謂甘肅石銅器時代過渡期之民族，與新疆似有貿易上之連絡。

故這支與古甘肅土著之貿易者，可能即禺氏之先。若此，則「禺氏」或同於「玉氏」。證之古希臘文獻與中國之經籍，在中國古西域確有一支名爲「玉」的民族，生活於其間。

在托勒密（Ptolemy，西元二世紀時的人）的「地理誌」（Geographia）中，於葱嶺以東，有一座山被名爲「Casia」，德人李希霍芬（Richthofen）因今之突厥語、蒙古語稱「玉石」爲「Kas」，而和闐以南之崑崙山脈復以產玉聞名，故以爲是山即今之崑崙山脈^⑭。此外，在希羅多德（Herodotus，484?~425? B.C.）之「The History」的第三卷之九十三節裡，曾提到當時波斯之阿克米尼王朝（Achemenid，558~330 B.C.）的二十個行省所轄異族之情形，今節其相關者如下：

(1) The Sattagyrians，the Gandarians，the Dedicae and the Aparytae，總計其納貢有一百七十 talent，這是第七

行省的情形。

(2) 從 Bactrian tribes 到 the Aegli，所收到的貢金有三百六十 talent，這是第十二行省的情形。

(3) The Sacans and Caspians，納貢有一百五十 talent，這是第十五行省的情形。

(4) The Parthians，Chorasmiens，Sogdians and Ariens 納貢三百，這是第十六行省的情形。

(5) The Indians，就我們所知，她比其他的民族更加富有，其貢金，據悉，乃在三百六十 talent 的砂金以上，這是第二十行省的情形。

據英人李思倫白輯譯的「萬國通史前編」所附的「古波斯二十道圖」所載，第七行省名爲 Gandar（轄有今阿富汗之中、南部）；第十行省名爲 Bakhtri 或 Baktria（轄有阿姆河上游兩側）；第十五行省名爲 Amyrgii（轄有帕米爾到費加那一帶）；第十六行省名爲 Chorasmi（轄有阿姆河下游兩側）；第二十行省名爲 India（轄有今印度旁遮普 Punjab 一帶）。關於 Amyrgii，希羅多德曾提到，有一名爲 Amyrgii Scythians 之民族，波斯人皆呼之爲 Sacans，故 Amyrgii 一帶或亦爲 Sacans 人活動的區域。由於

Amyrgii 行省之以西以南，皆爲波斯帝國所轄之省區，諸省又各有所司，所以 Sacans 和 Caspians 必不可能分布在 Amyrgii 省以西，亦即必處於該省之職責範圍之內，或者在其稍北以至於稍東的地方。Sacans（薩伽人），我們已知主要是散布在錫爾河中上游一帶，正值 Amyrgii 省之北，則 Caspians 必居於該省以東的地區，也就是說可能在帕米爾和塔里木盆地一帶。是以，Caspian 很可能是指生活在 Casi 山一帶的民族而言。

於中國方面的史料中，亦有與之相呼應者，「魏書西域傳」于闐國條云：

城東三十里，有大水，號樹枝水，即黃河也，一名計式水。西

五十里，亦有大水，名達利水，與樹枝水合流，俱北流。

又「新五代史四夷附錄」之于闐國條：

漢張騫所窮河源，出于闐，而山多玉，此山也，其河所出，至于闐分爲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黃。

職是之故，文中的樹枝、計式，很明顯的乃 *Casi*、*Kas* 之音譯，即意爲「玉」。「山海經」卷三之「西山經」中的「積石之山」，及「呂氏春秋」之「古樂篇」中的「懈谿之谷」，蓋亦 *Casia* 山之轉譯耳。「西山經」言：「軒轅之丘，無草木，又西三百里，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今觀和闐以南之崑崙山，有玉龍哈什河（*Yurung Kash*，意爲白玉川）、哈喇哈什河（*Kara Kash*，意爲黑玉川）和葉爾羌河源於其中，且三河無一不是沿山西行，出崑崙山之後再北流。因此，以積石之山當和闐南之崑崙山，並不爲過。而「尚書禹貢」中「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裡的析支，殆亦 *Casi*、*Kas* 之音譯，是亦玉族也。

在古史上，除了禹氏或似與月氏有關外。另有一支名爲「允姓」之姦的，亦擬似月氏之屬。在「左傳昭公九年（537 B.C.）條云：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伯父（晉）惠公（650 ~ 638 B.C.）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馬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

瓜州即今之敦煌，「水經注」卷四十，謂：

春秋傳曰：允姓之姦，居于瓜州，瓜州，地名也。杜林曰：敦煌古瓜州也。州之貢物，地出好瓜，民因氏之。

由於「允姓」之姦居於瓜州，而其音又近於後來之「烏孫」，故有以之爲「烏孫」者^⑮。然若佐之以「魏書西域傳」康國條之言，則「允姓」之姦似乎更近於月氏，其文曰：「康國者，……自漢以來，相承不絕，其王本姓溫，月氏也」。此「溫姓」或即「允姓」之諧音，若此，則「允姓」之姦實即月氏之先。因瓜州後名爲敦煌（*Thagura*

），又被視爲吐火羅之音轉，是以「允姓之姦」很可能亦屬吐火羅之一支。

三、大月氏的變遷

月氏，該算是吐火羅族中最著名的一支，但諸夏對她的認識，却非常的有限。儘管如此，中國所留有的記錄，仍是有關月氏早期歷史的資料的唯一來源。最初中國人只知，在他們的北方，有三個強大的游牧國家，由東而西，依次爲東胡、匈奴和月氏。月氏領土之四限，中國人並不清楚，但知從天山到河西走廊一帶，都有其人。秦漢之際，匈奴人首先擊滅了東胡王國，又西卻月氏，並乘勝併樓煩、白羊河南王，北服渾蠡等五國，到了漢文帝四年（西元前一七六年）匈奴單于冒頓再遣右賢王征月氏，「滅夷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爲匈奴。」張守節於「史記匈奴列傳」之烏孫、呼揭條下註曰：「二國皆在瓜州西北，烏孫戰國時居瓜州。」古瓜州，在今甘肅布隆吉爾河一帶，是以兩國可能皆處於今伊吾、鎮西附近。則文帝四年以前，到秦漢之際，月氏人至少仍保有敦煌和天山之間的地方，應無疑義。又從前引賈誼「新書匈奴篇」看來，文帝初年，月氏之疆域且逼近於漢隴西地方，而秦漢之際，匈奴已西却月氏，因此月氏人之勢力或許更曾深入到鄂爾多斯地方，所以在月氏敗後，才有匈奴併白羊河南之事，且「史記始皇本紀」載「琅邪碑」云：「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又「漢書匈奴傳」：「當是時，東胡強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職是之故，在匈奴北徙後，鄂爾多斯一帶或曾淪爲月氏勢力之內。

文帝四年之役，月氏被迫西走，侵入了塞種所居之地，趕走了塞王，塞王遂越縣度，南君於罽賓（約在今喀布爾東北的 *Kafiristan*），自此塞種乃分爲數國，疏勒西北之休循、捐毒等皆其族類；另有一部向西南走，進入索格底亞那、巴克崔亞和安息。到了老上單于

174~161. B.C.)時，匈奴應烏孫昆莫之請，再征月氏，殺其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於是再向西南流竄。從此到張騫初訪西域（約在西元前一二八左右）之間，月氏人的情形，由於唯一資料來源的「史記」和「漢書」說得並不很明白，以致於異論頗多，但就其各條記事加以排比，亦不難理出個頭緒來。「漢書張騫傳」：

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夫人爲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的大月氏、康居之屬，兵疆，可以賂遺設利朝也。

由此，我們可看出，大夏與大月氏是截然有別的兩國，且都被當時的漢人視爲西域大國。雖然「大宛列傳」上有：「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太子爲王，既而臣大夏而居，地肥饒，少寇，志安樂，……：但「索隱」之注却曰：「既臣大夏而君之。謂月氏以大夏爲臣，而爲之作君。」又大夏之條：「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及大月氏條：「及爲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嬌水北，爲王庭。」因此其所謂的「臣大夏而居」，應是「臣大夏而君」之誤。大月氏雖臣大夏，但仍留居在嬌水之北，則其所稱的「地肥饒」，必是指嬌水北而言。

西漢時代，月氏雖以嬌水北爲王庭，但見於「漢書西域傳」：

大夏本無君長，城邑往往置小長，民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共稟漢使者。有五翎侯：一曰休密翎侯，治和墨城，（中略）二曰雙靡翎侯，治雙靡城，（中略）三曰貴霜翎侯，治護藻城，（中略）四曰睢頓翎侯，治薄茅城，（中略）五曰高附翎侯，治高附城，……：凡五翎侯，皆屬大月氏。

則大夏確亦有月氏人之跡。關於五翎侯之領地，高附，即喀布爾之謂，在下文中將會談到；而休密當即「唐書」中的護密，雙靡應即「魏書」、「北史」中的賒彌，或「西域記」中的高彌，以上兩地皆在今

阿富汗的東北部。至於睢頓，其地不詳，但觀五翎侯中，皆有侯名即其治城之名的慣例，則睢頓或許又名爲薄茅，薄茅一地亦不可解，不過白鳥庫吉以爲乃「薄第」之筆誤，因而以爲在巴達克山一帶（見其「西域史上之新研究」之「大月氏考」）。然而依「漢書」所列之道里來看，睢頓（薄第）實應在休密、雙靡的更西方求之，則其地或即 Bactria 城。此外，貴霜距都護之道里，與睢頓的相近，是以貴霜應亦在睢頓之附近。

前文所引之「張騫傳」有言，「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此殆騫被嬌水北大月氏所拒，故轉而求於在大夏之月氏之謂。此輩之月氏，當即此月氏五翎侯，既言其屬大月氏，乃知此五翎侯並非大月氏之主力所在。或由於如此，張騫在未獲嬌水北大月氏的首肯之下，當然也就無法運動在大夏的月氏了。月氏五翎侯究竟於何時進入大夏？亦難考證，不過「漢書」曾言，「（大夏）民弱畏戰，故月氏徙來」，是以月氏之入侵大夏，必於先前經一番觀察，而於探得其虛實之後，才展開行動。所以不可能是在被匈奴、烏孫聯軍攻破之後，便立即一路無所停留的南侵大夏。且其所言之「臣畜大夏」，當與「康居南羈月氏」之義相同。觀「史記」或「漢書張騫傳」所言，大夏在漢武帝之時（140~87. B.C.）仍相當的活躍，且後來的五翎侯又與大夏共稟漢使，是知五翎侯於當時尚未能有力的掌握大夏，職是之故，其侵入大夏必在張騫初訪西域之前不久的時候。

大月氏在阿姆河南北定居下來之後，生活風俗也就漸受當地文化的浸染，乃至於人種亦如是，故萬震之「南州志」云：「（大月氏）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遠，國王稱『天子』，國中騎乘常數十萬匹，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瑋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據「史記大宛列傳」之言，當時大月氏的鄰境，除北面之外，幾乎都涵蓋在同一文化——希臘文化之下，所以由後來出土的文物中可看出，居於嬌水南北的早期月氏人，確實深受該地文化的影響。大月氏之東爲大宛，其南有大夏、烏

弋山離和罽賓，其西則接安息。大宛本為希臘人所建之國，大夏其地百多年來又是希臘人在中亞的首府，則其與希臘文化之深交，自不用多言。再說安息雖是伊朗系之民族，但自亞歷山大以後，即受希臘人的統治，亦頗受其影響，此由安息史上的黃金時代（171 . B.C. ~ A.D. 10）亦被史家稱爲「Phil-Hellenistic Period」一事，以及後來同爲伊朗系民族的波斯人，竟要以趕走異族文化的統治爲號召來奪取安息王朝的政權的情形看來，安息必深染希臘之習。至於罽賓國，雖改由塞王所統治，但觀「漢書西域傳」的記載，其俗與大宛、安息都甚爲相似。而烏弋山離，其情形也是這樣。故「史記」云：「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因此，闖入異域的月氏人，也就如同後來的匈奴、鮮卑、女真般的溶入於其所征服的異族之中了。

烏弋山離之名，始見於「漢書西域傳」，而不見於「史記大宛列傳」，查「史記」乃成於武帝征和三年（西元前九〇年）的著作，則烏弋山離之建國，必晚於此。「西域傳」中有關其國的記事如下：

烏弋山離國，……大國也。東與罽賓，北與撲桃，西與犁軒、條支接。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國臨西海，暑溼，田稻，有大鳥，卵如鵝，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烏弋山離地暑熱莽平，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食飲、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罽賓同，……其錢獨文爲人頭，幕爲騎馬。……

撲桃，「後漢書」作撲達，其地似爲今之巴達克山（Badakshan）。至於犁軒，藤田豐八在其「犁軒與大秦」一文中，以爲即 Zoroaster 教經典中的 Ragha，其地在希臘、羅馬的古文獻中，多以爲在 Media 的東端^⑨。（有關「犁軒」，今天仍然有許多的學者，以爲即敘利亞）。而條支，我們從大鳥的傳說，亦可推知其所在。大鳥之傳說，實源於阿拉伯人，此鳥名爲 Rukh，又作 ROC。據云是以大象和其他大野獸爲食。其事蹟在「天方夜譚」和馬可波羅之「東方見聞

錄」中，都有記載。馬可波羅且指出此鳥在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島和東非海岸亦有之。「後漢書西域傳」記條支國的位置：「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餘。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轉北而東，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後役屬條支，爲置大將，監領諸小城焉」。則條支一地，實在今之阿拉伯半島之東部矣。

由此看來，烏弋山離當位於東伊朗與阿富汗、巴基斯坦之交。「後漢書西域傳」安息條云：「安息國居和犢城，……北與康居接，南與烏弋山離接。地方數千里，小城數百，戶口勝兵最爲盛殷。其東界木鹿城，號爲小安息」。木鹿城應即馬吉安之首府謀夫（Merv）之音轉，則烏弋山離所屬領地實有部份與安息相疊了。其原因乃是因爲烏弋山離約在西元前七十五年左右，才從安息分裂出來之故。安息自米提拉德泰二世（124 ~ 88 . B.C.）平定了境內薩伽人之亂後，國勢達於極盛，在東邊，不僅收復了塞斯坦，又征服了犍陀羅，東北且到阿姆河，北接奄蔡。米提拉德泰二世卒後，其弟卓珍阿那太守弗諾里斯（Vonones，波斯作 Vananu），割地自雄，後又擴地至南阿富汗及卓珍阿那以東諸省。時約西元前五十八年。弗諾里斯於西元前一八八左右，被庶弟斯巴里利司（Spaliries 18 ~ 1 B.C.）所篡弒。到了一世紀初，卓珍阿那的政權轉到了沃塔格尼斯（Orthagnes，A.D. 10 ~ 22）之手。他以烏多菲里斯（Undophernes，或作 Gondophernes）爲亞西亞太守。未幾，烏多菲里斯稱反，並攻陷了阿利安，卓珍阿那、塞斯坦等，於是又起兵入喀布爾，逐走了當地最後的希臘國王 Harnaeus，此即「後漢書」所談的「高附國（中略）後屬安息」一事，可見漢人對於烏弋山離與安息仍有些混淆。西元四八八左右，其國又分爲兩部。烏多菲里斯仍擁有馬吉安那、阿利安，且受印度河中下游諸屬國的支持；據有卓珍阿那及鄰近地區的是他的姪子阿巴達加斯（Abdagases）。西元五二二年，阿巴達加斯復併烏多菲里斯而統一烏弋山離。

由於烏弋山離的擴張，引起了鄰近諸國的恐慌，紛向大月氏求援，終使西域又起了一番變化。「後漢書西域傳」對於月氏之再次勃興，有個簡明的陳述，其文曰：

初，月氏爲匈奴所滅，遂遷於大夏，分其國爲休密、雙靡、貴霜、胘頓、都密，凡五部。後百餘歲，貴霜翊侯丘就却攻滅四翊侯，自立爲王，國號貴霜。侵安息，取高附地。又滅濮達、罽賓，悉有其國。丘就卻年八十餘死，子閼膏珍代爲王。復滅天竺，置將一人監領之。月氏自此之後，最爲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

高附國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中略）所屬無常，天竺、罽賓、安息三國強則之，弱則失之，而未嘗屬月氏。漢書以爲五翊侯數，非其實也。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

天竺一名身毒，在月氏之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溼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而戰，其人弱於月氏，脩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盤起國，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別城數百，城置長。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以身毒爲名，其時皆屬月氏。月氏殺其王而置將，令統其人。……東離國，居沙奇城，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中略）列城數十，皆稱王。大月氏伐之，遂臣服焉。

身毒，應即Hindu或Sind之音譯，其地當在印度河下游一帶。史稱其俗與月氏同，此乃當時該地的統治者本亦自中亞遷來之故。Runula氏以爲，月氏人除了貴霜王家外，還有一系，比貴霜更早侵入印度。由於他們是跟薩伽人一起入印，故也有人以他們爲薩伽人。這一王家名爲科沙哈刺塔（Kshaharata），最早的一王名爲茂伊斯（Maues，又作Moga，20 B.C. ~ A.D. 22），本以德克希拉（Taxila）爲根據地，其後征服了烏仗那（Uddiyana，在印度河和喀布爾河下游一帶），潘坎那達（Pancanada，今旁遮普一帶

），以及梅拉陀王家和一些希臘人小邦，而擴地至馬陀拉，於是自立爲帝。茂伊斯死後，王位由卓珍阿那王斯巴里斯之子，也是茂伊斯之婿，亞吉士一世（Azes I）繼位。但新帝國却也因此而分裂，科沙哈刺塔王家的成員隨之而四散⁽¹⁷⁾。

其中有一支來到了喀克查（Kaccha，印度河下游的東南）和蘇拉斯特拉（Surashtra，今卡西瓦Kathiawar半島）。到了一世紀末，其成員中的甫瑪喀（Bhumak）被貴霜皇帝任命爲太守，後來又僱併了古加拉特、蘇拉斯特拉和拉加普大那的西半部，這一新興的勢力，又被稱爲Western Satrapies。甫瑪喀見其地位穩固，乃自立爲Mahakshatrapa（意爲大太守，或王侯，其意近於印人常用的Rajah，譯）。甫瑪喀後來被族人納哈帕那（Nahapana，A.D. 119 ~ 125）所篡。納哈帕那且一度擴張至馬陀拉，但後來被來自德干高原的薩塔弗哈納（Satavahana）王國所敗，失去了科沙哈刺塔王家南部的領土。納哈帕那卒後，科沙哈刺塔王家，被其庶系的喀達馬喀士（Kardamakas）王家所併，喀達馬喀士之名，是源於巴克崔亞的喀達瑪（Kardama）河。新王朝的建立者名爲查什坦那（Chastan），本爲貴霜治上馬爾瓦（Malwa）區之烏闍（Ujjain）地方的太守。他於併滅科沙哈刺塔王家之後，僭稱爲Mahakshatrapa，又打敗了薩塔弗哈納王國，收復了失土，而掩有了俾路支與拉爾馬德河之間的地方，時約西元一五〇年左右。後來他又想佔領其宗主——貴霜王朝在旁遮普南部的地方，結果大敗而回。魯陀曼達門（Rudradaman）爲查什坦那之孫，後繼其位，國勢仍盛。魯陀曼達門復傳子Danaidasa I，其後國內因爭王位而亂起，國勢驟衰，而被波斯之薩珊（Sassanian）王朝所征服，但該王家仍持續到西元四百年左右，才被印人的古普塔（Guptas）帝國所滅。由以上情節看來，不管科沙哈刺塔王家是月氏人或薩伽人，「西域傳」所稱其與月氏同俗，應是可信之事。

貴霜王家的源起，至今仍未有定論，究竟他們是出於大月氏或小

月氏，還在爭辯當中。桑原鷺藏在「張騫西征考」中，甚至以為是出於大夏（詳見楊鍊譯本，頁三十六、三十八）。在佛教經典（大智度論）卷二十五中，曾明言「兜跋羅」為「小月氏」。兜跋羅其實乃吐火羅之對音。在「史記」和「漢書」裡，都沒有關於小月氏曾徙於大夏之記載，則此小月氏當即是大月氏徙於燉水北之後，再分出的部份。當初月氏被匈奴所破，其脫離本部的份子，曾被冠予小月氏之名。是以居於大夏的大月氏，因離於燉水北的月氏本部，故亦被名為小月氏。由於在大夏的月氏人，後來曾建立了一個大帝國，漢書乃以大月氏之名稱之，但其相對於燉水北之月氏本族，實又有小月氏之號。所以古文獻上，貴霜有大月氏之稱，亦有小月氏之名，殆以此之故也。

月氏人到了索格底亞那之後，除了一部份侵入大夏之外，似乎不再有大規模遷徙的事情發生。換句話說，月氏本部很可能就是在索格底亞那永遠的定居下來了，其後裔，則是見於「魏書西域傳」中的康國族群，其文曰：

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常，不恒故地。自漢以來，相承不絕，其王本姓溫，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其國。枝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並以昭武為姓，示不忘本也。……為西域疆國，西域諸國多歸之。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國、烏那曷國、穆國皆歸附之。……人皆深目高鼻多髯，善商賈，諸夷交易多湊其國。

又「新唐書西域傳」云：

康者，一曰薩末鞬，亦曰稠林建（Samar-kand），……君姓溫，本月氏人，始居祁連山北昭武城，……枝庶分王，曰安（Bukhara），曰曹（Kaboudhan），曰石（Tashkend），曰米（Maimargh），曰何（Koschanyah），曰火壽，曰戊地（Wardana），曰史（Kesch），世謂九姓皆氏昭武。

「魏書」所謂的康國為康居之後，實有可論之處。康國之「康」應即

「Kand」、「Kend」、「Kent」之音轉，突厥語意為「城市」、「聚落」。如此，康國便是城國的意思，此甚合於「魏書」所記的康國之情形。故說康國之後，乃後人想當然耳的附會之詞，實亦月氏之後也。

有關燉水北之月氏的情況，史冊上鮮有說明，「史記大宛列傳」裡，提到了康居曾竊事於月氏和匈奴；但在「漢書」裡則僅說臣屬於匈奴，又「陳湯傳」曰：「西域本屬匈奴，今鄯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足見月氏在西漢中期已趨於衰弱。其原因當如張騫之言，「地肥饒，少寇，志安樂」之故。康居在鄯支單于敗亡之後，曾一度中衰，但進入東漢時代，國勢復振，奄蔡（時又作阿蘭聊，即西史上的 Alani），嚴國（在奄蔡北）和粟弋等皆屬之。「後漢書」裡所記之粟弋，僅言「粟弋國屬康居，出名馬牛羊葡萄衆果，其水土美，故葡萄酒特有名焉」。至於其位置，可由「晉書西域傳」的記載大略推知，其文曰：「康居國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列鄰接，其王居蘇薊城，風俗及人貌衣服，略同大宛，地和暖，饒桐柳、葡萄、多牛羊，出好馬……」。文中的粟弋應即「漢書」之粟弋，依其與諸國的相對位置看來，粟弋之所在大約同於索格底亞那。所以，在東漢時，月氏主部反而臣屬於康居，或許正因此，才會有康國是康居之後的說法了。

觀史、漢所說，康居之俗本同於奄蔡、月氏，都屬游牧營生。但在「晉書」裡，則言同於大宛，也就是說已棄逐水草，而改營農耕，故其民乃居住在伊犁河與錫爾河之間的多綠洲之區。康居除了在文化上有此大變外，在政治上似亦經歷了一番變亂。亨利·玉爾（Henry Yule）在「中國及所往之途」（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之序文的第五節「與亞美尼亞、波斯等之交通」裡有言：

在 Tigranes 四世（A.D. 142 ~ 178）的統治期間，有數群雜有中國人的外國移民，被安置在 Gordyene 與 Kurdis Armenia

，以捍衛此邦。

是以中亞於此刻，當有亂事發生。在「法華經」卷五，有言：

隋高僧釋智疑，姓康，本康居王之胤，先代因國難歸於（曹）魏，封於襄陽，歷十餘世。

又「高僧傳」卷十一，云：

（蕭）齊高僧釋慧明，姓康，本康居人，祖父時避地東吳。

又「通鑑」卷九十四，晉成帝咸和五年（330 A.D.）條，云：

初，丁零翟斌，世居康居，從徙中國，至是入朝於趙；趙以斌爲句町王。

亨利玉爾所稱的那一次難民潮，應該是與匈奴的潰敗西走有關，康居或許也因匈奴的入侵，而潰入南邊多山的地帶，其人遂漸漸改營農耕。至於在中國的記載裡，康居之國難，顯然是發生在三國時代，有關這次事變的原因，史無明文。但以康國爲首的昭武諸邦，卻都於此刻興起，則康居之變，多少必與昭武諸姓有關。

康國昭武集團，在擺脫了康居的統治之後，又有了積極的活動。由於地狹人稠，其民多出外經商，故以善賈聞名。以此之故又成了漠北游牧王朝對外交涉的要員，所以，在沙晚（Chavannes）的「西突厥史料」（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ks) Occidentaux）裡，曾提到最初負責西突厥與東羅馬交涉的，乃一位 Sogdiane 人，而在「唐書」裡，九姓胡，且成了回鶻可汗左右重要的顧問。除此之外，經由考古調查和古文獻所載，粟弋人不僅於怛邏斯（Talas）河、吹河和伊犁河流域有許多殖民之遺址外，甚至在羅布泊、吐魯番盆地，以至在西伯利亞薩彥嶺北的 Oka 河流域，都有其遺跡。Edwin G. Pulleyblank 在其「A Sogdian Colony in Inner Mongolia」一文中，曾引證說明了，當在唐朝之時，已有許多粟弋人供職朝廷，安祿山乃其中最著名的一位；甚至於五代後晉的石敬瑭，亦屬粟弋之類。（不過今人多以石敬瑭爲沙陀人）。

四、貴霜王朝及其後裔

嬌水南的大月氏，其際遇與在嬌水北的，迥然不同。其在進入大夏的頭一個世紀裡的歷史，亦相當模糊。但入於東漢時代，由於急劇的向外擴張，才有了較清楚的輪廓。在「後漢書」裡，這位帶領月氏人走入新時代的君主，名爲「丘就卻」，即 Kusan 帝國的 Kujiula Kadphises。此「Kusan」，亦中國史上的「貴霜」，「貴霜」一詞，印度作「Kuśāna」，希臘作「Kośano」、波斯作「Kusân」、亞美尼亞作「Kuśang」、敘利亞作「Kuśānoye」、羅馬作「Cusani」，故「後漢書西域傳」說：「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

關於丘就卻的事蹟，有「後漢書西域傳」之言：「貴霜翎侯丘就卻攻滅四翎侯，自立爲王，國號貴霜。侵安息，取高附地。又滅漢達、罽賓，悉有其國」。對於丘就卻之侵安息，大多數學者都以爲即當時的帕息帝國。但據前文所考，帕息的東部實已另外成立了一個強大的王國，名爲「烏弋山離」，而漢人有時又比之爲「安息」。丘就卻若要攻打安息勢必越其國而行，要不然就須繞道遠行；另外，再從丘就卻於統一五翎侯後的征戰，幾乎全是在對付烏多菲里斯，是以此「安息」當指「烏弋山離」而言。

丘就卻一生的征伐，似乎是傾全力於向南方的發展。其南方的大國，除了烏多菲里斯的王國外，還有一希臘裔的王國，該王國是希臘巴克崔亞王國的 Eucratides 王家的遺裔，當時的國王名爲 Hermaeus，仍統有阿富汗的中、南部。「後漢書」中的「高附」，即其國也，「高附」一語，乃源於梵文「Kubha」，爲「喀布爾」（Kabul）河之古名。雖然喀布爾一帶爲 Hermaeus 的重心所在，但是有許多烏多菲里斯所鑄的錢幣散布在喀布爾稍北之 Bagrah 和阿富汗的其他地方情形看來，Hermaeus 顯然是受制於烏多菲里斯。是以有與丘就卻聯盟以抗烏多菲里斯之舉。因爲這一段時期的歷史，少有文獻的記

載，故只得從考古方面來推測當時事情的經過。

從當時的錢幣所分布的土層而推測出的順序先後，其事情大概如下：

(1) 大約在西元紀前後之交，Hermæus統治了喀布爾河谷。因其鑄幣不僅在數量上佔了優勢，而且其銀幣的正反面，皆各以其本人及其王后之肖像為之，足見當時其統治權之穩固。

(2) 因被Gondopharnes所殺，Hermæus乃尋求Kujula Kadphises之援助，當然也可能因後兩者為求自保而主動結合。據「Takht-i-Bahi」的碑文所示，Gondopharnes似乎是在西元二十年左右稱王，而在西元二十一、四十六年之間，征服了喀布爾。再者因Gondopharnes的錢幣所散布之土層，皆在Hermæus與Kujula Kadphises合鑄之錢幣所處的土層之下，由於三位國王都是同時代的人，所以有人推測Hermæus與Kujula Kadphises之聯手，乃為對付Gondopharnes而起的。而當時兩者所合鑄的錢幣，因以Hermæus為正面，以Kajula Kadphises的肖像為反面，故有人以為Kujula Kadphises乃位於Hermæus之下。

(3) 在打敗Gondopharnes之後，Kujula Kadphises已不願再屈居於Hermæus之下，聯盟因告瓦解。是以有Kujula Kadphises仿羅馬皇帝Augustus (27 B.C. ~ 14 A.D.) 所鑄之錢幣的鑄幣之出現，足見Hermæus已見併於Kujula Kadphises，時約西元三十年。

由上所知，若安息即烏多菲里斯之王國，則其事正符合於「後漢書西域傳」所言：「高附國在大月氏西南（應為在東南之誤），亦大國也。……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

貴霜既得高附，遂謀更南進，首當其衝者乃屬賓國。其國大約是在犍陀羅一帶，屬於Gondopharnes在Taxila所設之太守的轄區之內。據希臘旅行家Apollonius約在西元四十三、四四年間，到該地遊歷所留下的記載，宣稱「當地是由一位獨立於Budyion的強大帕息

國王Bardanes之外的Phraotes所統治」，而是時烏多菲里斯在其錢幣上所顯示出其稱號正是「apratihata」，是以Phraotes應指烏多菲里斯而言。則丘就卻之征服Taxila地區應晚於西元四十四年，此或為其最後的征戰。

丘就卻年八十餘死，子閼膏珍 (A.D. 50 ~ 79) 代為王。其人即鑄幣上之Wema (又作Oemo) Kadphises。他是第一位大舉入侵印度的貴霜王。從考古的遺跡看來，在Taxila地區有座人口稠密的都市——Sirikap，曾遭Wema Kadphises的圍攻而廢絕。其遺城中尚留有許多烏多菲里斯及其繼承者Pacores所鑄的錢幣，考古學者因以為Pacores是在遭到Wema Kadphises的攻擊，而放棄了Taxila地區，退回了印度河以西的根據地去了。另外，由散布於Bergam, Peshawar, Taxila, Kalka-Kasauli road, Mathura, Gorakhpur, Bhita, Varanasi and Indore等地有許多冠有Wema Kadphises的名號的錢幣和器物看來，閼膏珍確實又大大的擴張了貴霜的版圖。「後漢書西域傳」言其，「復滅天竺，置將一人監領之」。此一將領被認為是駐紮於馬陀拉 (Mathura)。然從新近於Varanasi附近的Ghazipur及在Gujarat的Saurashtra半島所發現的當時所遺留下來的駐軍遺址看來，貴霜王朝在印度應設有許多軍事單位，以監領天竺各國。在印度，閼膏珍後來又征服了喀什米爾一帶。Wema Kadphises時代，貴霜的行政系統，乃藉由許多世襲的軍事太守來管理帝國的各地。這些軍事太守即是許多錢幣上的無名之王。Wema Kadphises與諸無名之王，都曾採「Soter Megas」(意為偉大教主)之號。但是Wema Kadphises又號為「Basileus Basileon」(意為萬王之王)，而無名之王只號為「Basileus Basileon」(意為攝政王)。這套世襲的統治系統便一直延續到貴霜亡國為止。據說，他對塔里木河谷也具有影響力，但在中國史冊上，則不見有如是之記載^⑮。

閼膏珍的繼任者，學者多以為即迦膩色一世 (Kaniska I.)

A.D. 79~101)，但於其出身頗有爭議，張星狼在「大月氏民族最近之研究」一文中提到：

據西藏文書「Li-ya-l-gyi」中言羅利甲斯（Lo-ryas-pa）爲于闐王喀甲（Ga-hjag）及后維嘉雅新哈（Vijayasimha）之女於佛教在疏勒（Shulik）之傳播甚爲有功。吾人自西藏文記載，又得知維嘉雅新哈之子維嘉雅開梯（Vijayakitti）曾與貴霜（Guzan）王及迦賦迦王（Kanika）遠征印度，克沙開德（Soked Saketa）城。西藏文此節記載指明于闐與貴霜有關係。……

迦賦色迦似乎即迦賦迦王，苟若是，則彼乃起自于闐國也。中國佛教書中似亦有言其起自于闐者。楞伽經之著成在迦賦迦王稍後，中國文譯本中有云，「丘沙族有王曰眞且嘉賦伽，征服東天竺，綏服之，四方畏其威，克善其終。歸回自國，所經皆寬曠平地」。據達斯（Saratchandra Das）之意，眞且即長丹那（Chandana），西藏文于闐國之稱謂也。眞且嘉賦伽者，猶云于闐王伽賦色迦也。至此吾不得不疑吐火羅突厥（Tukhara-Turushkes）威力發源地在于闐。……鋼和泰男爵（Baron A. de Stael Holstein）謂迦賦色迦既來自于闐，則彼似爲小月氏人而非大月氏人也^{①9}。

在「新唐書于闐傳」有言：「于闐或曰瞿薩旦那，亦曰渙那，曰屈丹，……」，所以「眞且」或指「于闐」，但「瞿薩旦那」或「屈丹」乃梵語「Kustana」或「Khotana」之音譯，而西藏語稱于闐則爲「Li yul」，因此達斯氏之說法，實值得推敲。縱或「眞且」一詞，即指于闐。但因而逕稱嘉賦伽爲于闐王，則有違於「丘沙族有王曰眞且嘉賦伽」之辭意。又班超之時，于闐國與漢關係之密切，常爲漢出兵助陣，若嘉賦伽王果爲于闐王，則「後漢書」必定會有所說明，故嘉賦伽王實非出於于闐。

迦賦色迦一世在時，又展開了連串的征討，而把貴霜的國勢推向

於頂盛。儘管佛教經典上有許多有關他的故事，但對於他的征服事業，多僅稱其曾征服天竺，亦有稱其曾侵入安息，大破安息軍。至於其他則少有記載。迦賦色迦一世曾征服東印度爲一個不爭的事實，但並不限於一般人所說的，僅止於摩竭陀（Magadha）地區，而是遠及於西孟加拉（Bengal）和Orissa一帶。有很多貴霜王的銅幣在Midnapur的Tamluk和Orissa的Mayurbhanj與Sisupalgarh都有發現。由於銅幣在外國是毫無用處的，故有以爲此正足以顯示出貴霜帝國確實已置該區於治下。此外，在印度河下游的西塞王國（The Western Satrapies）亦向其稱臣，這可由當地殘存的一些碑文中得知。迦賦色迦一世在北邊的領土，除了領有大夏外，由於在今之Uzbekistan和Khorezm、Tajikistan亦發現了貴霜王之鑄幣，並有多處貴霜人的遺址，則索格底亞那與花刺子模之部份納入於貴霜之版圖，應無異議。至於說迦賦色迦曾佔領了塔里木盆地的Kashgar、Yarkand和Khotan，則有待求證。最初，月氏以爲曾助漢擊車師有功，求漢公主，爲班超所拒，由是怨恨，永元二年（西元九十），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大破之，謝大驚，遣使請降。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是以此時之月氏王，當即迦賦色迦一世。後來漢朝退出了西域，月氏乃伸入了該地，但當時的月氏王乃迦賦色迦二世，而非一世。

迦賦色迦一世後來在一次北征的途中，因身體不豫，被屬下用棉被給活活的悶死。其後的貴霜王，分別有韋西斯加（Vashishka）、胡韋斯加（Huvishka）、迦賦色迦二世，韋斯特婆一世（Vasudeva I）和韋斯特婆二世。據在印度發現，成於貴霜時代的一些石刻，韋西斯加爲迦賦色迦二世之父，而爲胡韋斯加之兄。韋西斯加其年代不太能確定，而胡韋斯加，有人以爲大約是從西元一七二到二〇四。韋西斯加的晚年，以其弟胡韋斯加爲副王，以輔其政，故胡韋斯加又被稱爲「Devaputra Shahi」。韋西斯加去世後，胡韋斯加繼其位，而採「Maharaja Devaputra」之號。當時他似乎領有帝國

的東南半壁，而帝國的北半壁，則在韋斯加之子迦膩色迦二世的統治之下，而採「Maharaja, Rajatiraja, devaputra和Kaisara」之號。迦膩色迦二世在位時，國勢甚強，其勢力且伸入於天山南路，在Khotan和Kashgar發現的一些屬於貴霜的錢幣，多被認為是其所鑄，而非迦膩色迦一世所鑄。而前引「大唐西域記」中，威服葱嶺東及河西一帶的健馱邏國迦膩色迦王，應即指二世而言，因二世的根據地乃在Punjab、Seistan和阿富汗一帶。迦膩色迦二世因先胡韋斯加而死，故胡韋斯加得以統一貴霜帝國，而當時的北、西Kshatrapas諸邦，仍以胡韋斯加為宗主，足見貴霜國勢實亦未墜。

胡韋斯加死，子韋斯特婆一世（A.D. 208～242）代為王，他可能就是「三國志」中大月氏王波調^②，其事見於「魏書明帝紀」：「（太和三年，十二月，西元二二九）癸卯，大月氏王波調遣使奉獻，以調為親魏大月氏王」。又成書於魏正始、嘉平年間（A.D. 240～255）的「魏略」，其「西戎傳」云：「屬賓、大夏國、高附國、天竺國皆并屬大月氏。……車離國，一名禮惟特，一名沛隸王，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今月氏役稅之」。則波調在位之時，貴霜王朝仍是相當強盛。然而這種盛世在波斯的 Sassanian 王朝興起後便要破滅了。Sassanian 帝國的締造者——Ardashir Babagan（A.D. 226～241）曾侵入貴霜帝國，此或波調為求得中國之援助，而遣使中國的原因。由於貴霜的慘敗，使得其轄下的印度諸邦，如Yaudheyas, Nagas, Maghas等紛紛起來要求獨立，the Western Kshatrapas當然亦不例外。故當韋斯特婆二世在位之時，其號令所及的地方，就只有在旁無遮普和喀布爾河谷一帶。其以西的領土則在Ardashir之子Shapur I（A.D. 241～272）的攻擊下而淪入波斯人之手。在一名為「Nagsh-i-Rustam」的記功碑上，Shapur I提到：「其常勝軍攻下了貴霜王的首都Peshawar，又征服了印度河谷，然後北進，越Hindukush，佔領Bactria

，復渡Oxus河，而開入了Samarkand和Tashkent^②」。

生活在喀布爾及旁遮普的這些月氏人，到了五世紀初，似乎又曾發生了一次大遷移。「魏書西域傳」云：

大月氏國，都盧監氏城，在弗敵沙西，……北與蠕蠕接，數為所侵，遂西徙，都薄羅城，……其主寄多羅勇武，遂與師，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陀羅以北五國盡役屬之，世祖（即太武帝拓拔燾，A.D. 423～452）時，其國商人敗京師。

大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為匈奴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焉。

觀其文之所言，再次印證所謂的大月氏或小月氏，只是一種相對的稱呼，而非固定的名稱。文中於大月氏條，言其為柔然所侵，而在小月氏中，又稱為匈奴所逐，則此匈奴應即指白匈奴（乃印度人所稱之Huna），亦中國史上之嚙噠、扠怛、滑國或活國。史稱柔然曾助其建國，或即指此事而言。此外，就大小月氏之條文的比較，亦可發現，頗有可議之處。首先，其言大月氏都盧監氏城，「北史」則作騰監氏城，殆皆同於「史記」之監氏城，則其城必在嬌水之北。而薄羅城，即是今阿富汗之Balkh，亦巴克崔亞首府之所在地。所以，大月氏之徙薄羅城，應稱南徙才是，而非西徙。因此不若小月氏條之「寄多羅為匈奴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富樓沙）」來得合理，故當時的大月氏其都並不在盧監氏城，而是在富樓沙——原貴霜王朝的京師。更由此可知，寄多羅之越大山南侵北天竺之事，殆在言其勢力範圍而已，因其根據地本已在大山之南了。

據前所言，當時的嚙噠很可能是沿葱嶺西側南下，故寄多羅才能舉部西走大夏，至於留守富樓沙的小月氏，則於數十年後被嚙噠攻滅。其事可由「宋雲行紀」之記載推知，其文曰：

至正光元年（A.D. 520）四月中旬，入乾陀羅國，土地亦與烏場國相似，本名業波羅國，為嚙噠所滅，遂立勅勒為王。治國以來，已經二世。

又「大唐西域記」卷二，云：

健馱邏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八百餘里，東臨信河，國大都城，號布路沙布邏，周四十餘里，王族絕嗣。

由上所引，我們可以知道，「宋雲行紀」中的乾陀羅國，實亦即富樓沙小月氏。因正光元年時，已被嚙唃滅亡有兩世之久了。所以，其亡國應大約是在五世紀的下半葉^②。

寄多羅雖走避嚙唃於大夏，但其破敗的時間似乎要早於富樓沙方面許多。據波斯史所稱，在Sassanian皇帝Bahram V (A.D. 420-438) 時，曾有嚙唃 (Ephthalites) 人入侵波斯，在佔領了謀夫之後，又舉兵西進，直抵Rai (今伊朗之Tihiran)，Bahram V逃的不知去向，其大臣只好出面與嚙唃講和。嚙唃在獲得了一大筆財貨後，乃把軍隊撤回大夏，不料在途中，却受到了Bahram V設下的伏兵的偷襲，其王被殺，人馬及財貨損失大半，時約西元四二七年。此時嚙唃竟能以大夏做為攻擊波斯的基地，則寄多羅之見併於嚙唃，亦不至遲於西元四二七年。

就中國史料而言，自此就不再有關於月氏的記載了。但在大夏的月氏人，並非就此而消失，在沙晚的「西突厥史料」裡，曾引了一則亞美尼亞史家Sebeos所言的一段關於貴霜的記事，其文曰：

五九七至五九八年之間，質言之，東羅馬皇帝接受可汗來書之時，波斯王庫薩和Khosrou Parwiz遣大將Smbat Bagratouni討擊嚙唃Hephthalites貴霜Kouchana (大月氏)。嚙唃求援北地之大可汗，可汗援兵三十餘萬渡烏澹河Oxus，敗Smbat之軍，然旋渡河歸國。突厥軍退，Smbat復進攻，兵至貴霜都城薄羅Balkh，寇鈔全國，若Herat，Badkhis諸城以及吐火羅Tokharistan塔里堪Talekan全境，皆受其害，並奪獲城塞不少，盡毀平之，大獲戰利品而還。[Merw及Merv-er-round，結營于此。

總之，Smbat之遠征，僅為一種寇鈔而已，不特不能表示其

為一種侵略，而且表露波斯之東方境界，且見當時吐火羅、薄羅、帆延Badkhis、哈烈Herat、塔里堪諸地，咸在波斯境外，而為貴霜諸王所管理，(其中或有數人為嚙唃之後裔)，而諸王皆臣服突厥也^③。

又「新唐書西域傳」曰：

吐火羅，或曰吐豁羅，曰覲貨邏，元魏謂吐呼羅者，居葱嶺西，烏澹河之南，古大夏地，與扞怛雜處，……顯慶中(A.D. 656-660)，以其阿緩城為月氏都督府，析小城為二十四州，……是以沙晚文中的貴霜諸王，實即玄奘「大唐西域記」裡，分布在覲貨邏故國的許多小邦，而被唐人以吐火羅人稱之。

註釋

- 註①：見馮承鈞：「關於西域語之討論」，刊於「女師大學術季刊」，一卷四期，頁七七九。
- 註②：見張星烺之「大月氏民族最近之研究」，刊於「禹貢」半月刊，五卷八、九合期。
- 註③：見馮承鈞：「大月氏民族及其研究之結論」，刊於「禹貢」半月刊，五卷八、九合期。
- 註④：詳氏所著：「Notes On The Physical Anthropology of Chinese Turkestan and The Pamirs」，收於斯坦因之「Serindia」冊三之附錄，頁一三五～一六三。
- 註⑤：見方壯猷：「三種古西域語之發現及其考釋」，刊於「女師大學術季刊」，一卷四期。
- 註⑥：詳氏所著：「The language of Ancient Khotan」，刊於「Asia Major」II, 1925。
- 註⑦：白鳥庫吉在其「西域史上的新發現」之「康居考」中，以為康居是屬於突厥系民族。

中共「西藏自治區」行政區劃現況及其沿革

宋武

西藏地方原有行政單位名稱，藏語稱「宗」（意為碉堡、營寨），初係封建領主為保衛其世襲之地，據山腹險要之處建立城堡，遇外力入侵用以保護其屬民生命財產之所。從唐吐蕃贊普時代，歷經元、明主掌藏地政權之薩迦派（花教）王朝、迦舉派（白教）帕摩竹巴王朝、噶瑪派（紅教）藏巴汗等，「宗」之性質仍偏重於自衛之軍事碉堡性質。至清初，藏地格魯派（黃教）五世達賴之第巴、桑結嘉措操權，始將歷代原建及新設之各「宗」，統納於其轄下並規劃「宗」之任務，至此「宗」乃由軍事碉堡而漸具地方行政單位雛型，「宗」治之設立亦不限於山隘險要之處。清乾隆五十七年廓爾喀入侵西藏，清廷派兵入藏平定亂事，翌年頒定「治理西藏章程」，規定西藏噶倫以下官吏之品級，將「宗本」（營官）分為「大」、「中」、「小」及「邊」營四等，所有營官缺分，悉加查明寫立檔冊存案，以便遵守，並詳列營官陞補之法，至此「宗」之於西藏地方，遂成定制，「宗」約相當於內地之「縣」。民國以後，西藏地方復於「宗」之上，次第設立「洛」、「藏」、「卓木」、「絳」、「堆」、「隆味」等六個「基巧」（藏語意為總管），基巧駐在地附近之各宗，俱受其管轄，其地位相當於內地之行政專員公署。

民國三十八年，中共偽政權成立，西藏分地方政府直轄地區、多麥基巧、洛喀基巧、絳曲基巧、堆里噶本等部分，及日喀則基宗。民國三十九年十月中共入據昌都地區，設立昌都地區人民解放委員會，隸屬於中共西南軍政委員會。民國四十年五月廿三日中共與西藏地方政府簽訂「關於和平解放西藏地方辦法的協議」十七條，西藏淪入鐵幕。中共將西藏劃由中央直接領導，西藏地方政府設拉薩直轄區和多麥

基巧，洛喀基巧（通稱山西區）、堆里噶本（阿里）、絳曲基巧、卓木基等六區。民國四十二年，中共政務院批准成立班禪堪布會議廳委員會。民國四十三年，西藏增設及改設塔工基巧、藏區、衛區。民國四十四年三月，中共國務院第七次會議通過關於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決定。民國四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在西藏拉薩正式成立，昌都地區劃歸西藏自治區管轄。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統一管轄「西藏地方政府」、「昌都地區人民解放委員會」、「班禪堪布會議廳委員會」。此時西藏地方和昌都地區已成立拉薩、日喀則、昌都、黑河、塔工、山南、江孜、阿里等八個「基巧」級辦事處（相當於專署）和五十多個「宗」級辦事處（相當於縣）。民國四十九年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將原八十三個「宗」和六十四個相當於「宗」之獨立「谿卡」合併設立拉薩市及那曲、昌都、林芝、山南、江孜、日喀則、阿里等七個專區，共轄七十二縣。民國五十三年撤銷林芝、江孜二專區。民國五十四年九月九日西藏自治區正式成立，轄拉薩市及那曲、昌都、山南、日喀則、阿里專區，自治區面積一百二十多萬平方公里，自治區人民政府駐拉薩市。民國五十九年，那曲、昌都、山南、日喀則、阿里五專區，分別改為地區。民國七十二年恢復設立林芝、江孜兩地區。民國七十五年江孜地區撤銷。至民國七十八年，西藏自治區所轄行政區劃現況及其沿革分述如次：

一、「西藏自治區」轄區現況：

西藏自治區轄地級市一；地區六；縣級市一；縣七十六。
1. 拉薩市：自治區首府，轄林周縣（駐旁多村）、當雄縣（駐當

曲卡)、尼木縣(駐塔榮)、曲水縣(駐雪村)、堆龍德慶縣(駐朗嘎)、達孜縣(駐德慶)、墨竹工卡縣(駐工卡)等七縣。

2. 昌都地區：駐昌都縣(駐城關鎮)、江達縣(駐江達)、貢覺縣(駐莫洛)、類烏齊縣(駐熱扎卡)、丁青縣(駐甲木塘)、八宿縣(駐白馬)、左貢縣(駐汪達)、芒康縣(駐嘎托)、察雅縣(駐烟多)、洛隆縣(駐孜托)、邊壩縣(駐東馬同)、碧土縣(駐碧土公社)、鹽井縣(駐下鹽井公社)、妥壩縣(駐妥壩公社)、生達縣(駐生達公社)等十五縣。

3. 山南地區：駐乃東縣(駐乃東)、扎囊縣(駐扎唐)、貢噶縣(駐臘麥)、桑日縣(駐桑日)、窮結縣(駐窮結雪)、曲松縣(駐曲松)、措美縣(駐當許)、洛扎縣(駐嘎波)、加查縣(駐仲壩)、隆子縣(駐機當)、錯那縣(駐錯那)、浪卡子縣(駐浪卡子)等十二縣。

4. 日喀則地區：駐日喀則市。轄日喀則一市；南木林縣(駐南木林雪)、定日縣(駐協嘎爾)、薩迦縣(駐薩迦雪)、拉孜縣(駐曲下)、昂仁縣(駐昂仁雪)、謝通門縣(駐吉丁)、定結縣(駐江嘎)、仲巴縣(駐扎東)、吉隆縣(駐宗嘎)、聶拉木縣(駐冲堆)、薩嘎縣(駐加加)、江孜縣(駐江孜鎮)、康馬縣(駐康馬)、亞東縣(駐下司馬鎮)、崗巴縣(駐崗巴雪)、仁布縣(駐強欽雪)、白朗縣(駐洛布窮孜)等十七縣。

5. 那曲地區：駐那曲縣(駐那曲鎮)、嘉黎縣(駐阿扎)、比如縣(駐比如雄)、聶榮縣(駐色貢)、安多縣(駐帕那)、申扎縣(駐申加低布)、索縣(駐贊丹雪)、班戈縣(駐普保)、巴青縣(駐達爾唐)、尼瑪縣(駐尼瑪)等十縣。

6. 阿里地區：駐噶爾縣獅泉河。轄普蘭縣(駐普蘭)、扎達縣(駐托林)、噶爾縣(駐昆沙又稱噶爾新村)、日土縣(駐日土)、革吉縣(駐那布)、改則縣(駐魯瑪仁波)、措勤縣(駐門董)、隆格爾縣(駐隆格爾公社)等八縣。

7. 林芝地區：駐林芝縣八一鎮。轄墨脫縣(駐墨脫村)、林芝縣(駐普拉)、波密縣(駐扎木)、朗縣(駐朗村)、米林縣(駐東多村)、工布江達縣(駐果林卡)、察隅縣(駐吉公)等七縣。

二、「西藏自治區」各地區、市、縣之行政區劃沿革：

1. 拉薩市：

民國四十年，中共進入西藏後，設拉薩直轄區，拉薩墨本管轄拉薩市區中心部分(林廓路以內)；雪巴列空管轄拉薩市郊洛麥谿、朗如谿、札什谿、折布林谿、蔡谿、蚌堆(仲堆)谿、列烏谿、南木杰崗谿、隆巴谿、扎谿、昌谷谿、聶當谿、江谿、東嘎宗、南木吉才谿、曲隆谿、古崩堂谿、德慶宗等十八宗谿。

民國四十三年，拉薩墨本管轄拉薩市；衛區總管轄尼木門喀谿、曲水宗、羊八井郭巴、麻江郭巴、堆龍德慶宗、撒拉谿、朗塘谿、卡孜谿、林周宗、墨竹工卡宗、東嘎宗、德慶宗、達孜宗、蔡谿、列烏谿、南木杰崗谿、洛麥谿、協仲谿、扎什谿、曲隆谿、折布林谿、南木谿、聶當谿、朗如谿、蚌堆谿、札谿、隆巴谿、昌谷谿等二十八宗谿。

民國四十九年，將拉薩墨本及衛區總管轄區設拉薩市，原屬絳曲基巧之當雄、達木曲柯爾、白倉谿、達波錯色、旁多谿、劃入拉薩市。將折布林谿、洛麥谿、朗如谿、蔡谿、曲隆谿、札什谿，併入拉薩市區；以林周宗與旁多宗、撒拉谿、朗塘谿、卡孜谿合併設林周縣(駐松盤)；以當雄與羊八井郭巴、寧中郭巴、納木湖郭巴等合併設當雄縣(駐當曲卡)；以達孜宗與德慶宗、蚌堆谿合併設達孜縣(駐德慶村)；以墨竹工卡宗設墨竹工卡縣(駐塔巴村)；以曲水宗與色谿、南木谿、協仲谿、聶當谿合併設曲水縣(駐雪村)；以尼木門喀谿與麻江郭巴合併設尼木縣(駐塔榮)；以堆龍德慶宗與列烏谿、東嘎宗合併設堆龍德慶縣(駐朗嘎)。拉薩市共轄當雄、尼木、曲水、堆龍德慶、達孜、林周、墨竹工卡等七縣。

民國五十三年，原林芝專區所屬林芝（駐尼池村）、米林（駐東多村）、工布江達（駐介德）、墨脫等四縣劃歸拉薩市。墨竹工卡縣治遷駐工卡；林芝縣治遷駐普拉。拉薩市轄十一縣。

民國六十四年，林周縣治由松盤遷駐旁多。

民國七十二年，拉薩市轄之米林、墨脫、林芝、工布江達等四縣劃入恢復設置之林芝地區。拉薩市共轄林周、當雄、墨竹工卡、尼木、達孜、曲水、堆龍德慶等七縣。

2. 昌都地區：

民國三十九年十月廿三日中共進入昌都地區後，設立昌都地區人民解放委員會。人民解放委員會駐昌都宗，轄昌都、察雅、江卡、塩井、三岩、貢覺、左貢、八宿、桑昂曲（察隅）、邊壩、洛隆、碩督、類烏齊、江達、鄧柯、丁青、色扎、尺牘、博德、博翟、博麥、街頓、拉多等二十三宗。

民國四十三年，博德宗改為傾多宗、博翟宗改曲宗、博麥宗改為易貢宗、街頓宗改為沙丁宗。昌都地區直轄昌都、察雅、左貢、八宿、江卡、拉多、貢覺、江達、類烏齊、西鄧柯（鄧柯）、碩督、洛隆、三岩、塩井、桑昂曲等十五宗；並設立二辦事處：第一辦事處轄三十九族地區，包括丁青、色扎、尺牘、巴慶（巴青）、聶榮、比如、邊壩、索宗、沙丁、嘉黎等十宗；第二辦事處轄波密地區傾多、易貢、曲宗等三宗。

民國四十五年，昌都地區劃歸西藏自治區。昌都地區直轄十五宗；第一辦事處轄三十九族地區丁青等十宗；第二辦事處轄波密地區傾多等三宗。

民國四十九年，設昌都專區、專署駐昌都縣。以昌都宗與拉多宗合併設昌都縣；以江達宗與西鄧柯宗合併設江達縣（駐江達）；以貢覺宗與三岩宗合併設貢覺縣（駐莫洛）；以察雅宗設察雅縣（駐烟多）；以左貢宗設左貢縣（駐亞中）；以江卡宗（芒康宗）與塩井宗合併設寧靜縣（駐嘎托）；以桑昂曲宗設桑昂曲縣（駐吉公）；以八宿

宗設八宿縣（駐同卡）；以洛隆宗與碩督宗合併設洛隆縣（駐洛隆）；以邊壩宗與沙丁宗合併設邊壩縣（駐邊壩）；以丁青宗與色扎宗、尺牘宗合併設丁青縣（駐甲木塘）；以類烏齊宗設類烏齊縣（駐類烏齊）。將嘉黎宗、傾多宗、易貢宗、曲宗劃歸林芝專區；巴慶宗（巴青）、比如宗、聶榮宗、索宗劃歸那曲專區。撤銷第一辦事處及第二辦事處。昌都地區轄昌都、江達、貢覺、寧靜、洛隆、丁青、邊壩、察雅、桑昂曲、八宿、類烏齊、左貢等十二縣。

民國五十年，八宿縣治由同卡遷駐白馬。

民國五十三年，原林芝專區所屬之波密縣（駐扎木）劃入昌都專區，轄十三縣。

民國五十四年，寧靜縣改名為芒康縣。

民國五十五年，桑昂曲縣改名為察隅縣（駐吉公）。

民國五十九年，昌都專區改為昌都地區，駐昌都縣。洛隆縣治由洛隆遷駐孜托；邊壩縣治由邊壩遷駐草卡區之東馬司。昌都地區轄十三縣。

民國六十年，左貢縣治由亞中遷駐汪達。

民國六十四年，類烏齊縣治由類烏齊遷駐熱扎卡。

民國七十二年，昌都地區之察隅、波密二縣劃入恢復設置之林芝地區。新設塩井縣（駐下塩井）、妥壩縣（駐妥壩）、碧土縣（駐碧土）、生達縣（駐生達）。昌都地區轄昌都、貢覺、左貢、洛隆、丁青、江達、察雅、芒康、八宿、邊壩、類烏齊、塩井、妥壩、碧土、生達等十五縣。

3. 山南地區：

民國四十年，中共進入西藏後，設洛喀基巧（即山南總管），公署駐乃東。轄乃東宗、貢嘎宗、堆谿、札囊宗、札朗宗、桑耶宗、瓊結宗、溫宗、桑日宗、沃卡宗、拉加里宗、拉緩谿、加查宗、朗宗、古如朗木杰谿、隆子宗、錯那宗、哲古谿、達馬谿、拉康谿、僧格宗、多宗等二十二宗谿。

民國四十三年，中共將拉綏綏、加查宗、朗宗、古如朗木杰綏劃歸塔工總管管轄。洛喀總管管轄溫宗、桑日宗、沃卡宗、拉加里宗、乃東宗、瓊結宗、札期綏、札囊宗、哲古綏、達馬綏、拉康綏、僧格宗、多宗、隆子宗、桑耶宗、貢嘎宗、堆綏、錯那宗、澤當、頻章綏、雅堆宗、嘉玉綏、覺拉綏、門達旺、浪卡子宗、嶺綏、白地宗、夏洛、夏江、杰得秀綏等三十宗綏。

民國四十九年，設山南專區，專署駐乃東縣澤當。原塔工總管所轄之拉綏綏、加查宗、朗宗、古如朗木杰綏、金東綏劃入山南專區。以乃東宗和澤當設乃東縣；以桑日宗、沃卡宗、溫宗等設桑日縣；以拉加里宗設拉加里縣（駐曲松）；以隆子宗與覺拉綏、嘉玉綏合併設隆子縣；以錯那宗設錯那縣；以哲古綏與達馬綏合併設哲古縣（駐當許）；以瓊結宗設瓊結縣；以多宗與僧格宗、拉康綏合併設洛扎縣（駐嘎波）；以貢嘎宗及堆綏、札囊、隆巴綏、昌谷綏、杰得秀綏等合併設貢嘎縣（駐臘麥）；以札囊宗與桑耶宗、札期綏合併設札囊縣；以加查宗和拉綏綏合併設加查縣（駐仲壩）；以朗宗與金東綏、古如朗木杰綏合併設朗縣（駐朗村）。山南專區轄乃東、桑日、加查、朗縣、拉加里、隆子、錯那、哲古、瓊結、洛札、貢嘎、札囊等十二縣。

民國五十三年原江孜專區所屬之浪卡子、打隆兩縣劃入山南專區。撤銷打隆縣，併入浪卡子縣，山南專區轄十三縣。

民國五十四年，拉加里縣改名為曲松縣；哲古縣改名為措美縣。民國五十九年，山南專區改為山南地區，地區駐乃東縣澤當。轄十三縣。

民國七十二二年，山南地區之朗縣劃入恢復設置之林芝地區；將浪卡子縣劃歸恢復設置之江孜地區。山南地區轄乃東、扎囊、貢嘎、桑日、窮結、曲松、措美、洛札、加查、隆子、錯那等十一縣。

民國七十五年，江孜地區撤銷，所轄之浪卡子縣劃歸山南地區管轄，山南地區轄十二縣。

4. 日喀則地區：

民國四十年，中共進入西藏後，將彭錯林宗、拉孜宗、昂仁宗、康巴宗等四宗及謝通門、梅康薩、打那仁欽孜、金龍、蘭倫繞等五相當於宗之綏卡，劃由班禪堪布會議廳管轄；日喀則基宗（總管兼宗本）計轄日喀則宗、帕里宗、仁布宗、白朗宗、江孜宗、定結宗、協嘎爾宗、色仁孜宗、吉隆宗、宗嘎宗、薩嘎宗、南木林宗、拉布綏、嘉錯綏、領嘎爾綏、杜窮綏、汪丹綏、聶拉木宗、絨綏、定日綏、薩迦寺等宗綏。

民國四十三年，設藏區總管，轄原日喀則基宗所轄之宗綏。

民國四十九年，將班禪堪布會議廳及藏區總管轄區改設日喀則專區，專署駐日喀則縣。以日喀則宗與蘭倫繞綏合併設日喀則縣；以南木林宗與拉布綏、嘉錯綏、領嘎爾綏合併設南木林縣；以定結宗與康巴宗、金龍綏等合併設定結縣（駐崗嘎）；以薩迦寺綏、色仁孜宗等合併設薩迦縣；以拉孜宗和彭錯林宗合併設拉孜縣；以定日綏與協嘎爾宗合併設定日縣（駐江嘎）；以昂仁宗與梅康薩等合併設昂仁縣；以謝通門綏與打那仁欽孜等綏合併設謝通門縣（駐通門）；以聶拉木宗和絨綏綏合併設聶拉木縣（駐冲堆）；以吉隆宗和宗嘎宗合併設吉隆縣（駐宗嘎）；以薩嘎宗設薩嘎縣。日喀則專區轄日喀則、南木林、定結、薩迦、拉孜、昂仁、謝通門、定日、聶拉木、吉隆、薩嘎等十一縣。

民國五十一年，原屬阿里專區之仲巴縣（駐扎東）、劃入日喀則專區。轄十二縣。

民國五十三年，原江孜專區所屬江孜、康馬、仁布（駐強欽雪）、亞東（駐下司馬）、白朗、崗巴等六縣劃入日喀則專區。撤銷崗巴縣，併入定結縣；撤銷薩嘎縣，併入吉隆、昂仁、仲巴三縣。白朗縣治由覺洛遷駐洛布窮孜。日喀則專區轄十六縣。

民國五十四年，恢復薩嘎、崗巴二縣。拉孜縣治由拉孜遷駐曲下。轄十八縣。

民國五十七年，謝通門縣治由通門遷駐吉丁。

民國五十九年，日喀則專區改爲日喀則地區，地區駐日喀則。轄十八縣。

民國六十年，定日縣治由崗嘎遷駐協嘎爾。

民國六十一年，薩嘎縣治由薩嘎遷駐加加。

民國七十二年，江孜、康馬、仁布、亞東、白朗、崗巴六縣劃入恢復設置之江孜地區。日喀則地區轄十二縣。

民國七十五年，江孜地區撤銷，所轄之江孜、康馬、仁布、亞東、白朗、崗巴六縣劃入日喀則地區。日喀則縣改設日喀則市，日喀則地區駐日喀則市，轄一市、十七縣。

5. 那曲地區：

民國四十年，中共進入西藏後，設絳曲基巧，公署駐黑河。轄拉薩北部羌塘牧地及黑河一帶之申扎宗、朗如宗、朋己宗、白倉、達木蒙古（當雄）、納曲（黑河）等六宗。另達木薩迦宗則由班禪堪布會議廳管轄。

民國四十三年，絳曲基巧黑河宗、聶榮宗、巴青宗、索宗、比如宗、尺牘宗、沙丁宗、嘉黎宗、朗如宗（江龍宗）、當雄、達木曲柯爾、白倉谿、達波錯斯、旁多谿等十四宗谿。

民國四十九年，設那曲專區，專署駐黑河縣，以黑河宗及恩果設黑河縣（駐那曲卡）；將當雄、達木曲柯爾、白倉谿、達波錯斯（色）

、旁多谿劃歸拉薩市，原屬昌都地區之巴慶宗（巴青）、比如宗、聶榮宗、索宗劃入那曲專區。以達木薩迦及南木錯、曲柯爾設達木薩

迦縣（駐扎倍達）；以朗如宗之西南部和新格爾設班戈縣（駐普保）；以申扎宗改設申扎縣（駐甲覺底布）；以黑河宗之北部與朗如宗之

東北部設安多縣（駐帕那）；以巴慶宗（巴青）設巴青縣（駐拉西堂）；以比如宗設比如縣（駐比如雄）；以聶榮宗設聶榮縣（駐色貢鄉）

；以索宗設索縣（駐贊丹雪）。那曲專區轄黑河、巴青、比如、班戈、安多、聶榮、索縣、達木薩迦、申扎等九縣。

民國五十三年，原屬林芝專區之嘉黎縣劃歸那曲專區。撤銷達木

薩迦縣、併入班戈縣。那曲專區轄九縣。

民國五十四年，黑河縣改名爲那曲縣。

民國五十五年，嘉黎縣治由嘉黎村遷駐達瑪。

民國五十九年，那曲專區改爲那曲地區，地區駐那曲縣。轄九縣。

民國六十四年，巴青縣治由拉西堂遷駐達爾唐。

民國七十二年，嘉黎縣治達瑪改阿扎。以申扎、班戈二縣之部分區域設立尼瑪縣（駐尼瑪）。那曲地區轄十縣。

6. 阿里地區：

民國四十年，中共進入西藏後，堆里嘎本駐噶大克（即噶爾雅沙）。

轄布達巴、日土、噶大克。

民國四十三年，設阿里總管、轄仲巴洛強、普蘭宗、札布讓宗、達巴宗、日土宗、噶大克等宗谿。

民國四十九年，設阿里專區，專署駐噶爾昆沙。以噶爾宗設噶爾

縣（駐雅沙）；以日土宗設日土縣；以革吉設革吉縣（駐那坡）；以

改則設改則縣（駐隆仁，又稱魯瑪仁波）；以仲巴洛強設仲巴縣（

駐札東）；以普蘭宗設普蘭縣；以札布讓宗與達巴宗合併設札達縣（

駐托林）。轄七縣。

民國五十一年，仲巴縣劃歸日喀則專區。阿里專區轄六縣。

民國五十五年，阿里專區署治由噶爾昆沙遷駐噶爾縣獅泉河。噶

爾縣治由雅沙遷駐昆沙（又稱噶爾新村）。

民國五十九年，阿里專區改爲阿里地區，地區駐噶爾縣獅泉河。

由改則縣之路南四區設立措勤縣（駐門董）。阿里地區轄七縣。

民國七十二年，以仲巴縣部分區域設立隆格爾縣（駐隆格爾鄉）

。阿里地區轄八縣。

7. 林芝地區：

民國四十年，中共進入西藏後，除白瑪桂（墨脫）屬多麥基巧外

，其他地區爲地方噶廈政府管轄

民國四十三年，設塔工總管，管轄拉綏谿、古如朗木杰谿、加查

（文轉22頁）

蒙古及蒙古人(四)(待續)

三、牛

在蒙古的牛就是所謂的蒙古牛，從古以來生存於蒙古地方一直發展而來者。所以和馬一樣能耐於寒冬、乾燥以及冬季的草料不足，其性質特為強健。

在蒙古服役家畜當中，牛的唯一用途為拉車，其他地方全不使用。在中國牛專成了耕牛使用於耕作方面，但在蒙古僅用於拉箱車及貨物車，如人類移動為搬運貨物傢俱家財而使用之。更具體一點說就是自家用的輸送工具，多數用於遊牧地點轉移以及其他有所必要時用之而已。

蒙古牛其外貌與山東牛相比體軀稍為矮小些，比東北牛大些，可稱性質溫順體質強健。又和馬同樣有堅強的團體性、平常對母牛二十頭至三十頭當中以有一頭種公牛為一群、種公牛之外的其他公牛都是去勢的。母公牛都在三歲後行交配，一般繁殖期間大概都要到八歲左右為止。

蒙古牛對蒙古人生活用不着說供給其肉與乳。但牛肉未必是蒙古人的常用食物，因而僅為食用屠殺之事極為稀少。其乳及乳酒和其他乳製品對蒙古人來講是最要緊的飲食物。牛糞更是蒙古草原地帶的最重要燃料。蒙古牛因全吃草長大其糞與我國等以濃厚飼料所養的牛糞不同其凝固性稍有鬆懈。那個被蒙古強烈日光照射發乾點點散佈於草原各處。提着籃子的蒙古小女孩集聚這些牛糞再攤於地面散開曬乾之後予以堆積、保存作為燃料。火力相當強並能持久，係為蒙古人在草原生活上不可缺少的一種東西。

蒙古牛除種公牛之外都予以去勢，其去勢牛就是閹牛有很多出現於東北市場。在東北稱這種牛為草牛。其意就是僅吃草長大未曾攝取

濃厚飼料的牛之謂。普通蒙古閹牛全體重量約為三百三十斤（八十八貫）乃至四百斤（百七貫），屠體率為百分之四十五乃至百分之四十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肥滿草牛也不在少數。純肉出產率為百分之三十四乃至百分之三十五，以生體量之三分之一略強計算之。就像這樣蒙古牛的屠肉量很少，又在筋之間缺乏脂肪，其肉色惡劣、為價值甚低的肉牛。

蒙古牛乳，其乳泌量雖少，可是含脂肪量甚高，約有百分之四點六乃至百分之六點零，平均有百分之五點三以上，因之製造黃油及其他乳製品非常適合。

蒙古牛當然以皮革供給社會，只是蒙古草原地帶牛蠅太多，因而被牛蠅叮咬穿孔，所以蒙古牛皮價值低廉，毛雖缺乏光澤，但其冬毛長度可達十二厘米以上，長得既茂密又強又直，在長的剛毛之間混雜着絨毛，這和羊毛一樣可成為毛氈，絨毯的原料。多與羊毛混雜使用之。

四、駱駝

駱駝被稱為沙漠之船，但使用駱駝不僅限於沙漠地帶廣大的蒙古草原地帶，中國北部平原山嶽地帶都可以使用。因其馱載量多且極能耐寒和乾燥以及行軍力強。但是蒙古、中國駱駝不習於熱天，不宜便用於暖和地方，僅限在中國北部之山東省及河南省的北部一帶能使用。

亞細亞駱駝分為阿拉伯種和巴庫圖利岸種二種。前者是雙峰駱駝後者為單峰駱。在蒙古、西藏及中國所分佈的是阿拉伯種。至於巴庫圖利岸種在中央亞細亞氣候溫暖的平原地帶所飼養。在蒙古及中國地方者又分作二種，在蒙古地方者稱為蒙駝，在山西省地方者稱為漢駝。

米內山庸夫 原著
恩和塞汗 譯

前者體高約有二米，體重約有四六〇斤，後者體高稍小約一點六米，體重四〇〇斤左右。

駱駝性情溫順能耐酷寒和乾燥，並堪忍受饑渴，適應粗食等為其特徵。想起駱駝把那個長臉擺平望着天空的姿勢行走，其所有之雙峯為牠的特色，其以水平伸長之臉的前端有鼻孔，鼻孔之活動力極大，把這個張開變為大孔，若一旦閉之變為極小的細孔。又其雙峯有時候崩然隆起，有時候如同凋謝垂下。駱駝鼻孔之關閉恰好如同眼睛瞳孔為調節光線情形而關閉，想必是沙漠之中寒暖無常，為調節由空氣或大風所吹揚而來的砂石之進入。背上的雙峯稱之為駝峯，其中存儲着脂肪，吃草有了相當程度攝取了營養，駝峯自動隆起這表示其體力相當堅強。駝峯有陷落情形是證明其體力已趨衰弱。駱駝和其他家畜不同，極適合於粗食。沙漠地帶缺乏液汁東西，荒草或曹達地帶所長的野草及灌木等照樣很喜歡吃，結冰時期吃冰，能耐渴沒有水時夏季六、七日，冬季約十天左右一滴水不喝也能過得去。

駱駝普通公駝一頭約有二十頭左右母駝之比率放牧。駱駝妊娠期間為十二個月乃至十三個月，普通其所分娩者都是一頭，偶然有孿生。其分娩比率大致上兩年半有一回。小駱駝到三歲之後受乘騎之調教，四歲時使其載駝成駝之半數貨物，俟其體軀成熟之後才使其載駝全數，大致上到六歲左右其體力方能完全充實。能使用期間為大致是從六歲到三十歲左右。有時候還可以使用到五十歲。

駱駝使用於乘騎、駝轎、駝載、拉車及拉轎。蒙古人隨駱駝商隊行動多數乘騎駱駝。有時候，蒙古喇嘛等乘單獨駱駝往復於西藏之間。蒙古人僅往復於草原地帶時專乘馬匹、橫斷沙漠向新疆、西藏方面長途旅行時非乘騎駱駝不可。駝轎就是所謂的駱駝轎，前後各套一頭駱駝當中扛轎，其轎中坐人。駝載係很廣闊使用的方法，其背上搭載搬運之貨物，載重量為三百五十斤（約二百斤）乃至四百斤（約二百三十斤），大約可抵馬的二倍。用以駱駝拉車和使用牛一樣，並在冬季降雪時用以拉轎。

駱駝在外蒙古及西蒙古多，內蒙古及中國東北蒙地比較據說在外蒙古的駱駝數目大約有三十七萬頭之多。

從事於沙漠長途旅行有數百頭駱駝成隊前進係為常事。這就是所謂之 *Caravan*，即駱駝商隊。這種大商隊多數用於蒙古由東到西的駝運。到九一八事變前為止向例往復於張家口或從歸化城（即今之呼和浩特）到新疆的吐爾番、哈密之間曾用過此種駱駝大商隊。從新疆輸出棉花、羊毛、乾燥果實等，從張家口方面往新疆載運雜貨。這些商隊大部份均由漢人來帶領著，多以從二、三百頭到七、八百頭不等，偶然還有過千餘頭相連的大商隊。事變後這條路被廢止。

駱駝隊例由五、六頭至約十頭為一組，結於各組駱駝鼻環的皮繩綁在前面駱駝的鞍上，如此相互連結著，各組相連組成一隊，行進中的距離駱駝與駱駝之間隔約六尺，組與組之間約需十間房屋之間隔。小駱駝及體弱者或載貨量重者，使行於前，強健者或載運輕度貨物者置於隊後，最後駱駝繫有鐸，即大形鈴鐸、嘎郎——之鐸音響於大平原之上在沙漠或草原前進。

駱駝一如前述約載運三百五十斤的貨物一日能走四十公里。不受道路狀況或天氣的影響，可以繼續不斷的行走，約三十日不休息。只是駱駝因強於寒冷弱於熱天、夏季在有良草之處放牧讓其休養使之有充分的體力，普通由九月開始到第二年四月左右為役使期間。若在夏季役使時，於旅途中須時時使其休息，且在沙漠中躲避白天的炎熱，專在夜間行走，勢必採取此種特別措施不可。

如上所述，駱駝是沙漠地帶的重要役使之家畜，此外還供給駝毛。駱駝毛普通是褐色其色有濃有淡。以淡黃褐色者為最多。也有稀少的白色或黑色。白色駱駝以高貴物珍重之，即如前述清朝時代成為外蒙古的貢品來進貢。

駱駝毛全身絨毛很多，這就是所謂之駝毛，毛質優良係為貴重的防寒用毛織原料。從前膊及頸下到胸部為止有長毛，其毛稍硬，而公駝的較比母駝的長。此種長毛可為毛繩原料，在蒙古主要用之以壓蒙

古天幕頂間毛氈之用。每年有一次換毛期時間是五月，需要一個月期間逐漸的脫落，駱駝的換毛與其他家畜不同，其他家畜與脫毛之同時長新毛，而駱駝毛脫光後，有一段期間是裸體，等過完夏季熱期進入秋天才生長新毛。一頭駱駝脫毛量約為八斤（三疋）至十二斤（四、五疋）據稱其中絨毛的比率約六成，長毛約四成。

駱駝乳可為蒙古人的飲料，其肉平常雖不大吃，但在沙漠地帶等長途旅行時，倘若缺乏食料也有把牠殺食之可能。骨頭在中國作種種骨制品。

五、犬

除以上羊、馬、牛、駱駝之外，在蒙古家畜中尚有犬。犬在蒙古也和其他家畜一樣不可或缺，決不是為娛樂或愛玩而養犬。牠擔任着蒙古人守更、或家畜的看夜，在蒙古人遊牧生活上不能不沒有的畜類。

蒙古的犬就是所謂之蒙古犬，在內蒙古地方所飼養的犬，其體軀細長，毛短而耳立，細尾巴長腳，移動極為輕快，且其性格慍悍，據稱能跳越丈餘之高牆，在東北呼倫貝爾地方及外蒙古地方所飼養者，與此種類稍有不同，其體軀巨大毛長，臉粗耳朵下垂，尾巴長而粗，且其性極為猛烈，呼倫貝爾地方之蒙古犬毛以黑色為主，帶有一點紫斑，帶有黑白斑的也有。

蒙古人不管那一家至少養有二、三隻犬，那些犬成為更犬極為忠實且性情慍悍，不認識的生人決不准靠近。所以訪問蒙古人家時，必先從遠處高喊「*ya ya ya*」不可。*ya ya ya*」之語係蒙古語「請給注意犬」之意。如此則出來多數蒙古女子把狗看管起來。

到蒙古內部地方有狼，那些個狼常襲擊家畜，到蒙古要說是壞蛋就是狼，有充分理由可以說牠是家畜的盜賊，因之狼對蒙古人來講實在是一個有害東西。犬也是防狼的家畜更犬。蒙古狼的目標是家畜，據說有狗則狼決不敢接近。因蒙古家畜羊也好、馬也好幾百幾百的成群在草原睡覺，到夜間若沒有這種犬守看，則將無法避免狼之來襲，

所以蒙古犬負有這種重大任務。

又蒙古家畜在放牧的時候，因馬、牛都有團體性，管理上比較容易，但羊不像長、牛那樣有堅強的團體性，稍一不慎，就跑散在各處，放牧有三千隻五千隻之稱的羊群，在管理上不像馬、牛那麼容易。在其羊群之中混雜着山羊有引導作用之事前已述及，與牠同時蒙古人還使用犬，犬善解蒙古人意把遠散的羊逐回集中。

蒙古犬當獵犬使用也很優秀，特別是在內蒙古地方的體軀細長之犬，可能就由原來獵犬發展而來。現在蒙古人不大狩獵，偶然除在草原追逐野兔外，不大有役使獵犬之事。

在蒙古的蒙古犬其主要任務為作人類及家畜的更大。並且當其一旦死去時供給毛皮。北方蒙古犬的毛皮毛很長是個上好的優良毛皮。

六、犂牛和馴鹿

照以上所說羊、馬、牛、駱駝、犬，就是蒙古家畜。蒙古人固有的家畜僅就是這幾種。除此無他。豬、雞、驢騾等那是東北，中國的家畜並非是蒙古家畜。蒙古農耕地帶也有，那是當地的漢人或已漢化蒙古人的家畜而不是蒙古人真正固有的家畜。並且絕對不是蒙古草原家畜。

此外只有在蒙古西部山嶽地帶有犂牛，東部的森林地帶有馴鹿而已。犂牛是西藏人的家畜，馴鹿是鄂勒春人的家畜，那雖不是蒙古家畜，當然更不是東北漢人的，但是牠成了一种蒙古高原周邊山嶽地帶的特殊家畜，下面就把犂牛和馴鹿簡單的有所敘述。

犂牛本來是西藏的家畜，以西藏高原為主分佈於青海、新疆及西康省地方，在蒙古地方只有青海蒙古和阿拉善蒙古有一些，此外，據說在外蒙古北部一帶飼養者。

犂牛一如其名形態像牛的動物，大小也與牛略同，只是毛長而已，長毛叢生恰如同穿著蓑衣，其毛色多帶黑色及黑白色之斑，據說偶然還可以看見純白的。古代蒙古武士兜頂所附的紅球就是染了此種

犛牛的白毛而成。

蒙古牛爲草原家畜，相反的犛牛爲山嶽地帶家畜。善於行走山路，並不嫌棄河川潮濕地帶，可在水中游行。其性忍耐力強，行動靈活，而極能馱載重量貨物行於山嶽，攀登峻山險嶺如走平地一般。遇有急流照樣馱載貨物渡過，走遠路不亂步調，據說再沒有比此再好的馱載貨物善走山嶽地帶的家畜。

犛牛毛可製作毛氈及毛織物原料，以犛牛毛製成的毛氈爲西藏人天幕材料。因色是黑的與蒙古人白羊毛天幕相比這是黑色天幕。其乳可作飲料，肉可成食料。在西藏及青海地方的山嶽——潮濕地帶牠是極重要的家畜。

馴鹿在大興安嶺森林中被鄂勒春人所飼養。係爲鹿的一種，比鹿稍大，強壯腳健善於載人行走在山嶽森林之中。其犄角極大，沒有一定的形狀，花樣煩雜有種種形態。牠吃森林中的鮮苔，在草原僅可以吃剛發芽的柔軟草，因此不適合飼養於草原。大興安嶺的鄂勒春族有使用馬和使用馴鹿的兩種，前者住於大興安嶺南方稱爲馬鄂勒春，後者主要住於大興安嶺北方稱爲馴鹿鄂勒春。馴鹿鄂勒春喝馴鹿乳吃其肉，並乘騎馴鹿，或馱載貨物活動於森林之中。馴鹿爲森林動物同時也是與馴鹿鄂勒春族保持有不可分離關係的家畜。

七、家畜的樂園

以上，曾就成爲蒙古人家畜的羊、馬、牛、駱駝、犬，另外又把成爲蒙古高原家畜的犛牛、馴鹿有所敘述。

旅行於蒙古高原中觀察研究這些家畜，才能覺察到蒙古才是真正家畜的樂園。在大草原馳騁的健康肥美馬群，受秋日的照耀，閃閃發光，真如一幅美麗的圖畫，又相互凝結點綴在青青原野各處的羊群，如同天上的朵朵白雲，顯示了一望無際草原的和平象徵，再有完全像大洋一般的蒙古大平原其地平線與天地構成了一條直線，又有駱駝把其長臉向前延伸近於水平，似懷著比天地之悠久更覺悠久之心情成隊

的漫步之姿態，更加深了草原的神秘。馬被人類乘騎很愉快的馳騁於原野，牠沒有拉車馱載貨物之沉重工作，牛雖拉車，但其車身輕便，所載貨物也不重，既不流汗很容易的在拉車前進。拉車之事對蒙古牛來講，看起來似乎是一件很願意做的工作。駱駝雖馱運貨物，那因都在沙漠中長途旅行，蒙古人絕對不給牠馱載過重的貨物。在蒙古沒有氣喘流汗拉車的牛或馬，在蒙古更絕對看不見因貨物過重牛或馬拉不動，人類起肝火加之鞭策之事。蒙古家畜雖說是沒有圈舍，以及吃不到濃厚飼料，但是以大草原爲我家吃於彼住於彼，更有吃不完的大草原草，很快樂的生活於其中。真正感覺到蒙古草原是家畜的樂園。蒙古人和他的家畜共同生活在這個大草原。蒙古人也和很快樂的過著其草原中之悠哉悠哉生活。我在下面把蒙古人的草原生活方面將有所敘述。

第五章 蒙古的衣食住

第一節 概說

研究蒙古人的生活，可以分爲在草原游牧和在農耕地帶定居二種。前者佔蒙古人的大部份，係純粹蒙古的生活，在游牧社會中能夠得到蒙古很多傳統性風俗習慣。後者住於接近漢人地區的農耕地帶，形成定居，有的自己耕作，有的把土地租與漢人耕作，靠租賃費維持生活者。不管那一家其生活都已漢化，失去了蒙古原有的傳統性生活，除一部份大地主階級外，其他多數蒙古人都過著連漢人農夫都不如的劣等悲慘生活。蒙古人生活特徵在於其草原生活，就是到了現在仍過著成吉思汗以來的傳統性蒙古生活。我在此章想把該純蒙古生活有所敘述。

第二節 衣食住行

一 蒙古的房舍

首先就蒙古人的居住一談，游牧蒙古人不定居，趕著家畜移動於草原之情形在前面已有多次的提起。隨著蒙古人的移動蒙古人部落也有移動。並且移動的地方雖不一定，但並非是流浪，隨著季節的變動，其移動場所其固定位置，也在前面曾有敘述。就是雖有移動，但移動有固定的範圍。在這兒蒙古人生活顯現出來了兩種情勢，其一就是蒙古人和他的部落一同移動，其二是在其間不移動的一種蒙古式定居部落。前者就是一般蒙古人的游牧生活容貌，後者就是在草原各處有的王府（就是旗公署）和喇嘛廟，以牠為中心的草原中之一種定居部落。

草原蒙古人生活，一切為適宜於移動所形成。如住的房屋、食物，一切為適宜於移動發展而來。若以草原的移動生活為前提，研究觀察蒙古人的生活，就可以知道其現在生活的所以然。

蒙古人若一旦開始移動，把他的房舍可以在三十分鐘時間拆卸裝運完成，其材料以二輛牛車裝載搬運。並且到了新移動地可以約用三十分至一個時間內把房舍搭蓋竣事。其拆卸和搭蓋大致約用二名女子之手即可完成。其所搭蓋的蒙古房舍應用於多種的需要，其中可容納有五、六人家族的一家。起臥於其中，飲食於其中，在寒冷的時候其中又可放置羊羔子。這就是蒙古的房舍。

蒙古房子，蒙古人稱其為「хороо」（格勒）。在中國書籍中將其寫作穹廬、帳幕、張房、氈房、氈舍、氈廬、氈幄等等不一，就是到了現在普通仍呼之為蒙古包、或單稱為包，這全是漢人的稱呼法，與蒙古人的稱呼完全沒有關係，蒙古名就是「хороо」（格勒）。

漢人的稱呼以其漢字特有的意義，很能表達蒙古房子的構造和狀

態。細以品嘗此滋味蒙古房子的姿態大致可以想像得到。

首先談穹廬這個詞，穹就是指高而圓的天空說，廬就是「庵」換言之就是房子。就是說像天空那樣圓形狀的房子，這句話很明白的表達出了蒙古房子的形狀。在蒙古的漢詩人延子澄詩中曾有「夜靜穹廬聞犬吠」這句話，很巧妙的把草原蒙古房子情調予以表達。還有帳幕、帳房等之稱呼，帳就是「帷」，換言之就是垂布，幕也是「帷」，房就是「舍」，帳、幕、房等都表達了以布等覆蓋而成的房子之意。以布等搭蓋而成的房子，說起來就是等於天幕房子。這個說出來了蒙古房子之構造。再談氈張、氈房、氈舍、氈廬、氈幄等詞。氈就是毛氈，就是一般所說的氈子。房、舍、廬不管那一個都含有房舍之意，幄就是「帷」，同樣有把幕撐開而成的房子之意。氈張就是把氈子撐開而成的房子，至於氈房、氈舍、氈廬、氈幄之說，不拘那一個都是指以毛氈搭蓋而成的房子而言。這些個都為表達蒙古房子的材料而言者。再次說蒙古包，這是於現在漢人之間最普遍用的語句，或略而單稱為包。包就是「包袱」，或者是「草包」，引以包著之意義，並兼用像漢人包子之詞，包子是一種漢人的饅頭，其中有肉餡。大致上一般都用以豬肉與蔬菜混雜而成，其餡用濕白麵粉包好蒸妥後即稱之為包子。色白而形圓。蒙古人房子正好如同包子故稱之為蒙古包。故而表達於形和色上，真正顯現出蒙古房子的形態之感。

這些個語句之外，還有幹耳朵、兀魯朵、窩裏朵及帳殿之稱的語句。前三者係蒙古之「хороо」語句以漢字按上去者就是其譯音，帳殿才是其譯意。「хороо」更比「хороо」宏壯而大的天幕所搭蓋而成的房舍。如以「хороо」為蒙古人普通房子看待，「хороо」就成為蒙古宮殿。俄人稱蒙古天幕房子為「хороо」，想此語可能由「хороо」之語轉化而來。

另外蒙古還有「хороо」之詞，這也是蒙古天幕，此「хороо」更簡單，正好日本露營等時所用之天幕差不多，多數於旅行或祭祀時臨時所搭蓋的房子。「хороо」又稱為「хороо」。「хороо」係純粹蒙古語。據

云「*ᠭᠠᠨᠠᠭ*」可能由西藏語轉化而來不一定。

蒙古住宅就像這樣有「*ᠭᠠᠨᠠᠭ*」和「*ᠭᠠᠨᠠᠭ*」。「*ᠭᠠᠨᠠᠭ*」是蒙古房子，「*ᠭᠠᠨᠠᠭ*」為天幕。「*ᠭᠠᠨᠠᠭ*」想可能古代以汗為主所住的宮殿，現在蒙古王公大部份照中國習慣已有固定建築的府邸，所謂王府者就是指這些個而言，已不是古代的天幕宮殿（*ᠭᠠᠨᠠᠭ*），也不能如此稱呼了。

如同前述所謂蒙古包完全是漢人的稱呼，與蒙古人自己的稱呼一點關係也沒有，也不是日本話。日本的稱呼為天幕家屋，反而以蒙古語原樣呼之為「*ᠭᠠᠨᠠᠭ*」較為適當，若以字義來表示，取其氈子子房舍之稱的意義寫作氈屋最為適當不過。

如上所說可以瞭解到，蒙古天幕房舍是以羊毛氈子搭蓋而成的，圓形呈現著如同饅頭形，其色普通以白色為主。帶有灰色或黑色者的是因為陳舊骯髒所致。新者都是白色。這點與西藏的以犛牛毛氈子所搭蓋的黑色天幕不同。

蒙古房子就是「*ᠭᠠᠨᠠᠭ*」以骨架和覆蓋及門戶為主所形成。「*ᠭᠠᠨᠠᠭ*」的材料僅僅就是這些個，並且其中再敷設以氈子或絨毯子之類就可以了。骨架多用以白樺、柳、或松樹等等嫩木條所造成。成為圓的周圍牆壁者用柳樹粗條所造，就是用比柳條稍粗部份以網狀編織成為一組，把四組連結在一起就形成圓周型。以四組為一單位、大的「*ᠭᠠᠨᠠᠭ*」用六組或八組的也有。經連結而成為圓周之後，其上再搭上如傘骨型的屋頂骨架。這屋頂骨架係用白樺或松的細木所製成。上邊有圓的輪環形成着骨架的中心。那就是頂棚。骨架都用皮繩連結在一起。那種皮繩大部份都是駱駝皮。「*ᠭᠠᠨᠠᠭ*」的骨架搭妥之後其周圍用毛氈包起，上面用毛氈覆蓋。毛氈以羊毛製造。其中偶有以牛毛或駱駝毛等混雜加入製造的，但是其材料仍以羊毛為主。所以新毛氈色是白的。以毛氈覆蓋之後以毛繩綁牢。把它很結實的與大地連結在一起。繩以馬繫或以駱駝頸部或其胸前長毛製成。

架設「*ᠭᠠᠨᠠᠭ*」時在南面或稍東南面，設置約寬三尺的門，門口裝設單扇門，……再掛上門簾。門簾有時候掛於內側，也有時候掛在門

之外側。屋頂的圓形窟窿上面覆蓋有為關閉方便的毛氈這就是所謂之天窗，其引拉關閉之法，如有北風吹來時向南開，南風來吹時向北開。冬季環繞周圍牆壁的毛氈緊要靠近地面不讓它透一點風，夏季距地面約捲起五寸以便通風。

「*ᠭᠠᠨᠠᠭ*」以下簡稱蒙古包或蒙古房子，譯者註「內，其中央部位是火盆，環繞着敷設以毛氈子，進門正面靠圓壁設有佛壇，其左右很均勻的放置有裝衣箱或其他貴重物品箱，甚至有其他廚房用水桶等。其放置方式左右有一定的順序。火盆有利用地面燒火者，也有新式鐵火爐者用煙筒穿出屋頂，在火爐上可以做炊事。靠近火爐敷設小型絨毯人類在上面或坐或睡覺用。訪客坐在正面，主人在其右側，主婦面向客位坐於靠門近處，再其右側是衆家屬坐的地方，像這樣有一定的規則。旅行於蒙古部落時，為防備犬之來襲非攜帶馬鞭不可。然而進入蒙古人房子之前鞭子必須置於門外，這是普通禮貌，因為鞭子用以打狗的非為打人。

房子的構造就像上面所說很簡單，可是其有防寒、防暑、防風的特徵，不是單為移動便利，蒙古草原熱和冷同樣很厲害，且風吹得很強，這種房子最適合不過。蒙古寒冷嚴厲到冬天在其北部有時候降到零下五十度，如同前述其寒冷程度毛織物已不中用，非着毛皮衣服不可，而這時候毛氈成了非常必要的東西。蒙古包為一點也不能透風起見，特用很厚的羊毛氈所包紮。所以寒氣也不會滲入。在酷寒的冬季於蒙古包中生有火力強大的羊糞或牛糞火，因而在冰天雪地的荒野中有想像不到的暖和。又蒙古的夏季中午氣溫有時候可達華氏百度以上的熱度。大陸性氣候就像這樣晝夜冷熱之差別很大，到了夜間冷得需要皮衣服的程度。猶如早晨把冷的空氣放入屋內將門關閉，不管外面溫度怎麼樣，蒙古包中就變得像秋季那樣涼爽。包着蒙古房屋的毛氈就像以上說的有如此強大的防寒防暑作用。然後蒙古房子成為窟窿形貼近地面，周圍引線全成為圓形，因此說起蒙古房子全身都形成着流線型。很巧妙的減低了任何方向吹來之風的壓力。所以一點也不怕常

常吹襲而來之猛烈蒙古風。

二 蒙古人的食物

人類原來就要吃他們所住土地上的東西而生活爲原則。吃好吃山珍海味等並不是吃法的本來面目。日本在古代吃飯有加豆腐的大醬湯和鹹菜就是一頓很好的飯。就是有米、豆、蔬菜就可以了。這些個因爲不管到日本什麼地方都有出產。日本雖被稱爲海國，像生魚片這些個東西在古代距海岸較遠的並不常吃。那是因爲離開了所住土地還沒有想到有人類的食物存在。

遠眺蒙古高原，全境完全沒有海，據說距海最近地方也有幾百公里，完全是由內陸所形成的地方。並且遊牧蒙古人所住的地方，係一沒有邊際的草原地帶，其中看不見一塊耕田，只是放牧着成群的家畜而已。蒙古人沒有其他辦法可想，其一切生活都依賴於家畜。衣食住全都來自家畜，所以住毛氈房子，穿毛皮衣服，喝家畜的乳，吃家畜的肉。爲要活下去，生活上的必需都得靠那些個東西。關於住的方面，對蒙古房子問題業已敘述，我在下面將吃、穿也就是對蒙古草原的食物和衣服方面有所敘述。

草原蒙古人生活就是遊牧生活，遊牧也就是不斷的移動生活，不與必須在一定地方居住的農耕生活有何衝突。而且農耕是耕種土地生活，耕地與草原也不發生衝突。因之草原蒙古人生活並不是農耕生活，隨之在草原蒙古人食物不能由耕作物中來取得。只是有以家畜交換保存或搬運方便的若干穀物（即是粟）以及麥粉等，保存或搬運不方便的蔬菜蒙古人不作食物。蒙古人生活在吃方面僅吃少量的穀物大部份不吃蔬菜。尤其是蒙古草原生長有很多野生的蔬菜、葱類，僅有一部份蒙古人摘爲食用，而並不普遍，並且其吃量非常有限，沒有到常吃的程度。蒙古人生活說成不吃蔬菜的生活也不會錯到那裡。這是和其他地方人類的生活最大差異之點。因此誰都可以想到，蒙古人不吃蔬菜何以不得壞血病？或者能不發生其他生理變態？

首先看一看蒙古人日常食物。在農耕地的蒙古人以及以王府等爲中心所住者可稱爲特權階級的蒙古人，他們生活大致上多數都已漢化，過的是漢人習慣的生活，其食物除包括蒙古原來就喜歡吃的羊肉和乳酒以外，其他吃法和漢人沒有什麼多大變化。蒙古在吃的生活上能保持其固有的蒙古特徵者，爲留在草原的遊牧蒙古人。遊牧生活進入以定居爲基礎而發展下去的漢人式生活吃法很困難，因爲他們發達於草原很久以來吃慣了蒙古傳統性的食物吃法，而這些吃法也很適合於草原生活。

遊牧蒙古人首先吃的就是家畜的肉。其中最喜歡吃的就是羊肉，說起來也是蒙古人的日常食物。牛、馬肉雖也吃，而那不是常吃的東西，除了冬季爲吃而屠殺牛、馬而外，其他季節機會甚少，因爲牠們體軀大、屠殺一頭一次也吃不完，尤其是夏季氣候炎熱，保存也發生困難。到了冬季可以長期冰凍保存，爲了吃雖也有時屠殺，但是機會也不多。牛是擠取其乳並使之拉車之物，馬也同樣擠取其乳，並用爲乘騎之物，蒙古人的想法就是如此。不以牛馬爲常用食物看待。蒙古人常吃之物還是羊肉。蒙古羊爲如同前述係爲毛皮用種兼肉用種，其肉極爲好吃。蒙古羊肉的特徵是脂肪部份多而其肉好吃。蒙古食物不加味道沒有大菜這個東西。羊肉照原樣置入水中煮着吃。塩也不加只以白水煮之。把那個以原樣或加以塩食之，稱爲羊肉固有的食法。在北京一帶有所謂成吉思汗大菜者，就是把羊肉加以燒烤並附以味之大菜，但那是北京菜並不是蒙古菜。在蒙古煮羊肉連骨頭一起煮着吃。除塩之外不需要任何調味品。但是那個極爲好吃，蒙古羊肉的特性就在於此。

在蒙古吃羊肉的時候，除其肉之外其他一切內臟統吃。肉附骨之原樣放入大鍋中煮之，煮以相當時間之後把它端上來，用蒙古刀切割而食之。長形肉類以左手持肉送到嘴邊，再以右手持蒙古刀靠近嘴邊處切而食之。臟物以水煮後照原狀食之。我在蒙古巡迴旅行時，曾談起寒冷，有一位蒙古大官說要多吃羊肉。顯見蒙古人對吃羊肉有那種

深切有效的想法。每想起羊本身有時候在有零下五十度之稱的寒冷蒙古草原能夠耐下去之事，真是如同蒙古人所說，其肉說不一定含有很多熱量。蒙古人在夏季把肉割拉成肉條曬乾而貯藏，冬季以原樣凍結之以貯藏。其他貯藏保存方法不大使用。

蒙古人喝羊乳、馬乳、牛乳，又喜以乳造酒而飲。並製成奶油（黃油）奶皮等的乳製品，復將乳之沈澱物曬乾硬化之後稱為奶豆腐當作零食。

另外蒙古人重要的飲料就是茶。蒙古人喜歡喝的茶就是所謂之磚茶，這個大部份均由中國輸入。該茶就是以磚頭形煉製而成使之凝固在一起的東西，喝時把它削下來放入水中煮沸而飲之。蒙古人實際上也好喝這個茶。所以這種磚茶對蒙古人來講已成了不可缺少的東西，若到蒙古內地，物價的高低在習慣上依此類磚茶之價值來決定交換條件。

接近漢人農耕地所住的蒙古人，其穀物由漢人手中取得食用。蒙古人所吃之穀物為粟及麥粉。粟多數與羊肉混雜熬成粥，小麥粉多數趕麵條吃，至於大麥粉炒糊了吃。炒大麥粉吃法西藏、蒙古、青海等以及接近西藏地方一帶多採用此項辦法。

看過蒙古人一切飲食物，很明白的了解其主要部份為家畜肉和乳或者是茶。吃塩係屬當然之事。這種塩產自蒙古到處可以看到的鹹水湖。蒙古家畜僅僅只吃草已如同前述。新草剛萌芽時期蒙古家畜乳中有草香味。蒙古人食此僅吃草長大的羊肉，飲用含有草香味的家畜乳，並且不斷的飲茶。基於此，他們雖不吃蔬菜，但可能比吃蔬菜更攝取了重要的養分。實際上，蒙古人不管那一個都不會得壞血病，均極為健康，喂小孩奶中的母親其乳也至為旺盛，像營養不良、肺病等症在蒙古草原可以說沒有。草原蒙古人面色紅潤均極強健，所以很能耐於寒冷而可以生存下去。

三 蒙古的衣服

冬天到蒙古草原時，酷寒的程度叫人感到要被凍死的樣子。在日本冷天穿薄衣時說會感冒，可是在蒙古草原冬季穿的單薄時會被凍死

，並非僅僅感冒而已而是會凍死。所以在蒙古草原過冬季生活需要能克服寒冷的氣候。首先能克服寒冷才能過人類諸般的適當生活。如住毛氈屋，多吃含脂肪的羊肉，穿皮襖，都是為適應寒冷生活的措施。蒙古人男女都會騎馬，馬是蒙古人的腿，蒙古人不管到任何地方都騎馬去。所以蒙古人衣服都為騎馬方便而製，同時騎馬也不能不防備寒冷。

如上蒙古草原生活就是要能耐寒的生活，並且一年到頭都是馬上生活，因之蒙古人衣服要兼備防寒和騎馬兩種特長不可。蒙古人穿身長及袖子長的皮衣服是為了防寒，衣服寬大與其下部兩側開叉是為了騎馬方便。再穿夾綿花或皮毛裏子的細筒褲，外面穿上用皮毛裏子的長靴，如此則或行或立或騎馬，也不會由下方侵入寒氣。

蒙古衣服中沒有外套這個東西，外套可能是由西方傳來，因之從古以來在蒙古或在中國未曾有過外套之為物。現在漢人有時候雖在其漢服上穿有外套，但蒙古人不穿外套仍保持着自古以來的蒙古式服裝。蒙古人衣服係一種袖子長而其身長亦長的相當寬大之衣服。且在其裡面掛有皮毛裏子，褲子是夾有綿花或皮毛裏子的細筒褲，他們雖穿着皮裡子的寬大長衣因都繫有腰帶，所以其動作一點也不會拖泥帶水，仍很靈活的騎馬奔馳。

蒙古衣服裡子以羊毛皮者居多。高級東西不是沒有栗鼠、貂等皮毛等等，但是這些個東西為王公貴族之禮服用，不是普通人所能穿著。一般大眾化的東西都是羊皮毛。同時也均為蒙古羊皮毛。為了徒步方便、或騎馬敏捷其衣服裡子不能不挑選保溫力高而皮薄又輕快的皮毛。這個東西就是現在蒙古羊皮最為適當不過。因之感到蒙古羊在這一方面最為適合，此乃至今不被淘汰反而更發達的主要原因。若成為像米利奴種或虎利狄爾種那樣純毛用種其絨毛加重皮變厚不能再成為良好衣服裡子，這也是改良蒙古羊的另一種困難所在。

蒙古人服裝雖依地方或部族的不同有若干差異之點，但為防寒或乘馬為目標之共通點到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平常男子繫腰帶，女子不繫腰帶。有的地方未婚女子或小孩也繫腰帶。衣服的颜色男子多用彩色單調的褐色或藍色，女子所用之物較男子採取顏色繁多者，多在衣

邊加刺繡的緣口。男的多用黃、青、褐色等的腰帶，頭上也有帶帽子的地方，也有繞圈繫綁頭繩地方，頭繩顏色和帶子顏色同樣有各式各樣顏色。男女腰間同樣都掛有蒙古刀、火石、銀製或銀色的鎖鏈，男的懷中揣有寶石或燒煉製的鼻煙壺，女的頭部或胸前大部份都佩帶寶石之類的裝飾物。有時候發現男孩穿着紅衣服騎馬奔馳於草原。喇嘛衣服普通都是黃或深紅顏色。不管怎麼說蒙古人衣服彩色一件衣服同樣為一個顏色者居多，那可能是為適合蒙古草原的情調吧！

四 在蒙古旅行

蒙古人不管去那兒都騎馬去之。當然遊牧蒙古人為放牧關係也有，靠近地方不搭建房舍，因之雖說是近鄰也有二公里至三公里，也有距離四、五公里者。所以蒙古人就是訪鄰居也立即飛馬奔馳而去。蒙古人從早到晚遊牧於草原自然很少有涉及於世間之事，從而自他處若有人來訪很高興的來迎接。並且很喜歡聽世間的新聞。若有趣聞立即飛馬傳告鄰居。由鄰居再傳至鄰居、鄰村、鄰部落。經此方式很快傳遍各地。在蒙古傳播此類訊息實在是快得很。這個可稱之為在草原發達的一種通信方式。而此消息的傳播完全依賴馬。蒙古人若旅行利用騎馬，旅行於草原碰到天黑時，借宿於附近蒙古人家。若遇不到人家即在草上過夜，蒙古人家移動時把房舍拆卸堆載於牛車，連同其他家財傢俱需要數量牛車來裝運，女孩子乘車，男孩子騎馬隨行，行列前面有狗二、三隻在奔跑，部落移動時各家編成若干組成為行列接連前進。

蒙古草原處處有井和泉水。泉蒙古話叫（）「寶拉嘎」，井叫（）「華都嘎」。泉是自地下冒出的天然水，偶然積聚成為小水池。井是由人類所挖掘而成者，多數從古以來就有井之名而成了那個地方的地名。有井有泉地方也成了蒙古草原的一種驛站。蒙古人旅行於草原時，在那些個井或泉之周圍卸車過夜。什麼也沒有，草原當中平常只有一座泉、或一口井，有時候可發現有幾十輛車積聚在那裡成為小屯，附近放牧着牛馬突呈現一時之盛況。

就像這樣蒙古人騎着馬旅行於草原，蒙古人家，蒙古部落車輛相

互連接浩蕩於草原。蒙古人遠走大草原裏面時必須攜帶一群羊同行，以供逐次的宰食之需。蒙古草原是一望無際的草海，走了多少日也走不完的草海，所以蒙古人乘馬旅行於此大草原時須攜帶羊同行。馬和羊嚼草原的草，人吃羊，不停的前進。蒙古大行軍就是這樣推進。由這點研究看起來，可以明瞭成吉思汗率領大軍遠征之行軍策略。

蒙古人於沙漠旅行時多乘用駱駝，並用駱駝馱載貨物。這是因沙漠行車困難之故。普通在沙漠旅行由秋季開始到第二年的春季為止。因沙漠中在夏季熱得特別厲害，並且駱駝對熱天最弱不過。同時在沙漠裡邊覓水困難而冬季則可融解冰與雪飲用。若在夏季沙漠旅行多在白天休息夜間趕路。求得有水地方宿泊，若沒有水則挖土探水，這才是真正叫鑿井而飲。

在大草原長途旅行途中常發生家畜倒斃之事。特別是在沙漠旅行時那種事多。夏季進入沙漠到處可發現有倒斃的駱駝。最後成為白骨被曝於沙漠之中。沙漠之砂常被風吹起、飛揚四方，沒有一定的道路，旅人經常不能不走這個沒有道路的路。唯一能標示這是道路之物就是這種白骨，沙漠旅行者依循白骨而行。

站在大草原遠望，各處盡都是草，同一類型的丘陵起伏不定的一個接着一個完全無法辨別方向。我曾迷失過草原，坐着汽車到處亂轉，怎麼樣也找不到出路。這個恰好如同大海中的孤舟一般。那個時候望見遙遠的那方有一座鄂博。那種心情正好如同大海中的船夫望見前方有一座孤島，再靠近近處一看也有燈塔一般的快樂。以那個鄂博為目標前進。該處有泉水、有河、也有廟有部落。如此解脫了草原的迷失。對草原旅行者而言，途中能望見鄂博，再沒有比這個更感高興的事。鄂博以石頭堆積而成其上插有柳條，大部份越法加高建於高地。在蒙古人去草原時先拜鄂博，又過了冬季到春季時有祭祀鄂博式典。在祭祀鄂博時，蒙古人不論男女老少都穿着新衣服，打扮得非常漂亮的馬，集聚於鄂博周圍，很快樂的慶祝這個春之神重新降臨於世。祭祀鄂博為草原的一項盛事。然而鄂博究為何物？此次因篇幅關係下次再談。

首屆「新疆文化研習會」紀要

郭江東

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孕育了各民族的滋長，數千年來中華文化一直繫於不墜之地位且提供了各民族生存發展的空間。中華民族並非由單一民族所構成，依據中共新近統計資料有五六族之多，中國人一向講求民族共存、文化交流，基於這項共識，研究各少數民族文化，能加強彼此瞭解，增進民族感情，進而有助各民族的大團結。

新疆地區幅員遼闊，種族多達十四族，遠從秦漢時張騫通西域開始到近代與俄國的涉外關係，新疆在中國歷史上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其資源豐富、地形險峻、人種複雜、文化多樣、宗教語言迥異，其中以名聞遐邇的絲路，在中西文化交流上有不可抹滅的功勞。

新疆省政府辦事處、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及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等三個單位，有鑒於新疆特殊地理環境及文化之重要性，並期望國人重視國內少數民族，特於民國七十九年二月三日至十日在台北市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心冬令青年自強活動中舉辦首屆「新疆文化研習會」，邀請政大邊政所前所長林恩顯教授擔任會主任、新疆省政府辦事處侯主秘紀峪任副主任、救國團郭江東先生、新疆省政府辦事處一裘友任小姐為執行秘書，規劃指導全期活動的進行，共有大專院校學生四十一人報名參加（實到人數三十五人）。

課程安排有專題講授、專題研討、影視欣賞及動態的參觀活動、草原會餐；每天晨間教授簡單維吾爾語文和滿洲語文會話，很受學員歡迎。由於國內研究新疆方面的學者為數不多，在師資聘請時受到極大的限制，不過已經延攬了此方面專長之學者參與。專題講授部份有：尹建中的中華民族的構成，葛維新的民族文化的體認，林冠群的新疆地理總攬，凌峰的邊塞風光巡禮，楊世權的西域與中原關係史，林恩顯的中國邊疆民族政策、認識新疆各族，侯紀峪的新疆事務在台之推展，張中復的近代新疆——建省前後，阿不都拉的維吾爾文學與藝術、新疆伊斯蘭教生活，劉學鈞的邊疆與國防，陳小紅的文化涵化與社會轉變，彭世綱的幽默大師阿凡提看新疆民族人生觀，陳慶隆的絲

路源流及世界突厥學介紹。其中還有二小時的新疆各族生活座談，邀請法提合（哈薩克族）、廣定遠（錫伯族）、阿不都艾里（維吾爾族）、寇玉蘭（柯爾克孜族）等四位新疆人士與學員面對面溝通，以現身說法方式引導學員認識新疆的文化與生活，均發生了相當大的教學成果。

為使學員對新疆有概念性的瞭解，於研習會期間放映介紹新疆的風土人情影片。專題研討則分成三個小組，分由輔導教授引言、講解、及講評，讓學員抒發學習心得與感想，歌舞最能代表新疆民族的特色，新疆少女的深情優雅和少男的瀟灑熱情，在「歌舞之鄉」課程中，學員充份的體驗維吾爾族的風情。參觀清真寺，讓學員有機會目睹回教禮拜儀式。活動的最高潮在草原餐會，利用整個下午的時間在新疆人焦羅巴依先生指導示範下，親身作新疆抓飯、烤肉串，並租來二匹馬，穿戴起傳統的維吾爾服飾，學員「馳騁」在劍潭中心大草坪上。晚上的麥西來甫晚會，則是新疆式的團體遊戲，玩起來別有一番風味。

「蒙藏文化研習會」與「新疆文化研習會」同時舉行，為強化活動效果，廣為宣傳，仍配合舉辦「蒙藏、新疆文物展」，共有蒙藏及新疆有關食、衣、住、行、育樂、宗教、及其他器物約三百餘件展出，在國內難得一見的新疆哈薩克「氈房」（一撮毛）、絢麗而細緻的掛毯及刺繡、樂器「冬不拉」等一一呈現在眼前，彷彿置身塞外。文物展揭幕酒會前由蔡麗華老師所領導的台北民族舞團演出四支邊疆民族舞蹈：「金色草原」、「維吾爾之春」、「阿拉木汗」、「西藏舞」，氣勢磅礴，豪情萬丈的牧野風情，將與會來賓及學員的情緒引至最高點。

「新疆文化研習會」已順利圓滿的結束，雖然是個小型營隊，但學員個個滿載而歸，沒辜負寶山之行。儘管學員來自不同的學校，動機不同，所學各異，但經過八天七夜的密集研習後，綜合座談時學員發言可以發現，學員對研習內容有相當的心得，也提出不少建設性意見，最感欣慰的是全體學員也肯定了這次研習會的意義。

舉辦該項活動只是拋磚引玉，希望青年朋友踴躍參與，國內其他團體共同來籌辦類似活動，關心新疆民族，重視新疆文化，畢竟我們要立足台灣，心懷大陸，歷史責任還有待我們來承擔。

蔡文姬與胡笳十八拍

康素慎

蔡女昔造胡笳聲，一彈一十有八拍。

胡人落淚沾邊草，漢使斷腸對歸客。

這是唐開元年間的李頎在他所寫「聽董大彈胡笳聲」一詩開頭的幾句，它說明了蔡文姬歸漢的故事，在唐代民間就已經廣泛流傳了。

蔡文姬是東漢時代一個富有藝術天才的女子，但她的一生却是一箇大悲劇，長達一千二百九十七字的「胡笳十八拍」長詩，相傳是她抒發自己一生不幸的悲歌，可惜迄今仍未獲得文學史家一致的承認，但無論如何，她的戲劇性的故事，從唐代以來却一直吸引着詩人和畫家的興味。胡笳十八拍中的詩句常爲人所引用，歷代有些畫家，也按照十八拍一段一段地畫下了詩中的故事，就像現在的連環圖畫一樣。

關於蔡文姬的一生，最鮮明和最完整的還是反映在「胡笳十八拍」這首長詩的敘述和描寫中，別的史料，雖然史書中也略有記載，但零零碎碎，並不很完備。根據「後漢書」的「蔡邕傳」、「董祀妻傳」、「蔡琰別傳」以及朱長文在「琴史」裏所引用的記載等歸納起來，我們也僅能知道蔡文姬的生平一個大概而已。

蔡文姬，原名琰，漢代陳留圍人，生於公元一七七年。她出生於一個世宦的家庭，她的七世祖和她的祖父都在漢代做官。他的父親蔡邕是個最忠孝而博學多聞的名儒，喜歡辭章數學天文，對於音律，也用心研究。他的七弦琴彈得很出色，傳曾著有「琴操」一書，所創作的「河間雜曲」和「蔡氏五弄」都很著名。他早年閉門治學不與世交，到了建寧三年，才出來做官。但在光和元年，因奉漢靈帝之命，發表對國家大事的意見，得罪了宦官，遭到陷害，被判充軍到外蒙古一帶，蔡文姬那時候年僅六歲，也跟着父親一起流浪到北方去。

後來，蔡邕得到皇帝的赦免，在回家的途中又得罪了五原地方的太守王智。王智要殺害他，所以他又不得不往南方逃亡，在江蘇等地

流浪，他們一家從充軍到逃亡，足足在外邊流浪了十二年之久。

在流浪的期間，蔡邕先後製造了兩件有名的樂器：「柯高笛」與「焦尾琴」，尤其是後者在歷史上與齊桓公的「號鐘」，楚莊公的「繞樛」和司馬相如的「綠珠」成爲四大名琴。

蔡文姬天生聰明，從小就愛好音樂。每次蔡邕彈琴的時候，他都靜靜地在旁邊聽着。她幼年能辨琴弦的故事，正是她聰明和細心的表現。她父親問她何以能辨琴，她對父親說：「從前李札聽了琴聲，能夠判斷一個國家的興亡；師曠聽了琴聲，斷定楚國要打敗仗。兩根琴弦斷了，難道還聽不出來嗎？」蔡邕聽了，知道蔡琰很有音樂才能，就用心培養她，把自己的彈琴技術盡量傳授給她。不久，蔡琰也成了有名的七弦琴演奏家。

十六歲那年，蔡文姬嫁給河東衛仲道爲妻。次年，她的父親因爲是董卓的人，被司徒王允拘禁，不久便在長安的獄中死去。接着她的母親趙五娘也因爲過度悲傷而逝世。父親的冤死，母親的喪亡，已使她悲痛不已，這時候，她結婚不滿二年的丈夫也不幸病死了。真是厄運一個跟着一個，苦痛一層深似一層。文姬忍受着這一連串的打擊，孤單地回到故鄉陳留居住。

興平年間，天下大亂，匈奴貴族帶領大隊人馬侵入中原。蔡文姬的故鄉不幸也受到匈奴兵的侵入，她的家中被搶掠，房子也燒光，她背着琴囊夾在逃難的人群中，也被匈奴騎兵追上來擄走了，後來做了左賢王的妻子，在匈奴生活了十二年，生有二個孩子。後來由於曹操與蔡邕有很深厚的交情，他看到蔡邕沒有兒子，只有一個女兒，並且爲匈奴人所搶去，他就派了一個公使到匈奴，用錢財把文姬贖了出來，這便是文姬歸漢故事的由來。

文姬回來後，又重嫁她的同邑人董祀。董祀做了屯田的都尉，曾

犯了應處死刑的罪狀，文姬親到曹操那裏請赦，遂得免。曹操嘗問文姬其家所藏典籍，能否記得？文姬便把所能背誦的四百篇，繕寫呈上，無一有誤，這也可說是她的才華的表現。

蔡文姬的作品，現今留傳下來的僅有「悲憤詩」二首及「胡笳十八拍」長詩一首。據「隋書」的「經籍志」一條注中，曾透露了在梁代本有「蔡文姬集」傳世，惜此書已失傳，究竟「蔡文姬集」中有甚麼別的作品，已没法查考了。

蔡文姬除了精於音律和文學之外，傳說她又是一位書法家。北宋初期所刻印的「淳化秘閣法帖」，內中便收有「胡笳十八拍」最前面的兩句——「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漢祚衰」，是用章回體寫成的，製成帖文以後，前面並有「蔡琰書」三字，不過北宋的書畫名家米芾，不相信是蔡琰所親筆書寫；而另一個北宋的書畫名家黃山谷在他的「跋法帖」裏說：「蔡琰胡笳引，自書十八章，極可觀，不謂流落，僅餘兩句，亦似斯人身世耶？」

照他的口氣，好像看過蔡琰自書的「胡笳十八拍」全文似的。據說蔡文姬善書，是承繼了他父親的傳統。唐人張彥遠「書法要錄」卷一中有一「傳受筆法人名」一項云：「蔡邕受於神人而傳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傳之鍾繇。鍾繇傳之衛夫人，衛夫人傳之王羲之。王羲之傳之王獻之，王獻之傳之外甥羊欣。羊欣傳之王僧虔。王僧虔傳之蕭子雲，蕭子雲傳之僧智永。智永傳之虞世南，世南傳之、授于歐陽詢，詢傳之陸柬之。柬之傳姪彥遠。彥遠傳之張旭。旭傳之李陽冰，陽冰傳徐浩、顏真卿、郎彤、韋玩、崔邈。凡二十有三人，文傳終于此矣。」據此則文姬的書法也甚有可觀矣。

至於「胡笳十八拍」，似乎應該先談談什麼是「胡笳」。詩人白居易解釋過：「笳者，胡人捲蘆葉吹之以作樂也，故曰胡笳。」（見「白氏六帖事類集卷十八」）

據另外的記載，吹笳是「奏哀怨之音」，這種胡笳聲能令人感動流涕。「晉書」的「劉琨傳」有一段記載：說到現在「晉陽嘗爲敵騎

所圍數量，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淒然長嘆。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

又盧士元也引「晉書」云：「劉疇字王喬……曾避地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爲出塞入塞之曲，以動其客遊之思，於是群胡皆垂涕而去。」（見「涕漿五辛」）

由以上可知胡笳的聲調的確給人一種悲涼之感，而胡人聽了特別容易動客遊之思。

蔡文姬旅居異域，對胡笳聲也有一定的感觸，所以把它播入琴曲，改編成一種新的胡笳聲。這種胡笳聲，很快便受到琴學家的歡迎，因此不僅流行起來，並且有不少人加以擬作和改編。在唐代，胡笳已經有大胡笳和小胡笳之分了。郭茂倩在「樂府詩集」卷五十九蔡文姬「胡笳十八拍」題下有序引證云：「『琴集』曰：『大胡笳十八拍，小胡笳十九拍並爲蔡琰作。』按蔡翼『琴曲』有大小胡笳十八拍，沈澹集，世名沈家聲，小胡笳又有契聲一拍，共十九拍，謂之祝家聲，祝氏，不詳何代人也。李良輔『廣陵止息譜序』曰：『契者明會合之至，理殷勤之餘也。』李肇『國史補』曰：『唐有董庭蘭善沈聲、祝聲』，蓋大小胡笳云。」

現在留傳下來的「胡笳十八拍」的辭，的確仍有大小兩種。蔡琰的「胡笳十八拍」共一千二百九十七字，劉商隱（據「全唐詩」）劉商隱小傳，字子夏，彭城人。少好學，工文，善畫，登大曆進士第，官至檢校禮部郎中，汴州觀察判官。）的「胡笳十八拍」僅一千零二十四字，顯然有長短，大小的不同，兩者的體裁也不同。蔡的是以騷體爲主，中間雜以七言句，句法有時很放縱，每一拍的字數多少不等，劉的「胡笳十八拍」從第二拍至十八拍都一律是七言八句，僅第一拍開頭十六字是個例外，剩下的都是七言八句。看來劉商隱的作品可能就是「小胡笳十八拍」的辭。這種「小胡笳」在劉之前便已經有了，劉商隱自序中稱爲「擬董庭蘭」胡笳弄作。則舊辭可能是董庭蘭所作，

但因為不好，故未有留傳下來，劉商隱作的倒是留傳下來了。而大胡笳十八拍與小胡笳十八拍也一定有分別的，無論辭與調，均有長短的不同，所以唐人早就分為大胡笳與小胡笳了。

至於胡笳十八拍的「拍」，並不是音樂拍子的拍，這個「拍」已有幾個學人發表過不同的意見，其中葉玉華推測為「排遍」，另有人則說應作為「首」字解，十八拍即是十八首；至於劉大杰說的與「拍擔」或「拍彈」有關係，似乎更講不通了。究竟「拍」的真義是什麼？迄今仍未有定論。

總之，胡笳十八拍是改自胡笳聲的琴曲，這種琴曲有兩種，一種稱大胡笳，一種稱小胡笳，它們都有辭和曲譜。大胡笳傳說為蔡文姬所作，也有主張為董庭蘭所寫的。關於作者是誰的問題，國內的「文學遺產」周刊上曾經展開過熱烈的論爭，所發表的各種意見也曾由中華書局彙編成為「胡笳十八拍討論集」一書，頗可參考。

蔡文姬歸漢的故事，相傳早在唐代便有畫家取材於此了。唐代大畫家閻立本和楊寧，都畫過胡笳十八拍的故事。宋代李唐也畫過十八拍圖冊，宋高宗（趙構）曾題上唐人劉商隱「胡笳十八拍」詩。在李唐之前，還有李公麟也畫過「蔡文姬歸漢圖」；南宋陳居中則畫過「胡笳圖」、「胡笳十八拍圖」以及「文姬歸漢圖」。元代趙孟頫也畫過「文姬歸漢圖」，他的兒子趙雍則畫過「仿宋人十八拍圖」。明代畫家尤求和仇英也都曾畫過這種題材，仇英還臨過李唐所畫的全圖，有周天球題胡笳十八拍原詩於每幅後面，總之，古代很多畫家都會以這個題材進行過創作，但遺憾的是，大多數的作品都佚失了。清人畫家蘇六朋所畫的「文姬歸漢圖」，上面還題有一首宋人的題畫詩，是用五言寫的，全詩達三十二句之多。

筆者所知，還有一種「胡笳十八拍」圖卷，全書十八幅均用彩色印出，原圖是絹本設色，原是手卷成裝，每幅後面並有分書寫的十八幅原詩，但無作者款字和印章，僅在第六幅右下角有「戴培之家珍藏」，第九幅左下角有「聽鶴館主人」，第十四幅左下角有「曾藏戴芝

（文轉60頁）

（文接38頁）

註⑧：見王國維：「西胡考」，收於「觀堂集林」卷十三，史林五。

註⑨：見向達譯：「斯坦因西域考古記」（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頁七五。

註⑩：見註⑨之書，頁三九。

註⑪：見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彙編」，冊一，頁二一。

註⑫：見氏所著：「月氏故地與其西移年代」，收於楊鍊所譯輯的「西北古地研究」中，頁九一。

註⑬：見註②之文。

註⑭：見白鳥庫吉：「西域史研究」，上册之「塞民族考」。

註⑮：見註⑫之文，頁九一—九三。

註⑯：見氏所著：「犂軒與大秦」，收於楊鍊譯輯之「西北古地研究」中，頁一四〇—一四二。

註⑰：詳見 Sankityayna Runala 之「History of Central Asia; From Broze age to Chengiz Khan」。

註⑱：見 Joe Cribb：「The Sino-Kharosthi Coins of Khotan; Their Attribution and Relevance to Kushan Chronology」，刊於「The Numismatic Chronicle」，冊一四四，一九八四，及冊一四五，一九八五。

註⑲：見註②之文。

註⑳：羽溪了諦以「波調」之古音為「Vasudva」，詳見其「大月氏國之佛教」，賀昌群譯，收於「西域佛教研究」中，頁一六九。

註㉑：引自 K.C. Ojha 和 L.L. B. 等合著：「The History of Foreign Rule in Ancient India」，頁一四五。

註㉒：在註㉑之書，頁一五三—一五八，對寄多羅及其後的貴霜有更深入的說明。

註㉓：見氏所著：「西突厥史料」，馮承鈞譯本，頁一八〇。

雍正皇帝的統馭術

黃清榮

清朝第三位皇帝，一般人叫他雍正皇帝，其實雍正只是年號，應該叫世宗，龍馭賓天後的廟號長達二十五個字，即：「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睿聖大孝至誠憲皇帝。」廟號的字面可說是「有美皆備，無麗不臻」，好到了不得、不得了！其實供在太廟的廟號，僅供龍子鳳孫膜拜，現存的史料，却能絞出他真實的一面。

清世宗愛新覺羅胤禛，安東新賓縣人，清乾隆十七年（公元一六七八年）生，清雍正十三年（公元一七三五年）薨，在位十三年，享年五十八歲。今人賈虎臣先生「中國歷代帝王譜系彙編」第三一七面有載：

「胤禛降準魁梧，目光炯炯，音吐宏亮，舉止端凝，幼耽史書，英明剛毅，有魄力，知人善任。崇法治，明賞罰，尚廉潔，興水利，治河道，勸農桑，蠲浮糧，除賤民，立社倉。澄清史治，裁革陋規，懲治貪墨，綜核精嚴，海內大安。平青海，討準噶爾，定苗亂，改土歸流，國威大振。然猜忌成性，刻薄寡恩，殺戮兄弟，抑制宗室，翦滅功臣，緹騎密佈，刺探隱微，興文字獄，苛細誅求，均為後世所詬病！」

賈文指陳的「緹騎」，就是他任用田文鏡、鄂爾泰等密設特務，四出偵緝，防止臣下，無孔不入，如此人君，何「寬容」之有！現在我們不妨從他的御筆硃批，來看他控制臣下的統御術。

北齊文宣高洋的詔書說：「……雖史官執筆，有聞無墜，猶恐緒言遺美，時或未書，在位王公文武大小降及庶人爰至僧徒，或親奉音旨，或承傳旁說，凡可載之文籍，悉條封上一。足見古人質朴；而清世宗好以口舌文字自矜，在得意之餘，又顧慮到為人所挾，故始則諉過於述旨之不能無誤，繼則嚴訂恭繳硃批之法以消滅形迹，三則不許以摺奏中批諭引入本章以杜口實，蓋一面要在硃批中顯其恩威不測明

見萬里之神，一面又不能不預為文飾彌縫之地，所以硃批的措詞用意皆極具深衷，面面俱到。其御製文有謂：「朕侍皇考聖祖仁皇帝數十年，時時祇聆聖訓，今觀臣記載者舛錯疏漏之處甚多。朕嗣統以來，（雍正）元年（公元一七二三年）內閣面奉之旨，書寫時動輒訛舛，自張廷玉為大學士，聽朕諭旨悉能記憶，繕錄呈覽與朕言相符，蓋記載一事良非易易，毫釐千里之差不可不慎，是以諸臣欲記朕諭者，朕皆令謄寫進呈之後方許存稿，恐其失實以傳訛也。」這是他在語文方面設防的第一著。

可是還不夠嚴密，他在雍正八年（公元一七三〇）七月又下了一道繳呈硃批之旨：

「……既奉硃批查辦此事，下次查辦奏事之時應將硃批原摺呈繳以備朕之檢閱，若具奏此事而仍留硃批原摺於外，則朕處無檔案可稽，未免難於辦理。」

似此「自說自話」，勉強得很，以帝王之尊，預留硃批副本，以備查考，這並不是一樁難事。其必欲硃批原摺「回籠」者，還不是為了更進一步不准引硃批入奏形成挾制！所以又諭各省督撫大臣於本章之外更具摺之例，復以督撫一人耳目有限，於是又有准提鎮藩臬具摺奏之旨，即使道員武弁等也可以，若以今天的術語說來，這就是「單線文書情報」。上諭是這樣的：

「……此無非欲公聽並觀，欲週知民間之情形耳，並非以奏摺代本章，凡摺中所奏之事即屬可行之事也。是以奏摺進呈時，朕見其確然可行者，即批發該部施行，若介在疑似之間，則交與廷臣查議，亦有督撫所奏批令具本者，亦有藩臬等所奏而批令轉詳督撫者，亦有聽其言雖是而不能必其奉行之無弊，則批令實心勉勵還朕一是字，凡為督撫者，奉到硃批之後若欲見諸施行，自應另行具本，或咨部定奪。」

……各省奏摺一日常至二、三十件，或多至五、六十件，皆朕親自覽閱批發，從無留滯。……朕不過據一時之見，隨到隨批，大抵其中教諭之旨居多，今於教諭之處則未見敬謹遵奉，而於未曾允行之事件則以「會奏過」三字含糊藉口，以圖自便，有是理乎？況朕曾降旨，凡摺中批諭之處不准引入本章，以開挾制部臣之漸，則奏摺之不可據爲定案又何待言乎！」

他對於報陳欸項數目之摺，每以「不暇細覽」批之，如批田文鏡奏請動存耗羨銀數摺：

「所奏可謂明白詳悉之至，然朕於此等事件不過閱覽而已，無暇細計欸數也。於江西布政使李蘭奏酌提耗羨以均養廉以充公用摺內云，凡如此等奏摺朕不過一覽而已，從不批是當與否，總在汝等撫藩大吏秉公合宜，不欺不隱，還朕一當字而已。」

又如批江西布政使石成峨奏裁革節禮：「似此項瑣屑零星，朕何暇計及，惟向爾等責成一是字而已，爾但勉力做一眞實好官，仰副朕望，不在此分晰奏聞以希見信也！」這簡直是「一口冰糖，一記耳光」的權術；又陝督查朗阿奏軍需動用銀兩一摺，是這樣批的：「此不過一筆花帳，朕何暇觀覽。不在奏與不奏，惟在秉公查核，將來不致被人檢點爲要耳。倘少有不符，會奏過三字遂足以卸責邪！」可是他恩禮臣下，却綢繆過於家人，甚至要臣下的生庚八字以決其壽夭，可謂「做工」十足！如雍正四年（公元一七二六年）鄂爾泰謝摺有云：「……乃復軫念臣愚，詢及奴僕，勉以節義，做以背負，聞臣勤率則厘憂憐，知臣健旺則致忻悅，並著臣將八字便呈御覽，捧誦累日，浹骨鑢心！」硃批是：「朕因爾少病，留心看看竟大壽八字，朕之心病已全愈矣。」

這可以說是籠絡同族的滿人。漢軍旗的年羹堯，於雍正二年（公元一七二三年）六月十五日有謝賜詩扇摺，雍正的硃批如下：

「朕已諭將年熙過祀與舅舅隆科多作子矣，年熙自今春只管添病，形氣甚危，忽輕忽重，各樣調治，幸皆有應，而不甚效。因此朕思

此子非如壯完的人，近日著人看他的命，目下並非壞運，而且下連數十年上好的運，但你自下運中言刑剋長子，所以朕動此機，連你父亦不曾商量，擇好日即發旨矣。此子總不與你相干了，舅舅已更名得往，從此自然全愈健壯矣。年熙病先即當通知你，但你在四千里外，徒煩心慮，毫無益處，但朕亦不曾欺你，去歲中皆諭你知老幼平安之言，自春夏來惟爾父健康，並未道及此諭也，朕實不忍欺你一字也。爾此時聞之自然感喜，將來看得住功名世業必有口中生津時也。舅舅聞命，此種喜色朕亦難全諱，舅舅說我二人若少作兩個人看，就是負皇上矣。況我命中應有三子，如今只有兩個，皇上之賜，即是上天賜的一樣，今合其數，大將軍命應剋者已剋，臣命應得者又得，從此得住自然全愈，將來必大受皇上恩典者。爾父傳進宣旨，亦盛感喜，但祖孫天性，未免有此眷戀，也特諭你知。」

像這種籠絡手段，未免「煩上加番」，過當無間！後來便漸漸地不肯假漢臣以詞色了，即或有之，也不准宣揚於外，如固原提督路振揚以入覲時蒙恩賜坐奏謝摺，雍正帝批道：

「朕因念爾年紀高大，恐拜久過勞耳，似此蒙恩，只可默默胸臆，何必形之筆墨，若再向人誇詡，則更爲不學無術，君臣遇合，此等恩誼儘多，但他人不似汝淺見播揚，所以汝未之知耳。又摺中稱仰承天語，謂臣誠實可享天年，將來子孫必有成就；類此閒談，何必紀述，汝等若如此不達大體，莫望朕相待如家人父子也！」

坐是，台見他對臣下施恩之舉，防範最嚴，往往情見乎詞，如：兵部尚書署鎮海將軍何天培，以江寧駐防滿兵新設水師，其舵工水手向在高資居住，不能顧家，似宜於江寧泊船地方蓋造房屋，令其居住；硃批：「此非署印者所應料理之事，殊爲多事！」又直隸總督李紱，請免歲貢驗者，以恤貧生，可是因他和河南巡撫田文鏡立異，致觸帝怒，認爲他出身科甲，深疑其施恩於文人，遂硃批其摺云：「據奏窮老之輩不堪跋涉，果不願任，孰從而強之耶？國家用人全憑考驗，於此即謂不堪其苦，而心懷怨恨，則是立志不甘與朝廷出力報效之人

矣，亦何足深惜。若必以免貧生苦累方爲愛土，則滇、黔舉子祇應在本省會試，曷可令其往返萬里，似此崇儒重道，朕實不能。朕所重者籌國是計蒼生之儒，所崇者文經武偉循名則實之正道，至如欺世盜名違道干譽之小作用，朕則耻而不爲也！」措辭之凌厲，安得不令李紱心膽俱寒。

章回小說盛傳其爲雍親王時，常與僧徒異人來往，似也不爲無因。雍正元年（公元一七二三年）諭浙江巡撫李蔚：「朕向來三教並重，一體尊崇，於奉佛敬山之禮不稍輕忽，每見章句之士鄙薄二氏，動輒擯斥，而託名理學者尤甚，及考其操履與理學真詮又大相逕庭，此不過井蛙蠡鷃之徒耳，何是與較。浙江俗稱僧海，乃衲子卓錫勝地，近十年來不特指月清機宗風透澈者罕見，即精誦教律者亦未聞其人，叢林凋謝可勝太息，汝抑體朕意，於公務之餘，留心護持，使不致過於寥落的傾頹，不必著相莊嚴也。此意汝須領會，毋令衆知，何也？士子聞之徒爲好佛之譏，釋氏聞之致增我慢之相，其中庸者流或因而縱肆，甚至紊亂清規，有干法紀，是朕憐之而反害之也。密之！」

看他的詔諭每夾佛家語，而臣下也仰而附和，他和鄂爾泰始終無間，親如骨肉，自怡親王外，無能及者。其批鄂爾泰謝摺有謂：「朕與卿一種君臣相得之情，實不比泛泛，乃無量切善緣之所致！」鄂爾泰又奏謝道：「現在不作善因，未來定受孽果，既不敢，亦不忍惟願生生世世依我慈父，子臣一大事，以求多福而已。」又一摺云：「各條硃批調澈精微一歸平等，如桶底脫，如環無端，即此是學，臣更不須覓自了法，不了之一了百了，首在乎此，設於此有不遵是無人理，設於此猶不親是無天理，狗子亦有佛性，忍自不如狗子乎？」硃批云：「打破桶環方無碍。」又云：「不盡之事到實盡頭自然會得。」這君臣簡直像上海話所說的在「跑香檳」了。

雍正皇帝之嚮近緇流，似在潛時爲多，據懋勤殿檔的旨諭說：「朕居藩邸留心內典，於性宗之學實深領悟，御極以後，宵旰靡遑，且恐啓天下以崇尚釋教之疑，是以未嘗形之議論，欲俟庶政漸理始學三

教合一之旨是提撕警覺，以明互相詆訐者之非。」這是雍正十年（公元一七三二年）的旨諭，三年後他就崩薨了。「東華錄」載雍正三年（公元一七二五年）五月諭云：「前博爾多來京陛見，奏稱僧人宏素處有朕昔年賞金剛經一部，上有朕所製序文，今欲刊刻流傳。朕細思向來並無此事，因命博爾多將此經取來閱看，昨日齎到文與字俱非朕筆。……朕在藩邸時因府第與柏林寺相近，閒暇之時間與僧人談論內典，並非以僧人爲可以信用也。況今臨御天下，豈有密用僧人贊助之理，近日直隸宣化府江南蘇州府等處竟有僧人假稱朕者，在彼招搖生事！……不可不嚴行禁飭，……年來各處呈繳御筆，今限期已滿，尙有未繳者，……再限一年，務令全繳，倘再有隱漏，定行治罪！」可證他曩曾接近僧侶。

前面提到他對年羹堯刻意籠絡，也是他的馭下權術之一。年羹堯在沒有獲罪前，雍正皇帝親任大臣第一，雖爲漢軍而聯姻帝室，位爲大將軍，統轄滿兵，爲滿清開國以來所僅見，其奏摺中硃批之語寵暱過當，與後來獲譴之詞相對照，實難迴護，故刊本諭旨中已刪去？而懋勤殿檔中尙存。據「故宮文獻叢編」第五、六等輯所載，凡年羹堯作謙謹之詞則硃批必溫語致謝，凡後來罪案皆即當初所親許者也。例如年羹堯奏云：「龍團補服非臣下所敢用。」則批云：「只管用，當年聖祖皇帝有例的。」又如奏云：「知州趙士魁修蓋營房，捐助馬騾，臣亦行牌獎勵，並許其事平之日送部清敘。」批云：「何待事平，川資有缺即當題補！」又其謝恩摺批云：「從來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如我二人之久耳，爾之慶幸固不必言矣，朕之欣喜亦莫可比倫，總之我二人做個千古君臣榜樣，令天下後世欽慕流涎就是矣。」又摺尾求賜物云：「更懇聖慈如有新製瑤瑯物件賞賜一二以滿臣之貪念，臣無任悚惶之至。」此在年羹堯不過迎合取悅之意，而硃批則云：「今將數件賜你，但你若不用此一「貪」字，一件也不給你，得此數物皆此一字之力。」雖似君臣相狎，然亦足徵薄物細故之間亦不免極用其籠絡的手段。雍正三年二月年羹堯尙有謝摺云：「陝西巡

撫石文焯到陝曰，傳聖諭：大將軍若在軍前自當照大將軍體統行事，今既在省城，你到去仍照督撫平行，下旨與年羹堯。」至同年三月復有謝訓飭摺硃批云：「你身子病弱之言鄂賴亦奏，但范時捷來時你託他奏朕之言，有此一言入耳凡有言及你病者，朕皆難信矣。況你再不病，不用這些作爲，君臣彼此徒寒心耳！」范時捷後來曾參奏年羹堯，其所託奏之言不知何語，殆必然是深觸時君之忌的！

年羹堯嚴旨調杭州將軍，其四月二十二日謝摺硃批云：

「朕聞得早有謠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戰場』之語。朕今用你此任，況你亦奏過浙省觀象之論，朕想你若自稱帝號，乃天定數也，朕亦難挽，若你自不肯爲，有你統朕之數千兵，你斷不容三江口令人稱帝也，此二語不知你曾得聞否？再你明白回奏二本，朕覽之餘實心寒之極，看此光景，你並不知感悔，上蒼在上，朕若負你，天誅地滅，你若負朕，不知上蒼如何發落也。我二人若不時常抬頭上看，便不得你這光景，是顧你臣節不管朕之君道，行事俱是譏諷文章，口是心非口氣，加朕以聽讒言怪功臣之謗，朕亦只得顧君臣道而管不得你臣節也，只得天下後事朕先佔一個是字了，不是當要的主的主意文悖謬矣，若如此不過我君臣止於貽笑天下後世，作從前黨羽之暢心快事耳，言及此朕實不能落筆也，可愧可愧，可怪可怪！」

此批旨不甚可解，疑草本印本皆有錯誤。就其詞意研究，似並非驟有重咎，特雍正欲窘之使之啼笑皆非，故意作出自貶之詞，以訴年羹堯不臣之罪。旋中外交起彈劾，得旨令王公大臣三法司九卿會議，旋奏年羹堯有大逆之罪五：

- 一與靜一道人鄭魯等謀爲不軌。
- 一奏繳硃批諭旨，故匿原摺，詐稱燬破，仿寫進呈。
- 一見浙人汪景祺西征隨筆，詩詞譏訕，及所作功臣不可爲論，語多狂悖，不行劾奏。
- 一家藏鎖子甲二十八，箭簇四千，又私蓄鉛子，皆軍需禁物。
- 一偽造圖讖妖言。

此外尚有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忌刻之罪六，殘忍之罪四，貪瀆之罪十八，共計藏銀三百五十多萬兩，罪凡九十二款，供狀明白，律應大辟，其父及兄弟、子孫、伯叔、伯叔之子、兄弟之子、年十六歲以上者皆斬。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並子之妻妾，給功臣家爲奴。奏上，恩予自裁，子富立斬，除十五歲以上之子發極邊。其父年還齡，其兄廣東巡撫年希堯，革職免罪。

從以上抽樣記述，可見雍正皇帝統馭術的一斑。今引賈虎臣先生編著的「中國歷代帝王譜系彙編」有關雍正皇帝生平事蹟作結：

「愛新覺羅胤禛隆準魁梧，目光炯炯，音吐宏亮，舉止端凝。幼耽書史，英明剛毅，有魄力，知人善任。崇法治，明賞罰，尙廉潔，興水利，治河道，勸農桑，蠲浮糧，除賤民，立社倉。澄清吏治，裁革陋規，懲治貪墨，綜合精嚴，海內大安。平青海，討準噶爾，定苗亂，改土歸流；即廢去蠻夷酋長世襲土官，改爲派遣流官，國風大振。

然猜忌成性，刻薄寡恩，殺戮兄弟，抑制宗室，翦滅功臣，緹騎密佈：任用田文鏡、鄂爾泰等密佈緹騎（特務），到處偵緝，防止臣下，無孔不入。刺探隱微，與文字獄、如曾靜、張熙元獄；劉呂留良屍，呂家族及門徒全殺或充軍；查嗣廷，謝濟世、陸生楠、徐駿等獄，或殺或充軍。並頒「大義覺迷錄」說明華夷之分之不當，苛細誅求，均爲後世所詬病。」

（文接56頁）

農處」，第十五幅右下角有「戴芝農鑒賞章」等印，戴氏爲清代有名的鑒藏書畫專家，這手卷據專家初步鑑定爲明代晚期的佳品，用筆工整，色調鮮明，很像仇英風格，也可能是摹仿仇英的作品，清代也有複製品流傳，但不及此卷工整精細，挺秀生動。



智慧藏

中國邊政發行旨趣及徵稿簡約

一、本刊以報導社會活動，聯絡邊胞感情，團結邊疆人士，研究邊政問題，宣揚反共國策，復興民族文化為主旨。園地公開，歡迎惠稿。

二、學術論著，外文翻譯，書籍評介，均以有關我國邊疆史地、人物、文化等為主。惟翻譯文稿，請附外文或影本，如需退還外文，請附足回郵。

三、簡明精練之時事評論及富有趣味性之文藝作品，亦歡迎惠稿。惟所有文稿除滿蒙維藏文外，均請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加註標點，以便編排。否則，原件璧還。

四、來稿除特約稿件外，每篇以五千字以內為原則。惟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請加註明。

五、來稿文責由作者自負，一經發表，版權即歸本刊所有。一稿兩投，恕不致酬。如用筆名發表，請在稿末註明真實姓名、住址及電話。抄襲之文章請勿投寄，如經查出，即刊登其真實姓名於本刊。

六、來稿請寄台北市寶慶路九號蒙藏會陳式武先生收轉。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一〇一九七號
中華郵政臺字第一六五八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六月創刊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六月出版

中國邊政季刊

第二一〇期

名譽發行人：阿不都

發行人：宋念慈

社長：李啓元
主編：劉銚

副主編：陳式武
電話：三八二—二四九五

發行者：中國邊政雜誌社
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一號
電話：三二一—五三一—二六八

聯絡處：台北縣新店市三民路20巷42號
電話：九一—一五二六五

印刷者：公館打字行
地址：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81號2F—一
電話：三六三—三五三四